二〇二二年第二辑（总第一一二辑）

湖北文史

HUBEIWENSHI

湖北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HAN BOOK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北文史 . 2022 年 . 第一辑 / 湖北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 . -- 武汉：武汉出版社，2022.6
ISBN 978-7-5582-5321-8

Ⅰ . ①湖… Ⅱ . ①湖… Ⅲ . ①文史资料—湖北

Ⅳ . ① K29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083704 号

湖北文史 . 2022 年 . 第二辑

出　　品：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楚天书局
编　　著：湖北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策划编辑：郑　斌　方　静
责任编辑：赵　可
装帧设计：舒　巍　吴婧仪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岸区兴业路 136 号　　**邮　　编**：430014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4　　**字　　数**：280 千字
版　　次：2022 年 12 月第 1 版　　202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楚天书局调换，电话（027）88567638。

《湖北文史》编辑委员会

主　　任：张维国

副 主 任：何　文　叶泽林

委　　员：陶　宏　刘英姿　姚德新　严炳洲　梅香雪
　　喻立平　陈迪和　熊华敏　刘　睿

主　　编：刘　睿
副 主 编：徐少芬
编　　辑：刘　丹
编　　务：郑　斌　方　静

目录
Contents

时代追踪

001 中国首座货运枢纽机场选址鄂州的台前幕后 / 戴劲松
014 擎起“五四”火炬 呼唤民族觉醒
——百年前湖北团组织的成立 / 吴华
021 武昌一小：中共五大开幕式举办地 / 刘宇洁
031 责任·激情·成就
——听省委老领导周坚卫谈湖北烟草大调整大发展 / 林习珍 王南芳
040 神秘的 1866 矿，中国航天功勋矿 / 胡沙岸
047 政协委员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黄利鸣谈履职经历 / 黄利鸣（口述） 田吉高（整理）
055 谷城对外开放的多个历史第一 / 王照刚

沧桑岁月

063 “革命党内老同志，湖北省中大伟人”
——郭肇明与近代湖北革命运动 / 黄永昌
070 武汉黄埔与中共建军 / 卢纲
080 武汉空战最后一位亲历者的回忆 / 尹新秋
086 档案记忆中的武汉新生 / 李笙清 彭建
094 新武汉服装业铿锵起步 / 罗建华
102 鄂豫皖苏维埃银行寻访记 / 梅赞

寻梦荆楚

109　寻访汉冶萍 / 徐少芬
121　武汉首座跨街人行天桥蛇山桥与武昌南楼 / 田联申
128　罗田民俗趣谈 / 王松平
137　金伯兴个性对其书法艺术的影响 / 吴衍盛
145　訇然开启的历史之门
——枣阳九连墩战国古墓发掘纪实 / 葛昌永
154　楚望台：从皇家建筑到辛亥首义军大本营 / 何新恩
158　海峡不隔故土情　老歌乡音中秋甜
——蔡琴“银色月光下”演唱会纪事 / 蔡华东

人物春秋

166　周恩来批准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飞行员杨培光 / 杨旗　胡继雄
176　关心犹在　期待永存
——罗清泉对江陵的桑梓之情 / 丁凡璋
180　三访荆江分洪总指挥——开国中将唐天际 / 张艾梅
189　唐义精：华中地区第一所美校创办者 / 丁逸枫
198　笃学不倦　砺志研思
——尹高朝 35 年坚持写好党史故事纪实 / 陶忠辉
207　忆武汉长江大桥碑文撰写者王南舟老师 / 胡德彰
211　吴求剑将军的赤子丹心 / 吴德风

时代追踪

戴劲松[①]

中国首座货运枢纽机场选址鄂州的台前幕后

“你是鄂州花湖机场首航航班，今朝天路启，扶摇向苍穹！”2022 年 7 月 17 日 11 时 36 分，空管塔台指令下达。万众瞩目中，顺丰航空机长薛大炜驾驶波音 767–300 全货机加速滑行，腾空而起，飞往深圳。

历史将会记住这一时刻：作为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花湖机场担负着代表中国参与全球航空物流竞争的重任，它与武汉天河机场形成航空客货“双枢纽”，打通中国中部空中“出海口”，重塑中国航空物流版图。

以鄂州为圆心，1500 公里半径、1.5 小时航程可以辐射全国 90% 以上的经济和人口区域，1000 公里半径辐射五大国家级城市群、七大区域性城市群。花湖机场的投运，将让湖北的“九省通衢”地位更加稳固，与长江、京广高铁等重大基础设施一起，汇聚起湖北优势。

鄂州花湖机场是亚洲第一个、全球第四个专业货运枢纽机场，定位为货运枢纽、客运支线机场，项目总投资 308.4 亿元。机场航站楼、转运中心等设施按满足 2025 年旅客吞吐量 1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245 万吨的

① 作者系湖北日报高级记者。

2022 年 7 月 17 日上午，来自北京的 CZ5679 次航班顺利着陆，鄂州花湖机场以民航界最高礼遇“过水门”致意。（薛婷　摄）

目标设计，飞行区跑道滑行道系统按满足 2030 年旅客吞吐量 15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330 万吨的目标设计。

历时九载，圆梦此刻；大国重器，盛世启航！其中，项目仅从选址、申报到最终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就历经 3 年 2 个月零 12 天。腾飞就在眼前，让我们一起回顾这一段极不平凡的日日夜夜。

不经意间进入顺丰法眼

时针往前拨回到 2013 年。

这一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进出口总额比美国高出 2500 亿美元。而仅仅在 3 年前的 2010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还落后美国 2700 多亿美元。建一座专业货运枢纽机场，在此背景下酝酿。

这一年 3 月，李兵从湖北省环保厅厅长调任鄂州市委书记。这一年前后，武汉有了建设第二机场的设想，一时引发各界热议。对此，鄂州反应迅速，主动和武汉市有关部门沟通，但当时受内外因所限，无疾而终。

也正是在这一年，顺丰速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公司”）刚满 20 周岁。这家民营企业起步于 1993 年，到了 2013 年已拥有 32 万名

员工，直营网点超过 1 万个，营运车辆 1.5 万余辆，货运航线 400 余条，年营业收入达 300 多亿元，业务覆盖全国所有省市，并扩展到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超越众多国有企业，跻身“中国物流 50 强”之列。

此时此刻，根据快递行业发展新趋势，顺丰公司内部碰撞出一个宏伟的构想：在中国中部地区建设航空基地、仓储基地、分拣转运体系和配套产业带，总规划面积 40 平方公里，一期用地 8 平方公里，其中 4 平方公里将与地方政府合作共建枢纽门户机场，预计可吸纳 10 万人就业，产值过千亿元。

起初，顺丰专家组先后走访了河南郑州、信阳和湖南岳阳等地，这些地方的空域均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以下简称“广空”）管辖范围。时任广空作战部部长燕来坤是湖北仙桃人，他很快得知顺丰这一尚在构想阶段的谋划，于是极力想把这一重大项目带回家乡，为父老乡亲争取难得的“发展福利”。

货运枢纽机场选址，在国际业界有 11 条“军规”，包括空域条件、军民航影响、多式联运、飞行距离、绕飞频率、社会发展、城市群发展、产业配套、人才储备、气候气象和地质构造等方面。

对此，顺丰公司副总裁、顺丰航空总经理李胜结合集团发展需要，提炼了四项更为具体、更为精准的“要求”：

一是在功能上避开航空客运，因此会错开省会城市和人口密集城市；二是设在中国中部，这样两小时航程能覆盖全国 80% GDP 的来源地；三是在功能上能与铁路、公路等交通方式良好对接；四是机场建成后要具备完整的口岸功能。

“顺丰公司还会考虑一个条件，就是当地要有相关的配套环境，包括教育资源等。”李胜说。基于上述条件的反复权衡，武汉及其周边地区逐渐进入顺丰高层视野，这时已到了 2014 年 7 月。

刚开始时，在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发改委”）官员陪同下，顺丰专家组马不停蹄，相继考察了武汉（蔡甸、江夏）、黄冈（蕲春、团风）、荆州、仙桃、孝感等地，但对相关备选场址并不十分满意。

此时，顺丰公司积极合作的热情虽有些消减，但还是希望湖北省政府重新提供可选场址。恰在此时，燕来坤找到一位湖北省政府领导从中牵线，促成顺丰公司总裁王卫到访湖北。2014 年 10 月 29 日，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省长王国生参加会见，并表达合作意愿。

会面结束，湖北省政府和顺丰公司达成共识，承诺项目落户后将享受相关省级优惠政策，并成立顺丰速运全国核心枢纽项目服务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很快，顺丰公司重启货运枢纽机场选址工作，并在以武汉为中轴的方圆 100 公里内“划了一个圈”，自然而然，与武汉紧邻的鄂州就被“划”了进来。

幸运搭上末班车

李兵在 2014 年年初一次会议上说，鄂州因钢而兴，实现第一次腾飞，从一座小县城变成了中等城市，但后来也失去了一个机遇，那就是 21 世纪初，正逢国内汽车工业迅猛发展，东风汽车公司拟搬迁十堰总部，曾到鄂州新庙选址。“现在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已放缓，通用航空产业蓄势待发，这个机遇我们不能再错过！”

李兵的讲话让参会的时任鄂州市发改委主任江国新激动不已，他致力寻找通用航空的“鄂州机遇”已有多年，两人想法不谋而合。

很快，鄂州方面先是和北京通用航空（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通航”）接触，接着又找到“国家队”——中航工业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通飞”）。2014 年 2 月，鄂州市与中航通飞签订战略框架合作协议，拟共建“华中通航运营和飞机交付基地”；3 月，鄂州市发改委成立通航办，由铁路办主任吴文华兼职负责。

当鄂州被划入货运枢纽机场选址范围时，鄂州人并没有掌握准确信息。数月内，江国新、吴文华等人频繁往返于鄂州与武汉之间，全心为打造通用航空机场探路。也正是在这一奔忙过程中，他们才得悉并关注顺丰公司动向。

这样 9 月中旬的一天，湖北省发改委交通处副处长陈小平给鄂州市发改委交通科科长谢运舟打来电话，详细询问三山湖 1.6 万亩一般性农田的

2019 年机场工地上保留走马村记忆的走马石。图左为正在建设中的空管塔台，右侧为正在建设中的转运中心（何景星　摄）

具体情况，这正是鄂州此前申报通用航空机场的杜山镇选址。

紧接着，江国新在市委常委会上将顺丰货运枢纽机场重新选址和相关调查分析进行详细介绍，结论是“鄂州有一定的竞争优势”。而当鄂州决策层刚开始思考是否从发展通用航空转战货运枢纽机场选址竞争时，仙桃、蕲春等地已完成了大量前期筹备工作，抢得了先机。

9 月 29 日，时任鄂州市常务副市长杨军带着江国新、吴文华到湖北省发改委联系综合交通体系建设问题。会谈中，省发改委副主任潘幼成说：“顺丰公司正考虑重新选址，鄂州如有发展航空产业的意愿，大机场肯定比小机场更好，不妨试试！武汉城市圈已有的机场都在长江以北布局，而与武汉紧靠的鄂州地处长江以南，很有竞争力！”

信号越来越强烈：鄂州机会来了！在李兵力推下，全市争取货运枢纽机场落户的一系列工作随即展开，针对场址比选分两条“战线”出击：一方面从资源、技术、战略等方面寻找“硬支撑”，另一方面则从人脉圈里积累“软实力”。

2014 年 10 月 29 日，王卫和李鸿忠、王国生会晤一结束，顺丰公司副总裁屠蔚就带队到鄂州市华容区段店镇（七碛湖、南碛湖一带）、杜山

镇（三山湖、柯营一带）踏勘。第二天，屠蔚一行再到段店场址实地考察。

这个时间距离顺丰谋划机场选址已过去 1 年零 4 个月，进入湖北选址也过去了 3 个半月。但看了河南、湖南和湖北 3 省提供的场址，王卫总感觉没达到他的战略预期。这时，中国民航专家、原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以下简称“民航局”）机场司司长蒋作舟建议“到武汉南湖机场的外迁备选地去看看”，这就是当年被武汉放弃的段店场址。

10 月 30 日，李兵、江国新等人赶来陪同。然而，时过境迁，段店场址的优势早已不在，尤其受附近军用机场的影响较大。听到专家们的争议，李兵当即表态：“只要机场落户，鄂州全域任顺丰挑。”

顺丰公司高管刘志明当时也在现场，鄂州给他留下了不错的第一印象。

与此同时，鄂州仍继续推进通用航空领域合作，除了“北京通航中南飞机交付中心”有意落户外，与中航通飞合作共建“爱飞客”小镇的商业计划也没有停止……一套班子分兵作战，市长叶贤林、常务副市长杨军和市政协副主席陈茉莲主攻通用航空，江国新等人的重心则放在了货运枢纽机场场址比选，李兵两头兼顾！

当然，鄂州决策层深知货运枢纽机场的分量远远重于通用航空机场。“鄂州不仅在地质、气候、水文上有得天独厚的适飞条件，而且还有多式联运的独特优势。”江国新深入研究国家航空物流产业政策多年，对鄂州的优势如数家珍。

此时，顺丰专家组考察返回后，顺丰公司高层几经商讨，向湖北省政府提出扩大选址范围的细化要求：以武汉为基点，周边 100 公里范围内的城市都可推荐，每个城市推荐 3 个备选点，7 座城市一共提供 21 个选址。11 月初，鄂州市第一次被纳入货运枢纽机场场址综合比选范围，也是最后一个入围的城市。

此后，顺丰专家组在听完葛店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李军杰 20 分钟 19 页 PPT 的汇报后，再次实地踏勘备选场址，然而段店、蒲团百湾、三山湖这三个备选场址都不尽如人意。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叶贤林建议专家组去鄂城区燕矶镇看看，那里有座星丰码头，已腾出 2000 多亩空地。

鄂州燕矶名气虽相对较小，但对岸可就是北宋时期大文豪苏东坡“一词两赋”所吟诵的黄冈赤壁矶。说看就看，代表顺丰公司前来考察的冯晓平对这里濒临长江的花马湖流域一带“一见钟情”。冯晓平还说，从技术角度看，燕矶是相对更好的场址，即使需要多花 10 亿元铲平一座山，建设成本比其他地方要高一些，但有了多式联运优势，从长远看比其他地方建了货运枢纽机场还要操心转运更省成本，“综合各方面条件，全国很难找到这样的好场址”。

至此，凭借逻辑清晰的优势比对、志向高远的政策分析，鄂州后来居上，赢得顺丰公司决策层的“天平倾斜”。很快，顺丰公司委托民咨公司、盖安德咨询公司进行货运枢纽机场选址研究，并要求两个月内拿出咨询意见。

退役老兵临近退休接重担

鄂州虽被划入场址比选范围，综合优势逐渐得到顺丰公司认可，却拿不到入围参选资格，甚至一度有被排除在外之忧，困难就聚焦在空域。在项目争取时间上，鄂州姗姗来迟，加剧了工作难度。

场址比选需要民航空域和军队空域的对比分析，是机场选址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能编制机场选址报告的单位只有 3 家——民航设计总院、空军工程设计研究局（以下简称“空军设计局”）和新时代民航设计公司。

2014 年国庆节后上班第一天，10 月 8 日上午的市委常委会上，李兵对与会干部说：“要想和顺丰公司合作建设货运枢纽机场，还需得到空军支持，各位回去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谁在这方面有人脉关系。”

听者有心。列席会议的鄂州日报社社长赵德辉一下就想到了自己的同事尹新年是空军退役老兵，还知道他专门为联络战友办了一个网站，当场悄悄发去询问短信，很快接到肯定回复。一经确定，赵德辉便趁会议间隙向李兵转了尹新年的原话。

尹新年，1956 年生，1976 年入伍，历任原空军第八航空学校飞行技师、航空照相员、政治处干事，1986 年转业到鄂州日报社，时任社长助理、

副调研员。当时，他工作快满 39 年，还有 1 年就可以退休颐养天年了。

几天后，尹新年被请进李兵办公室，受领了到北京联络空军方面关系的艰巨任务。

10 月 30 日，市委调令下达：将尹新年从鄂州日报社抽调到市委顺丰项目专班工作。最早，这个专班由 5 名成员组成，包括李兵、江国新、李如峰、尹新年和谢运舟。后来，从公安部下派挂职的副市长吴涛加入进来。

专班六人中，没有一个鄂州人。李兵，湖北黄冈浠水人；吴涛，安徽淮南人；江国新，湖北天门人；李如峰，湖北武汉人；尹新年，湖北大冶人；谢运舟，湖北汉川人。在后来的决战关头，吴涛在北京曾五过家门而不入，唯一一次回家，仅在家里待了 20 分钟，便不得不与妻儿告别；21 次上北京、8 次下广州、两到长沙，行程 7 万多公里，尹新年半年内的行程相当于走了 6 次长征路。

11 月 3 日，鄂州被纳入机场场址比选范围后不久，尹新年肩负重任，踏上了北上的征程。

如何和军方加强沟通？大家起初基本是“摸瞎”，筹划了三条路径，首先是鄂州籍在京老将军和领导干部。此前，江国新在鄂州市人事局工作期间，鄂州曾连续 4 年在北京举办同乡联谊会，积累了一些人脉，如今正好借他们传播这一消息，并恳请大家为家乡发展出力。这条线最先启动，但在早期的作用并不明显。

第二条线是李兵的个人资源，他工作经历丰富，人脉资源广。与之并行的还有第三条线，就是请尹新年的八航校战友帮忙协调。事后回看，这两条线为最终赢得军方特别是广空支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尹新年到了北京后，在一位老领导建议下，找到了老战友刘发忠（时任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政治部主任，之前曾任空军设计局政治部主任），对方建议他请鄂州市派一位领导拜访空军设计局争取支持。

尹新年返回鄂州后，李兵安排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少杰带队，江国新、李如峰、尹新年随行，共赴北京。有了刘发忠的帮助，他们受到了空军设计局局长徐洪才的热情接待，双方成功对接，鄂州顺丰项目专班终于得到空军方面的支持。

“七进四”涉险过关

2014 年 12 月 29 日，省联合工作专班与民航设计总院、民咨公司初步确定“8+1”备选场址方案。不久，孝感田二河场址宣布退出，剩下的除了武汉天河是合建方案外，武汉（桐湖、乌龙泉）、仙桃（长埫口、彭场）、黄冈（上巴河、彭思）三地各两个选址进入新建方案备选范围，鄂州当时只有一个场址入选，并非顺丰专家组相中的燕矶，而是有关专家先前从地图上挑选的蒲团百垮。

此时，鄂州既没有空军设计局的方案，也未拿到广空支持性复函，而评审时间一步步逼近，要按部就班办完全部手续肯定来不及了，怎么办？

事不宜迟，李兵选择直接和顺丰高层联系，请求特事特办，开绿色通道。顺丰方面回复，只要先得到空军设计局负责人的认可，就没有问题。

不得已，尹新年找到曾在空军司令部工作过的战友冯富海做最后的努力。被老战友的诚意打动，冯富海从中斡旋，将空军设计局和鄂州顺丰项目专班约在了一起。会谈中，徐洪才当即同意为鄂州出设计方案，为鄂州跨进机场场址备选城市之列敲响了门。

2015 年年初，经过多轮争论，鄂州终于以“？”的身份参与机场场址比选。最后，全省 7 个备选场址“七进四”的比选中，鄂州以“？”参选，通过后仍然是“1+2+？”的“？”，是 4 个场址中唯一的一个待定，跌跌撞撞，涉险过关。“1”是仙桃，“2”代表武汉和蕲春。

“七进四”涉险过关后不久，3 月 25 日，顺丰公司派出以屠蔚为首的 17 人专家组，专为踏勘备选的燕矶场址而来，重点了解长江防洪、土石方、周边地面环境等问题的解决方案。

3 月底，空军设计局完成《湖北鄂州 4E 级货运机场建设工程选址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燕矶备选场址区位优势明显，综合经济价值最优，能妥善解决好与武昌军用机场（注：山坡机场）的空域协调问题；其他二个备选场址（段店、蒲团百垮），地面条件较好，但在空域上与武汉军用机场（注：阳逻机场）、武昌军用机场需进一步协调和优化。”

吃下“定心丸”

2015年4月13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向广空发出《关于征求对鄂州机场场址有关意见的函》（鄂政函〔2015〕67号），有关方面要求以5月10日为复函的最后期限。此前，仙桃拿到广空支持性复函花了九个半月时间，蕲春是整整一年，武汉则花了一年多时间。

此时，距离所谓“大限”之日只有27天，事不宜迟！在派人赴广空对接的同时，专班主力先往北京跑，去找老将军们出面协调。

结果，去广空的专班人员碰了一鼻子灰，处处求告无门，一时不免有点心灰意冷了。

5月9日，在广空参谋长郑元林的支持下，湖北省发改委暂时收回了对蕲春、仙桃两地的支持性复函。

5月10日，最后期限已至，尽管鄂州仍没有拿到广空支持性复函，但此时四个竞选城市已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1+2+?”变成了“2+2”的格局。以当时武汉天河合建方案被顺丰公司否决、蕲春彭思场址不再发力的情况看，最后的竞争实质就是仙桃长埫口与鄂州燕矶之间的比对。

5月12日，由湖北省发改委牵头，核心枢纽项目工作组在鄂州召开选址评估会，燕矶场址又一次不出意外地获专家组认可。仅3天后，鄂州市与民航中南机场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民航中南院”）签订合同，开展鄂州机场项目选址阶段飞行程序设计、飞机性能分析研究。走到这一步，鄂州已势在必得。

其实，除了天然的区位禀赋，鄂州打动顺丰的还有当地的历史底蕴和人文环境。但最终让军方松口的，离不开鄂州专班提出的“军民融合战略”：紧急时刻，鄂州机场可作为救援、救灾货运机场，也可作为武汉、武昌、黄陂、孝感军用机场乃至我国中部各大军用机场的备降机场。郑元林在接待李兵一行时也表示，鄂州机场纳入军民融合试点，将是实现军队、地方与企业多方共赢的好模式。

5月22日，应王卫邀请，李兵、叶贤林带队到访顺丰公司深圳总部，吴涛、江国新、李如峰等人陪同。此次会面给鄂州吃了“定心丸”。最后，

王卫说：“鄂州综合条件符合顺丰对货运枢纽机场项目的定位及经济效益的预测，鄂州燕矶是最理想的机场场址。”

花落鄂州

2015 年 6 月 10 日，鄂州燕矶、仙桃长埫口两个场址的 3 份设计报告分别提交。按原先安排，由民咨公司组织专家组评审。6 月 11 日、12 日，受省企联合工作专班委托，民咨公司邀请国内民航系统顶尖专家踏勘武汉天河机场、鄂州燕矶场址、蕲春彭思场址以及仙桃的长埫口场址、沙湖场址等，并在武汉召开选址报告专家预评审会，对民航设计总院、民航中南院、空军设计局提交的各场址选址报告展开讨论。

最终，与会人员达成共识：用打分形式确定第一、二名，请广空对第一名出函。如果省里不同意第一名，就直接向省委主要领导反映；如果广空不同意第一名，项目就放弃在湖北建设。在历经前后 8 次专家组现场踏勘、近百人次到会讨论后，鄂州燕矶备选场址继续在评审中位列第一。

很快，顺丰公司正式电话知会湖北省发改委，物流核心枢纽项目决定落户鄂州。当天，省发改委主要负责同志及时将有关进展向李鸿忠、王国生作了汇报。

6 月 18 日，顺丰公司和湖北省发改委共赴民航局汇报项目选址情况。鄂州市燕矶场址在综合评审中被确定为第一优选场址，民航局及机场司、规划司的负责人均给予肯定和支持，明确表示将启动选址批复程序。

6 月 24 日，顺丰公司向省政府发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关于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选址的意见函》，函中称：“在满足选址所需的各项条件（包括但不限于：气候、空域、填湖、削除山体满足净空需要等）的前提下，顺丰在候选场址中选定湖北省鄂州市燕矶地区作为国际物流核心枢纽拟建场址。”

6 月 29 日，鄂州市委向省委呈送《关于顺丰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项目工作情况的报告》。

6 月 30 日，报告得到省委主要领导的批示肯定。到了这个时候，尘埃终于落定。

鄂州花湖机场飞行区远期效果图

7月8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向民航局发送《关于恳请支持将顺丰国际物流核心枢纽纳入国家相关规划的函》，向国家发改委发送《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恳请支持将顺丰国际物流核心枢纽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函》，向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发送《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恳请审查顺丰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鄂州燕矶选址方案的函》（鄂政函〔2015〕136号）。

9月25日，湖北省政府向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发送《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恳请审查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机场选址报告并出具支持性意见的函》（鄂政函〔2015〕199号）。

10月9日，湖北省政府收到《广州军区空军对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机场选址的初步意见》（司作〔2015〕81号），与空军武汉机场（即阳逻机场）合用、鄂州燕矶、仙桃长埫口三个预选场址获“原则同意”。

2016年1月13日至15日，受民航局机场司委托，民航咨询公司在武汉组织技术咨询会，专家组一致认为鄂州燕矶场址优于阳逻机场和仙桃长埫口场址。

4月6日，民航局正式批复《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机场选址报告》

[《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湖北鄂州民用机场场址的批复》(民航函〔2016〕376号)],经对报告中提出的三个场址进行审查,认为燕矶场址相对条件最优,同意将燕矶场址作为湖北鄂州民用机场的推荐场址。至此,选址阶段工作完成,前期申报审批工作转入预可研和可研阶段。

5月3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成立省五大重点项目建设指挥部的通知》(鄂政办函〔2016〕42号),“国际物流核心枢纽”作为湖北省五大重点项目之一正式成立项目指挥部。

5月10日,顺丰公司总裁王卫首次正式到访鄂州。

2017年6月22日,中部战区空军参谋部与湖北省人民政府签订《新建湖北鄂州民用机场协议》,原则同意在鄂州市鄂城区燕矶镇东南新建民用机场。

2018年2月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鄂州机场预可研报告及相关附件,“同意新建湖北鄂州民用机场”(国函〔2018〕26号)。

12月27日,鄂州机场总体规划获民航局批准。

2019年1月11日,国家发改委批复新建湖北鄂州民用机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2020年5月,鄂州机场主体工程开启实质性动工。

12月31日,鄂州机场顺丰航空基地开工。

2021年1月1日,湖北省首条智慧高速公路——鄂州机场高速公路一期工程全面正式开工。

1月7日,民航局批复同意鄂州新建机场正式命名为“鄂州花湖机场”。

12月29日,鄂州花湖机场建成校飞。

2022年1月24日下午5时25分,鄂州花湖机场首次校飞科目完成。

3月19日晚7时15分,鄂州花湖机场完成我国首次全货机机型试飞。

2022年7月17日,鄂州花湖机场正式开航,开启鄂州蓝天经济轻时代。

吴华[①]

擎起“五四”火炬　呼唤民族觉醒

——百年前湖北团组织的成立

“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红五月是青春激扬、革命高涨的日子。100 年前，1922 年 5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青团中央的前身）宣告成立。遵照团中央的指示，12 月 17 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北区委成立。她一经成立，便在湖北省委领导下，投入伟大的革命斗争实践，成为率先觉醒的社会进步力量，推动湖北青年运动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点燃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缕星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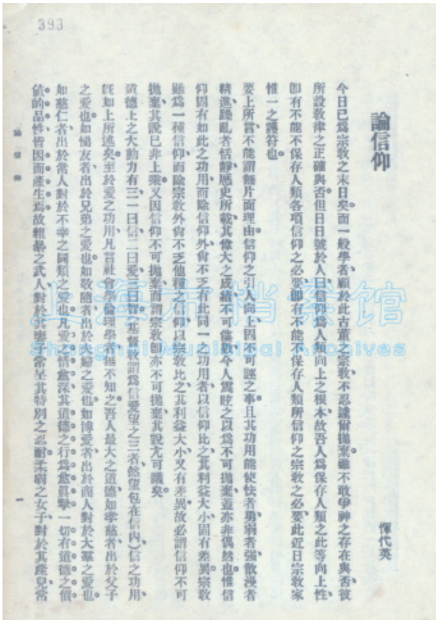
求索：探寻救亡之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大地国难日深。1861 年汉口开埠，英、德、俄、法、日五国相继在汉设立租界，对湖北进行残酷侵略和掠夺。一批仁人志士在荆楚大地苦苦探寻救亡图存之路。

1889 年，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督鄂 18 年里，大量开设新式学堂，有组织地选派青年赴海外留学，湖北进步青年开始“睁眼看世界”。

1911 年 10 月 10 日，湖北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社及湖北新军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发动武昌起义。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建

① 作者系湖北省档案馆主任科员。



393

論信仰

惲代英

今日已爲宗敎之末日矣。而一般學者、顧於此古董之宗敎、不忍遽屏擲棄。雖不敢爭神之存在與否、彼所設敎律之正確與否。但日日號於人、曰信仰爲人類向上之根本。故吾人爲保存人類之此等向上性、卽有不能不保存人類各項信仰之必要、卽有不能不保存人類所信仰之宗敎之必要。此近日宗敎家惟一之護符也。

要上所言、不能謂無片面理由。信仰之引人向上、固不可誣之事。且其功用能使怯者勇、弱者強、散漫者精進、躁亂者恬靜、歷史所載、其偉大之成績、不可僂數。今人震眩之、以爲不可拋棄、蓋亦非偶然也。惟信仰固有如此之功用、而除信仰外、尙不乏有此同一之功用者。以信仰比之、其利益大小固有差異。宗敎雖爲一種信仰、而除宗敎外、尙不乏他種之信仰。以宗敎比之、其利益大小又有差異。故必謂信仰不可拋棄、其說已非上乘。又因信仰不可拋棄、而謂宗敎卽亦不可拋棄、其說尤可議矣。

道德上之大動力有三、一曰信、二曰愛、三曰智。(基督敎謂爲信愛望之三者、然望包在信內、)信之功用、旣如上所述矣。至於愛之功用、凡言社會學倫理學者、靡不知之。吾人最大之道德、如孝慈者、出於父子之愛也。如悌友者、出於兄弟之愛也。如敬隨者、出於夫婦之愛也。如博愛者、出於兩人對於大羣之愛也。如慈仁者、出於常人對於不幸之同類之愛也。凡愛之情愈深、其道德之行爲愈眞摯。一切有道德之價値的品性、皆因而產生焉。故粗鄙之武人、對於其妻子、常呈其特別之忍耐。柔弱之女子、對於其產兒、常

論 信 仰　　一

1917 年，恽代英在《新青年》发表《论信仰》

立了共和国，但中国仍旧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

1915 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在全国掀起新文化运动。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新青年》深刻地影响了湖北，为正在追求真理的湖北进步青年，展示了一个新天地。武昌中华大学的恽代英积极回应，给《新青年》致信："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看到了曙光一样。"《光华学报》《汉口民报》等一批进步报刊诞生，进步青年恽代英、黄负生、林育南等纷纷撰稿，围绕世情、国情展开讨论，对封建制度和伦理纲常进行批判，促进了青年的觉醒。这一时期，由恽代英等人发起成立的互助社，作出了改造社会的实践探索，成为湖北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也是全国最早的进步社团之一，吸收了林育南、肖人鹄、刘仁静等许多进步青年，也吸引了董必武、陈潭秋等人的注意。

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连续发表《庶民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并高呼"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一批苦苦寻求中国出路的先进青年，由此受到了震动和鼓舞，他们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一些由进步青年创办的湖北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仁社、黄社、

辅仁社、日新社、农村改进社、人社等，这些社团都注重个人品格修养，以改造社会为宗旨。1918 年 6 月 6 日，互助社在中华大学开办启智图书室，专门销售《新青年》《新潮》等进步书刊。1919 年初，胡业裕等人创办《新声》半月刊，进行新思想、新文化的研究和宣传，成为武昌第一个新文化出版物。新的时代强音开始在荆楚大地上风雷激荡。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爆发爱国学生运动，以武汉学生联合会为主的湖北青年进行了声援和坚决斗争。6 月 1 日，近六千名学生实行同盟罢课，湖北督军王占元下令军警野蛮镇压，在中华大学门前当场刺伤学生十余人，酿成了湖北“六一”流血事件。五四运动以后，一大批经受洗礼的湖北热血青年，开始新的探索之路，他们终将目光投向社会主义，投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恽代英与林育南在武昌共同创办利群书社，直接经销《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张冥飞编印《劳农政府与中国》，恽代英翻译《阶级争斗》；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在李汉俊帮助下，开始系统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文献，并创办私立武汉中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北传播的重要阵地。

觉醒：成立团的组织

1920 年 4 月，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来华，目的是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与中国的进步革命组织建立联系。8 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维经斯基一行不仅给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带来了共产国际的帮助，也介绍了苏俄青年团组织的情况和开展青年工作的经验。

8 月 22 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并向各地发出建团的倡议。同年秋，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 7 人在武昌抚院街 97 号董必武张国恩律师事务所成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11 月初，董必武、张国恩、郑凯卿同利群书社骨干成员李书渠开会，研究建团工作。11 月 7 日，在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纪念日，召开了青年团第一次会议，宣告武汉团的早期组织正式成立。会议推选包惠僧为团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包惠僧在会上宣读了团的章程，提出团的名称

为“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的宗旨是“研究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团的会议“预定每星期举行一次”；入团的手续是“不论任何人，经我团团员一人介绍，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的驻地“暂设于武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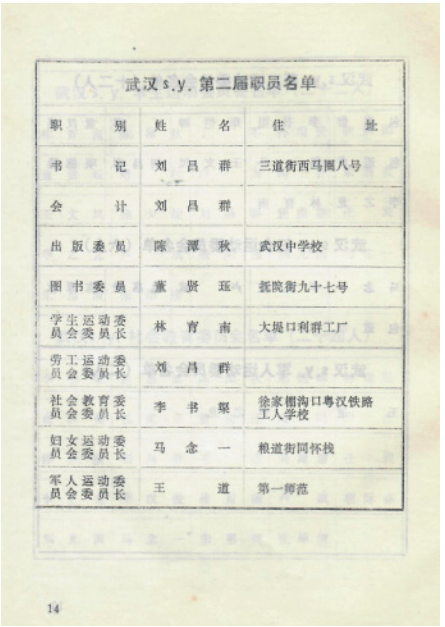
这一时期，恽代英由于热衷于新村运动，没有参加湖北团组织的创建，但在他的领导和影响下，利群书社骨干成员李书渠、林育南、刘光国、李求实等参加了湖北乃至全国早期团组织的创建，有的还担任了负责人。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培养进步青年、促进青年交流、发展工人运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没有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领导机构，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团组织内部成分复杂、分歧较大，且基本处于独立开展活动的状态，继 1921 年 5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布临时解散后，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也随即解散。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在党的成立大会上，专门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吸收优秀青年团员入党等做了研究。8 月，张太雷从莫斯科带回青年共产国际要求在“还没有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国家创立组织”的指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开始对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恢复和整顿，并指派张太雷和施存统主要负责。他们吸取了建团初期的教训，在思想和组织方面进行了整顿，重新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规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各地方团以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名之，为本团之一部”。根据此章程的有关规定，团临时中央局成立。

按照团临时中央指示，武汉党组织着手恢复、整顿青年团的工作。1921 年 12 月 4 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恢复重建。1922 年 4 月 9 日，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第七次会议，更改团名为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改选了团的负责人和委员，刘昌群任书记兼劳工运动委员长，陈潭秋任出版委员，董贤珏任图书委员，林育南任学生运动委员长，李书渠任社会教育委员长，马念一任妇女运动委员长，王道任军人运动委员长。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了一些进步和发展，团员达 30 人。

1922 年 2 月，团临时中央局向各地团组织发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的重要通讯》，通知各地青年团参加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5 月 5 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市东园隆重开幕，这一天也是马克思诞辰 104 周年纪念日。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有 25 人，包括团临时中央局的张太雷、施存统等，以及来自上海、北京、杭州、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 15 个地方团组织的代表。张绍康作为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出席了会议。



武汉 S.Y.（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届职员名单

团的“一大”所通过的纲领、章程和产生的团中央领导机构，促进了湖北地区团的工作。1922 年 7 月，根据团章规定，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组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武汉地方执行委员会，下辖武昌、汉口、汉阳、江岸、徐家棚 5 个团的地方委员会。12 月 17 日，根据团中央关于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拥有 3 个团地委的地方可以建立团区委的指示精神，正式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刘光国任委员长，委员为张绍康、项德隆（项英）、李求实、梅东洋；候补委员为林育南、许白昊、卢斌。团湖北区委当时的工作范围仅限于武汉，所辖团武昌地委主要做学生运动，汉口、汉阳两个团地委主要做舆论工作和工人运动，江岸、徐家棚两个团地委主要做工人运动。至此，一个具有统一思想和组织，具有明确纲领和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地方组织正式成立了。此后，虽然名称几经改变，但她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发挥了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

播火：进行革命行动

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创立后，便积极发展团员，以投身工人运动、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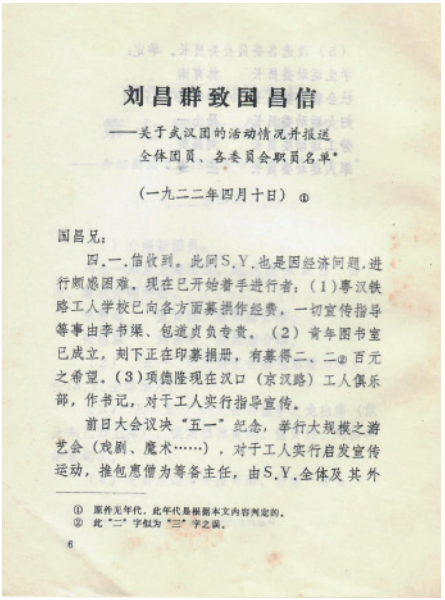
克思主义宣传、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等方式投入革命工作中。档案显示，团的工作是紧张有序的。

1922 年 4 月 17 日《刘昌群致国昌信——关于武汉团的活动情况并报送全体团员、各委员会职员名单》中介绍：

> 现已开始着手进行者：（1）粤汉铁路工人学校已向各方面募捐作经费，一切宣传指导等事由李书渠、包道贞负专责。（2）青年图书室已成立，刻下正在印募捐册，有募得二、三百元之希望。（3）项德隆现在汉口（京汉路）工人俱乐部，作书记，对工人实行指导宣传。
>
> 前日大会议决“五一”纪念，举行大规模之游艺会（戏剧、魔术……），对于工人实行启发宣传运动，推包惠僧为筹备主任，由 S.Y. 全体及其外与 S.Y. 接近之青年共同举行，此刻已在着手进行。

从刘昌群 5 月 2 日的报告看，“五一”运动取得了圆满成功。“结果是一百分的满意！有四家报馆受我们运动出特刊。‘五一’游艺会是借青年会的地点。共到八百多人，有五百张券是送工人的，其余卖钱作开会之用。戏剧演得很得听众的欢迎。有十几种的传单在各处发散。”

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特别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包惠僧、李书渠等在徐家棚开办工人补习夜校和工人子弟学校；项英在江岸开办工余夜校；林育南、许白昊等在武昌第一纱厂等工厂陆续办起工人识字班，讲解阶级斗争学说和时政。1922 年 8 月至 1923 年 2 月，全国工人罢工斗争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湖北团组织和团员青年发挥先锋作用，战斗在最前列，参加了汉阳钢铁厂、粤汉铁路工人、汉口人力车夫、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3 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各地团组织通过游行示威等方式进行声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二七”大惨杀宣言》，武汉学生联合会发表了《关于“二七”惨案告全国书》，强烈谴责军阀暴行，号召全国青年和人民群



刘昌群致国昌信

——关于武汉团的活动情况并报送全体团员、各委员会职员名单*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①

国昌兄：

四、一、信收到。此间S.Y.也是因经济问题，进行颇感困难，现在已开始着手进行者：（1）粤汉铁路工人学校已向各方面募捐作经费，一切宣传指导等事由李书渠、包道贞负专责。（2）青年图书室已成立，刻下正在印募捐册，有募得二、二②百元之希望。（3）项德隆现在汉口（京汉路）工人俱乐部，作书记，对于工人实行指导宣传。

前日大会议决"五一"纪念，举行大规模之游艺会（戏剧、魔术……），对于工人实行启发宣传运动，推包惠僧为等备主任，由S.Y.全体及其外

① 原件无年代，此年代是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② 此"二"字似为"三"字之误。

6

1922 年 4 月 17 日《刘昌群致国昌信——关于武汉团的活动情况并报送全体团员、各委员会职员名单》（部分截图）

众起来斗争。一些领导此次工运的领袖邓中夏、林育南在不久召开的团的“二大”上，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湖北的团组织得到了锻炼和成长，也扩大了湖北青年运动在全国的影响。

为加强国民教育，推动青年运动，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利用《武汉星期评论》进行宣传。1921 年 1 月 2 日，恽代英、黄负生、刘子通等创办《武汉星期评论》，后来成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机关刊物，先后由黄负生、刘子通、李书渠、陈潭秋任总编辑。它旗帜鲜明地宣传革命思想，抨击旧制度，指导知识青年投身于革命斗争，还经常刊登有关工运、学运、妇运的文章和报道。1922 年 5 月 1 日，评论发行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专号”，林育南撰文颂扬劳工运动。同年 6 月，又出“妇女运动号”，李汉俊撰文《第三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第四阶级的妇女运动》，陈潭秋撰文《我对于女子参政运动的两个危惧》。该刊于 1924 年初停刊，作为武汉党团早、中期的重要宣传阵地，它在联系和团结青年团员、号召青年投身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百年后，我们仍看到无数眼中闪烁着光芒的中国共青团团员坚定地守护着初心和使命，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从无数前辈手中接过接力棒，披荆斩棘、接续奋斗，百川汇海奔涌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长河中。

刘宇洁[①]

武昌一小：中共五大开幕式举办地

在武汉革命博物馆下辖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两张历史照片吸引了很多观众驻足观看。其中一张照片标注有俄文字样，另一张照片上面人头攒动、挂满标语。这张标注有俄文字样的照片为什么会出现在展示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历史的展览中？这两张历史照片具体展示的内容是什么呢？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细节？透过这两张异常珍贵的历史照片，我们被带回到那段风云激荡的革命岁月……

中共早期党代会历史照片首次被发现

2016 年 9 月的一天，大雨滂沱，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里，一对年过八旬的中国夫妇正在认真仔细地翻阅厚厚的历史档案，他们是中国社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王福曾和李玉贞夫妇。王福曾是档案学专家，人称“档案耗子”。李玉贞是中苏关系、共产国际与中国关系问题专家，曾多次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查找资料。这次他们是受武汉革命博物馆的委托，和工作人员来此一起查找有关中共五大的相关资料。

1927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9 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即中纪委的前身），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机构，开启了党内监督制度创新和纪律建设的新纪元。

① 作者系武汉革命博物馆馆员。

2009 年，武汉市纪委和武汉革命博物馆依托中纪委在武汉诞生这一历史背景，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举办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展》。展览开展后，社会反响热烈、影响较大。2013 年 11 月 22 日，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考察中共五大旧址时曾对展览给予了高度评价。随着事业的发展，观众数量的增加，展览已不能满足观众的参观需求，迫切需要对展览改造提升。为此，武汉革命博物馆面向全球发出了相关文物征集通告。

王福曾和李玉贞在武汉革命博物馆专业人员的陪同下，到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查找相关资料。在这里，他们一连查了几天，没有什么收获。因为仅中共代表团的卷宗就有 3000 多个，照片太多太杂，目录上也看不出什么线索。这个过程简直就像大海捞针一般，非常艰苦，但他们始终相信：只要不放过任何一个档案卷宗，循着蛛丝马迹认真查阅，一定会有收获。

当天，他们一直查看档案到下午两点，还没有吃午饭。由于年事已高，再加上连日来四处奔波查找资料，李玉贞渐渐感到头昏眼花，正准备闭目养神，突然听到丈夫王福曾先生兴奋地说：“这里有！这里有！”她一看，激动得差点欢呼起来，瞬间忘记了疲惫和饥饿，赶紧请档案馆把他们发现的资料制作成清晰的电子版。

究竟是什么资料让李玉贞和王福曾两位研究员激动不已？原来，他们从浩瀚的历史档案资料里找到了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异常珍贵的两张历史照片——中共五大开幕式和五大会议期间的照片。在此之前，从中共一大到中共五大，学术界尚未发现开会的现场照片。这两张历史照片，是仅有的反映中国共产党早期党代会的照片，填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缺乏影像档案的空白，极大地丰富了中共党史早期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五大开幕式现场照片

中共五大开会期间的照片

相关资料，为研究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各重要问题和考察大革命时期革命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素材。

仔细查看第一张照片，可以发现，照片的下方用俄文标记了“1927 年 4–5 月中共五次代表大会”。照片正中墙上，从上至下分别悬挂马克思、列宁、孙中山带木质边框的照片，左右两侧分别悬挂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党旗以及两行布质标语，标语上可见“坚决的领导农民运动”“资产阶级叛逆后”“努力团结”等字样。主席台上有两排桌子，坐有 9 人，站立 4 人，台下坐着若干会议代表。

再看第二张照片，背面用俄文标记了“1927 年 4–5 月中共五次代表大会”。照片中的房顶为中国传统木梁、人字结构屋顶，木梁上挂满了彩旗和灯笼，四周墙面贴满标语和宣传画，后墙正中有一大幅宣传画和放着光芒的五角星。代表们面向主席台密密麻麻坐满了会场，窗边还有代表站立，他们神情庄重、聚精会神，服饰反映代表来自各个阶层，具有明显时代烙印。

一所看似普通却又特殊的小学

1927 年 4 月，武昌蛇山脚下，长江汉阳门码头附近，都府堤这条明代已形成的街道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不远处，都府堤北端的黉巷（今武昌红巷，原来是湖北各县士子赴省城参加科举考试的地方。——编者注），传来一阵阵铿锵有力的声音，那是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正在进行军事训练。早在年初，毛泽东就在中共湖北党组织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负责人董必武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利用湖北省高等商业学校校址主办了一所培养全国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4 月 4 日，农讲所举行开学典礼，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在这里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和农运常识，进行军事训练，参加社会斗争。为便于领导农讲所的工作，毛泽东租用了都府堤 41 号一栋三合院民居。在这里，他撰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里也成为 1927 年 5 月之前中共中央农委所在地，更成为毛泽东和妻子杨开慧携三个儿子最后团聚的地方。

在毛泽东住所的斜对面，就是武昌第一小学。它是一座典型的民国学堂建筑。临街的楼房为两层，拱形大门开在楼房中间，门内右侧有呈马蹄形三栋八间平房，是教学用房。楼房与平房均有红漆木栏走廊。

武昌第一小学是由国立武昌高等师范附属小学（简称高师附小）改名而来。其更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03 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办学之举。张之洞将武昌城分东南西北中 5 个区，分设 5 所高等小学，黉巷西端 13 号的马王庙改建为北路高等小学堂，于 1904 年 8 月开学。1913 年，北路高等小学堂停办，湖北省甲种商业学校迁入。这样，都府堤一带就没有了小学。因此，1918 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在都府堤以西的湖边菜园建成了一所新的小学——国立武昌高等师范附属小学。1926 年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武汉国民政府成立，高师附小更名为湖北省立第一小学。后来，由于人们习惯称为武昌第一小学，这个名字就保存了下来。

这天早上，武昌第一小学的水井边上，附近的居民仍然像往常一样过来排队打水。学校里的学生们也像往日一样上课、唱歌、做游戏。但是，他们看到校长王觉新却不像往常一样坐在教务处，或者巡视班级，而是穿上了一身笔挺的西装，站在学校大门口，像是在等待重要客人前来。“冇听说有么事？”“是滴，我看校长搞滴蛮清爽。”两个过来挑水的居民说道。

原来，在武昌第一小学要发生一件大事——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将在这里隆重举行。目前，在档案中没有发现中共五大开幕式在哪儿举行的记载。但是据五大代表罗章龙、郑超麟、区梦觉、陆定一以及校长王觉新等人的相关回忆，加上瞿秋白与杨之华在会场的合影照片上写着“武昌第一小学”，可以确定开幕式就是在武昌第一小学举行的。

那么，为什么党的代表大会开幕式会选择在这所小学举行呢？

这与校长王觉新是中共党员有关，更与1922年武昌第一小学迎来的一位青年教师陈潭秋有关。陈潭秋，湖北黄冈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湖北早期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当时，武昌第一小学的师资人员多数是武昌高师的毕业生。陈潭秋是1919年武昌高师英语部的毕业生，自1922年就住在武昌第一小学，1926—1927年，他担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其间，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一些小型会议，经常在武昌第一小学举行。陈潭秋以教书作掩护，在这所小学发展党组织。同时，他以学校为据点开展革命活动，学校变成了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1941年，董必武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武昌高师附小简直就成了湖北革命运动的指挥机关。"

武昌第一小学内有一个风雨操场（即室内操场），中共五大的开幕式就是在这个风雨操场举行的。因为南方下雨比较多，梅雨季节有时比较长，有条件的学校都会修建一个风雨操场，供师生们遇到雨雪天气时上体育课或者活动用。现在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内，当年的风雨操场已不复存在。据1931年房屋地图晒制的地形平面图及"武汉市公有房屋卡片"记载，风雨操场的建筑结构为高砖，层次2，有内走廊占地386.54平方米，建筑面积773.08平方米。除风雨操场外，还另有一间礼堂，建筑结构为高砖，层次1，面积185.59平方米，东西长14.60米，南北长13.40米。由于这个风雨操场和礼堂有相似之处，所以一些五大代表如区梦觉、杨之华在回忆时，都觉得好像是在礼堂举行的开幕式。但从占地面积来看，风雨操场更有可能是举行开幕式的场所。

热闹而隆重的开幕式现场

1927年4月27日，武昌第一小学热闹非凡，迎来了一大群风云人物。校长王觉新满面春风，热情地迎接每一位客人的到来，他们中有：陈独秀、毛泽东、彭湃、李维汉、瞿秋白、蔡和森、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彭述之、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向忠发、罗亦农、任弼时、谭平山、刘少奇、罗章龙、方志敏、杨匏安、王荷波、向警予……

没过多久，王觉新看到郑超麟带着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说着英语

或是法语，从黄包车上下来了。他连忙迎了上去，欢迎他们到场，并和郑超麟寒暄了一番。他看到一位白头发的外国人手腕上破了一块皮，正在流血，于是赶紧请他到会场工作人员那里去包扎伤口。

郑超麟，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和《向导》周报编辑。因为他懂法语，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王若飞让他带共产国际代表团从汉口到武昌开会。他们一行人中，有共产国际驻中国首席代表罗易、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多里奥，还有汤姆·曼等国际工人代表团成员。他们在汉口坐上黄包车到江汉关上船，到武昌汉阳门码头上岸，再雇黄包车到武昌第一小学。因为正在拆城墙，砖头满地，黄包车又不好，肥重的汤姆·曼坐的黄包车翻了，手腕上摔破了一块皮，流了血。郑超麟感到很自责，让外国同志受了伤。王觉新安慰他说："没事了，已经安全到达了。你们赶快进去吧，会议等下就要开始了。"

不久，国民党方面的人员也来了，他们是谭延闿、徐谦和孙科。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还没有哪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有国民党中央派代表参加。之后的党代会也再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因此，这成了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件。

还有一些应该来但没有来的人，比如李大钊、邓培、周恩来、陈延年。李大钊这时正被关押在北京西交民巷奉系军阀的京师看守所。邓培和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崧已经在十二天前的广州反革命政变中惨遭杀害。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还在上海同敌人周旋、斗争。

还有一个武汉第一纱厂的女工代表应该来参加开幕式，但这天她却没有来。这名女工叫张金保，是共产党员。原因是武汉第一纱厂有个男工人，与她同名同姓，也叫张金保，也是共产党员，他俩又同在工人武装训练班学习。五大开幕的前两天，也就是4月25日，错把开会通知送给这个男张金保了。直到这天，他到大会报到，大会秘书处才发现原来是搞错了。

另外，还有一群人负责会议的警卫工作。韩浚，中共党员，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司令部教导营上校营长。开幕式的前几天，他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铁军"独立团团长叶挺向他转达了党中央要求韩浚这个营来负责五大警卫工作的决定。开幕式前一天，韩浚前往会场内外做了详

中共五大召开期间部分代表合影

尽调查，研究布置了警卫计划。开幕式这天，他从教导营中挑选了 100 名忠诚可靠的官兵参加会议保卫工作。这 100 人分成两组，每组 50 人。一组 50 人穿着国民革命军军服，手持步枪在会场大门及周边站岗放哨；另外 50 人身着便服，腰内别着手枪，在会场外巡逻，密切注意会场周边情况，严防敌人破坏，确保会议顺利进行。

代表们手持出席证陆陆续续进入会场，开幕式马上就要开始了。据五大代表雷晓辉回忆，代表的出席证是圆形的，红底白字，一面印有镰刀斧头，一面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边上穿了一根线，以便佩戴。为了安全起见，大家都放在衣袋里，没有公开戴出来。但是至今，我们没有看到相关的实物，或许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保存这样一件出席证实属不易，又或者在民间流传，只是还未被我们发现。

进入会场，大家发现这次党的代表大会规模远远超过前几次代表大会。这时，全国党员数量已经达到 57967 人，与中共四大时相比，增加了 57 倍多。据武汉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考证，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共有 96 名。加上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产国际和国民党的代表，以及英、法、美共产党的代表等，有 100 多人。

开幕式会场的布置洋溢着国共合作的时代感。主席台的上方，悬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的正中间墙面上，从上到下依次悬挂着马克思、列宁、孙中山木质边框的照片，边框上披着用红绸扎成的布球飘带。左右两侧分别斜挂着镰刀锤子旗和青天白日旗。巨幅布标语从天花板垂下，分布于旗帜外侧。大致写着：“资产阶级叛逆后一切革命势力团结于无产阶级周围”“坚决的领导农民斗争”。

主席台就地利用了风雨操场的讲台，由于讲台面积不大，台上只有大会执行主席的席位和记录席。开会时上面放有铃铛，如果代表发言超时，他们就摇铃示意。大会主席团的席位摆在讲台下方，面向代表而坐。主席台上均为木椅，代表席均为条凳。代表席后面是列席位，最后是工作人员座位。此外，会场后面还有大小水壶若干个，茶杯数十个。还有一个休息室供大家休息和大会秘书处成员使用。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以中央名义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场掌声雷动。

接着，全体起立高唱《国际歌》。一个穿着白色棉毛衫、绿色马裤的与会者歌唱时声音特别洪亮有力，他是“铁军”独立团团长叶挺。叶挺所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曾作为北伐先遣队，一路所向披靡，立下了赫赫战功。

第一个致辞的是罗易，他代表共产国际发表讲话。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首席代表，他的主要使命是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所作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案》。他谈到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领导的作用问题，并且强调了无产阶级同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紧密联合执行这一使命的必要性。

接着，徐谦以国民党代表团的名义致贺词。他强调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并肩共存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应当领导无产阶级；国民党是农民的政党，所以应当领导农民，这就是结论：中国共产党必须离农民运动远一些。”

之后，是各来宾代表致辞。有来自英国、法国、美国的共产党代表

贺词，有国际工人代表团贺词，全国农民协会贺词、中华全国总工会贺词，以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协会等先后贺词。

大会致辞完毕，湖北总工会纠察队队长项英率领一支工人纠察队走进开幕式会场，向全体代表行礼致意。当时，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对稳定武汉局势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这次党的代表大会规模很大、人数较多，为保证大会顺利召开和完成各项议程，中共五大第一次设立了大会主席团，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苏兆征、顾顺章、李维汉、向忠发、张金保、彭述之、张太雷。

张金保当天没在开幕式现场。后来，她回忆起自己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后开会时坐在主席台上心里总感觉局促不安。她非常谦虚地说："自己虽然做了一些基层工作，但只有初步的革命知识和觉悟，深深感到参加大会主席团不够条件。"

大会还成立了各委员会：秘书处由蔡和森、邓培、张太雷、周恩来、黄平组成，蔡和森任秘书长。政治委员会由陈独秀、彭述之、谭平山、张国焘、瞿秋白、蔡和森、李维汉、张太雷、苏兆征、陈乔年等 13 人组成，

中共五大会址外景

陈独秀任主席，瞿秋白为秘书。农民土地委员会由瞿秋白、谭平山、毛泽东、陆沉、彭湃、易礼容、陈延年、蔡和森等 10 人组成，毛泽东任秘书。职工运动委员会由李立三、邓培、苏兆征、郭亮、李震瀛、项英、张国焘等 9 人组成，主席是李立三和苏兆征，秘书是邓培。

开幕式虽然隆重而热闹，但由于时局非常险恶，许多代表内心感到十分焦虑和痛苦。他们有的脸色沉重、默不吭声，听着台上的轮流致辞，心里在想：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现在是北伐重要还是讨蒋重要？过去蒋介石是我们的朋友，竟然公开屠杀我们的同志，现在所谓的国民党朋友到底是否可靠，他们会不会也向我们举起屠刀？还有的代表一边听，一边讨论，有的非常愤怒地说："扬子江江面上还停留着不少帝国主义的军舰，他们会不会直接向我们开炮？"有的说："开炮也不怕，我们和他们拼了……"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就在大会开幕以前，我们损失了上海广州北京三个重要的区委组织。那些地区的首脑部多被摧毁，大批同志被屠杀。剩下的组织不是失去联络，就是在极端困难状况之下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实际上，遭受损失的不止上海、广州、北京，还有重庆、南京等地。

开幕式结束后，大会休会一天，之后转移到黄陂会馆继续开会。代表们没有想到，就在休会的这一天，也就是 4 月 28 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和其他 19 位革命同志走上了奉系军阀的绞刑台。

林习珍[①]　王南芳[②]

责任·激情·成就

——听省委老领导周坚卫谈湖北烟草大调整大发展

周坚卫，1947年3月生，安徽铜陵人，大学学历。1965年9月至1970年3月，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学习。历任湖北省机械厅厅长、党组书记，湖北省政府秘书长、省政府党组成员，湖北省经委主任、党组书记，湖北省经贸委主任、党组书记，湖北省经贸工委书记、省经贸委主任等职。1997年2月任湖北省副省长、党组成员，2002年6月任湖北省委常委、

2022年6月7日，周坚卫接受《黄鹤腾飞》项目专家蔡华东、林习珍、王南芳等采访

① 作者系湖北省政协办公厅一级巡视员。

② 作者系长江日报高级记者。

副省长，2007 年 6 月任湖北省副省长、党组副书记，2008 年 1 月当选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1 年退休。

1997 年 2 月，不满 50 岁的周坚卫提拔为湖北省副省长，旋即担任湖北省烟草工业结构调整领导小组组长。从此，这位清华学子、企业改革专家与湖北烟草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那场改革攻坚战的“前线总指挥”，亲历并见证了湖北烟草从“18 变 1”大调整大发展的全过程。

回顾自己担任湖北省烟草工业结构调整领导小组组长的 10 年奋斗，历数 25 年来湖北烟草业的沧桑巨变，周坚卫不禁感慨万千。他说，湖北烟草结构调整能够走在全国前列，离不开湖北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坚定支持，离不开改革政策的有力保障，离不开全省一批改革尖兵、攻坚勇士冲锋在前。“所有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都是富有激情的人，生命就应该在干事创业中燃烧。”“我很荣幸，能与他们一起并肩战斗。衷心感谢这些同志们，他们为湖北烟草工业的结构调整和整合做出了巨大贡献。”

10 年，从 25 亿到 200 亿

历史上，湖北因烟草产量高、卷烟计划多，被称为“两烟大省”。18 家中小烟厂，数量更是居全国之最。然而，大并不意味着强。从产品上说，因为竞争力不足，全省 216 万箱的卷烟计划指标用不完，不少烟厂不得不卖指标挣小钱。湖北卷烟的单箱税利也远低于全国平均数。从企业讲，基本负债经营，有的严重资不抵债，甚至负债高达 300%。从生产布局上说，产业资源分散，市场分割，品牌杂乱，牌子多达 200 多个。“散、小、低、差”现状严重制约湖北烟草发展，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时值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为备战入世后烟草业竞争新格局，国家烟草专卖局正启动卷烟企业组织结构调整，意欲在全国范围内整合资源，迅速培育可与国际烟草巨头抗衡的大企业。云南、上海、湖南等烟草强省抢抓机遇，加速发展，当时已经远远走在湖北前面。

内外危机当前，调整才有生路，重组方能一搏！ 1997 年，湖北省委、省政府正式提出，大力推进全省烟草工业企业组织结构调整，有序促进

小烟厂关停，联合重组、扶优扶强，产品上档次，实现工业振兴。从此，湖北卷烟工业启动结构调整的艰难旅程。

构想再好，落实靠人。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将期望的目光投注到副省长周坚卫身上，省领导交代分工和任务："你把三大改革调整抓一抓。"这三大改革，指正处于艰难探索状态的烟草、冶金、纺织三大行业。烟草排在首位。

在工业和经济领域摸爬滚打多年，周坚卫深知个中艰难，压力如山。但他义无反顾，坚决执行，在不长的时间里，跑遍全省大大小小烟草企业，把烟草企业现状研究了个遍。1998 年 6 月，省政府成立湖北省烟草工业结构调整领导小组，周坚卫任组长。

"既然接受了工作任务，要做就尽力做好。"周老回忆，"专班成员都是组织上选派的最优秀干部，包括时任湖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曹树斌、武烟厂长康永胜、武烟当时的副职（副厂长）吴俊、2002 年过来的武汉市委常委、武烟董事长彭明权等几位。我负责主抓，先后有省政府副秘书长张维先、夏贤忍等跟着我干。我当常务副省长后，胡运钊当省政府副秘书长。抓烟草调整，我跟他们几位副秘书长强调，要下定决心，坚决抓到底。即使夏贤忍同志后来年龄快到点了，我也让他始终一抓到底。2008 年，我因工作需要调整到省人大任职时，全省烟草结构调整才接近尾声。"

"在全省烟草改革推进过程中，我提的思路很简单，最终目标就是 18 家要变成 1 家。具体到改革过程，主要采取分步走措施，先易后难，逐步深化。首先，我们采取了将规模大的武汉、襄樊、利川等企业逐步做大，实现 18 变 5、18 变 3，再完成 18 变 1，最终目标是变成一个法人，一个大企业、一至二个大品牌。根据当时的实际，为了保持稳定，解决好就业问题，企业生产点可以多设几个，但也不能太多：恩施 6 个并成 1 个，红安生产点保留，广水生产线保留，宜昌生产雪茄烟。同时，以武汉车间为主体进行整体提档升级。烟草品牌最终要实现 200 变 2，举全部之力集中打造'红金龙''黄鹤楼'这两大品牌。从业职工从 25000 变 5000。利税方面，我提出 3 年内全省烟草工商利税要实现 100 亿。当时大家比较诧异，担心这个指标完不成。结果两年我们就干到了 100 亿，又过了一年半，

实现了 200 亿，提前超额完成了我们设想的目标，取得了同行业中令人赞许的好成绩。”

“改革调整前的 1996 年，我们省在全国烟草利税排名第 18 位，全省烟草工商利税加一起才 25 亿，2005 年，我们就过了百亿，2018 年黄鹤楼品牌销售额实现 1000 亿元。”周老说到高兴处，不禁点燃一支“黄鹤楼”，高兴地继续向我们回忆着那段令他永远难忘的奋斗岁月……

“我把县长骂哭了”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再小的烟厂，也是当地政府的主要财源。没有地方干部愿意担上关停的骂名。改革涉及 18 个厂 2.5 万人利益大调整，可以说错综复杂，困难重重，问题多多。

最先抓荆州江陵雪茄烟厂的改革。关闭前，这家烟厂在职职工 1165 人，人均一年产烟才 40 箱，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 225.87%。省里希望由全省卷烟龙头企业武烟集团实施兼并重组。最初武汉担心背上包袱，不乐意。周坚卫采取了“欲擒故纵”的办法，指令荆州跟湖南常德烟厂先接触，释放可能签约的信号，凸显江陵烟厂的战略位置和价值。武烟集团获得此信息后，很快统一意见，同意托管。周坚卫采取的激将法，收到了效果。从现实考虑，湖北当时还不具备让外省企业参与重组的条件，否则全省的重组会更加复杂、艰难。

武烟集团接手后，各方从大局出发，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妥善地解决了各种遗留问题。江陵烟厂改革前后共经历近 7 年的时间，直到 2005 年关停破产工作才正式画上圆满句号。

在鄂西北，襄樊（现改为襄阳）、枣阳两家烟厂合计有 40 万箱生产能力。十堰的郧阳卷烟厂有 2 万箱指标。省里计划将三家合到一块，郧阳烟厂关停后将指标拨给襄樊烟厂。

像全省其他小烟厂一样，郧阳烟厂上马的初衷也是为了扶贫，自 1987 年创建以来就成为地方财源支柱。合并工作遭当地干部强烈反对，工作几度陷入僵局。2003 年 6 月，周坚卫带队到郧县调研。会议室里，济济一堂，坐满了县四大家班子成员。时任十堰市委书记赵斌、十堰市

2004 年 11 月，武烟集团与襄樊卷烟厂签订联合重组协议

市长陈天会以及郧县县委书记、县长先后汇报。干部们言辞恳切，痛陈老少边穷郧县的经济困难，详说为“南水北调”作出的巨大牺牲，没有一个人表态同意关停烟厂。周坚卫一直听，不做声。待大家说完，他说：“烟草业结构调整是省委的决定。在座各位都是共产党员、党的一级干部，就这样对待省委的决定？这样对待改革？关烟厂这事必须办，而且还得尽快办。”讲话中他又点名县长，“你这个同志，这么多年党的工作白干了？脑子不清醒！是不是有领导在背后支持你？支持也没用。既然是省委省政府作出的改革决定，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必须关！”

回忆到这里，周老有些不忍心地说：“一通批评下来，我把县长都骂哭了。”

一方面批评，一方面现场办公，周坚卫带领专班人员对地方提出的诉求认真倾听、仔细分析，主动积极想办法解决他们提出的实际困难，在职工安置、地方利益调整、烟厂关停后的替代项目等方面作出周密安排。经过多方艰苦努力，2003 年 12 月 28 日，郧阳卷烟厂召开职代会，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郧阳卷烟厂职工安置方案》，12 月 31 日，郧阳卷烟厂正式停产关闭。

此后，襄樊、枣阳烟厂的重组也在有条不紊地坚定向前推进。虽然

也出现了职工闹事、静坐等突发事件，但凭着专班领导小组坚定的意志和科学的决策，最后这些矛盾都一一化解，各种问题都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解决。改革是需要付出成本的。湖北烟草的改革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得到了企业干部职工的理解，他们为改革作出了牺牲，是值得敬佩的。

十年改革，荆棘处处。周老说："虽然我们专班推进力度强，但最初阻力非常大，决策意见也不太统一，改革进展非常艰难，当时我实际成了救火队员。俞正声同志到湖北担任省委书记后，他与清泉省长一道，态度明确，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调整才得以顺利、加速推进。"

2003 年，结构调整最关键的时候，武烟集团、襄樊烟厂、清江卷烟厂各自重组了几个中小烟厂，基本形成了"18 变 3"格局。接下来的走向很关键。渴盼靠大联大的襄樊烟厂经过种种渠道牵线，找到宁波大红鹰谈重组；清江烟厂经介绍，到云南昆明寻求合作。"武烟的彭明权听到消息后，非常着急，立即跟我打电话。我一听心里一惊，糟糕！如果这样下去，省内烟厂 18 变 1 做大做强的目标就很难实现。"周坚卫马上向两位主要领导汇报此事，并十分着急地说："我们边上已经有了长沙和常德两只大老虎，再引来两只大老虎，那不是要把我们的武烟挤垮了，那我们省还怎么搞重组？如果真要这样做，今天我就辞了这个组长名头，你们另请高明吧。"两位领导一听，当即表态："按你的意见办，让他们别去了。"

回忆当时情形，周老感叹："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能虚心听取部下的意见，并果断作出调整决策，这很不容易，要有宽广的胸怀。这也体现了他们对我们工作专班的充分信任和支持。"

到 2005 年，湖北 9 家小烟厂彻底关闭，中型烟厂实现联合重组。2005 年 10 月 8 日，武汉市政府、恩施市政府、湖北中烟、湖北省烟草专卖局四方，就武烟集团与清江卷烟厂资源整合涉及地方既得利益问题在武汉签署协议，至此，湖北卷烟"3 变 1"任务基本完成。

"改革要让人看到前面有光明"

为什么改革难？归根到底是利益的牵制。"利益问题不解决好，地方、

2019 年，武汉卷烟厂自动化生产线

企业、职工利益不分配好，改革就不会成功。改革是利益再分配，发展中的阻力必须想办法破除，政策要对路，处理好几个利益关系，让人看到前面有光明。”周坚卫说。

一是要处理好职工利益。湖北省内，一般国有企业买断职工工龄，一年工龄补偿标准是数百元到千元左右。我们争取到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支持，我省烟草行业安置职工一年工龄补偿三四千元，买断 10 年工龄，职工能得到三四万元补偿，买断 20 年就是六七万元，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数字。安置分流办法也灵活多样，有一次性安置、内退、待内退、离岗休养、离岗病休、待岗、调出等多种渠道和方式。

二是要处理好集体利益。周坚卫介绍，“我当时定的，一个小厂关了，省级和市级财政要各出 1500 万元，招商引资，让当地发展替代产业。给企业和地方留后路，保就业，保稳定。”在省委省政府和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大力支持下，湖北中烟、省内各级政府发展卷烟配套产业，发展地方新兴产业，吸纳了不少烟草职工再就业，维护了一方稳定。

最关键的是处理好地方既得利益。省委省政府坚持利益兼顾原则，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实际操作中，实行一厂一策。对 10 万箱

以下的关停小烟厂，以关停前 3 年最高年份的既得利益为基数，以划税的形式统一划转。红安、广水、三峡烟草公司，以重组前 3 年中最高年份的既得利益为基数，按每年 3% 的速度增长，3 年封顶。清江、襄樊两家烟厂，以同样的标准核定基数，与武烟集团的利税增长幅度“同增同减”。烟厂所在地的合法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同时也肩负净化市场、帮助湖北中烟做大做强的责任。18 个利益主体变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周老介绍，清江烟厂与武烟集团联合重组前，恩施州一年可收烟草利税 3 亿多，现在每年能分 70 多亿元。

“其实，之前宜昌和武汉谈判时，我就主张‘同增同减’，这样大家同甘共苦，有利益大家一块得。而且我对武烟发展有信心，改革绝对会释放红利。”

“有几家当时没有选择‘同增同减’，很后悔，后来在我任上，作为遗留问题都一并解决了。正声、清泉、训秋等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也都出面协调，做了大量工作。同时，我对武汉市领导同志说，全部烟草利税，省里与你们分成，你们搞好了，省里也有一点。这样，省里将全心全意支持你们发展。武汉市也同意了。”

湖北烟草工业“18 变 1”的故事，不仅令全行业瞩目，也成为“全省一盘棋”“工作一抓到底”的最生动写照。

让生命在干事创业中燃烧

周坚卫大学时期正值“工业学大庆”，毕业后毅然投身潜江油田钻井一线，“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铁人精神深深融入生命里。他在副省长任上时，正值我省国企改革攻坚期，国有大厂减员增效、转型求生爆发期，1.5 万人的“巨人工程”湖北蒲圻纺织总厂下放改制他去处理，荆襄磷矿停业破产他去处理，鄂西化工厂数千人堵铁路他去处理，大冶特钢几千人闹事他去处理。无论任务多么艰巨，局面多么复杂，周坚卫都不遗余力，想尽办法攻坚克难。

“我的人生信条是六个字：责任、激情、成就。”周老说，“一个人，一定要做个有责任感的人，对父母尽孝，对工作履责，对社会尽责，对

湖北中烟六大生产点布局

自己负责。共产党的干部更应如此。而激情，有文章说过，奔腾的理想，燃烧的生命，是创业者的痴狂。所有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都是富有激情的人，生命就应该在干事创业中燃烧。同时，人还要追求成就感。这样，当他回首往事时，他才可以说，‘我还做成了几件事，没有虚度光阴，没有愧对这一生’。”

周老告诉我们，他上任副省长时就已经算过，到退休还有 11 年，满打满算，也就 4000 多天。“我要抓紧时间，一天不停地干，把想干的事都干了。”

“我很感谢俞正声同志，他让我把想干的事都干了。”他说。

胡沙岸 ①

神秘的 1866 矿，中国航天功勋矿

1970 年 4 月 24 日 21 时 35 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在我国酒泉成功发射升空。

随着嘹亮的《东方红》乐曲从广袤太空传向五洲四海，中国正式宣告：中国人民从此开启了探索宇宙奥秘、见证星辰大海的新纪元！

在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的背后，有一座神秘的军工矿为东方红一号早日上天，默默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就是鄂南通城的 1866 矿。近日，笔者采访了原 1866 矿党委副书记彭忠玉等人，听他们讲述了半个世纪以前、那些终生难忘的经历。

山里来了神秘的地质队

1964 年春天，断峰山上杜鹃怒放，山花烂漫。

这一天，一支神秘的队伍来到山上，忙碌地进行地表槽探挖掘，或打桩钻孔。这支南腔北调操着外地口音的队伍，迅速引起了当地人的注意。

断峰山，幕阜山脉—药姑山脉余脉，横亘在湘鄂边界，山北是湖南省临湘县詹桥乡曹家岭，山南是湖北省通城县北港镇岭源村。这支神秘的队伍，就是刚成立不久的湖北省地质局鄂东南地质队。地质人员之前在下游河沙中发现了当时国防工业急需的钽铌稀有金属，一路上溯源头，来到通城境内的断峰山。

经过勘探发现，地质队确定断峰山存在丰富的钽铌铁砂矿，引起国

① 作者系作家，资深媒体人。

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为便于开展工作，1965 年，湘、鄂、赣三省相关地质队合并，成立 701 地质队，直属国家地质部，对断峰山钽铌矿床进行详细勘探。

这一年元月，我国东方红卫星项目正式立项启动，代号“651”。因为国防急需，1966 年年底，国家有关部门从全国各地征调人员，正式启动了 1866 矿山筹建工作。

那么，钽、铌是什么金属呢？为什么这么重要？

钽（Ta），呈深灰色，熔点 2996℃，沸点 5425℃，具有延性好、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能形成稳定的阳极氧化膜，因此具有优良的整流和介电性能。

铌（Nb），呈银白色，熔点 2468℃，沸点 5127℃，具有耐腐蚀、抗疲劳、抗变形、热电传导性能好，在高温下具有极好的电子发射性能、超导性能极佳等特点。

因为这些特性，钽、铌是我国当时正在研发的长征火箭发动机和东方红卫星的光声电器件必不可少的珍稀材料。也因为事涉国家最高保密层级的“两弹一星”绝密工程，该矿代号 1866。

为保密需要，1866 矿对外公开挂牌“湖北长石矿”，由湖北省冶金工业局代管。

坑道支柱工，选了就不后悔

1968 年，18 岁的武汉伢彭忠玉，招工成为 1866 矿的一员。他和工友从武昌火车站坐绿皮火车沿京广线南下到湖南临湘站下车，然后坐卡车一路颠簸，来到 40 公里外的湖北省通城县北港公社。

当时，矿山条件异常简陋，因为时间紧迫，几百号人马自己动手，搭建简易木板房、茅草房先解决住的问题，一边筹建，一边开采。

为培养熟练工人，彭忠玉和工友 60 多人，不久后被送往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的漂塘钨矿进行井下作业培训。在漂塘 3 个月学徒期间，彭忠玉每月仅 18 元生活费。3 个月期满，他回到 1866 矿，半年后转正，被定为三级工，工资 45.8 元。彭忠玉选的是支柱工，这是矿下作业劳动强度最大、

当年的办公楼（黎伟　摄）

风险系数最高的三个工种之一，另两个是风钻工和运输工。

支柱工，是为工友搭建“安全屋”的人。那时候井下掘进，主要依靠爆破，爆破过后，支柱工首先进入施工现场，先通风、抽烟除尘，然后清除松石、落石，清理小通道，再用随身携带的大磅铁锤、钢凿，在矿洞两侧上方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两个深约 20 厘米的岩洞，作为支窝，然后开始搭建“安全屋”：选用粗大的木方楔入两侧上方的支窝，作为洞顶的横梁，即“屋顶”，横梁下面，沿两侧洞壁用木方作支柱，用马钉、木楔等与上面的横梁紧紧钉牢，固定好，如此一步一步向前延伸，下方的安全通道就形成了。

作业过程中，落石、塌方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加上缺少先进工具，全靠工人在极为艰险的环境下出大力作业，日复一日，辛苦程度难以形容。彭忠玉几十年后回忆说：“我那时年轻，身体素质好，一心想到井下最前线的地方锻炼自己，所以没有多想危险不危险，选了就不后悔。”

就是在这里，彭忠玉才知道 1866 矿开采的、当地人称为“黑石”的

稀有金属钽、铌，是国家国防工业急需的战略物资。为了完成任务，矿山人在艰苦的条件下，没日没夜三班倒作业。有的班组甚至几天几夜不出矿洞，最后矿长亲自下达命令才肯出矿洞休息。

彭忠玉吃苦在前，重活险活抢着干，因为表现出众，1971 年被组织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工人是军事化编制管理，1972 年彭忠玉升任班长，半年后即升为排长。

排哑炮，生死置之度外

1973 年的一天，井下爆破出现哑炮。坑道轨道组的张水清排长，勇敢地站出来报名去排除，可就在接近爆点时，哑炮突然起爆，张水清被震得脾脏破裂，肋骨断了 5 根，全身被碎石打成了筛子。为抢救张水清，矿长贾国峰动员全矿职工献血，当晚就拉了四卡车 180 多人去医院为张水清献血。经过多日抢救治疗，张水清才脱离生命危险。老人至今健在，儿孙满堂。

不久后，再次出现哑炮，彭忠玉不顾危险，主动请缨下井排险。在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协助下，他最后成功地将哑炮排除。这次排哑炮的经历，那种惊险和艰难，让彭忠玉一辈子难以忘记。

1974 年，年仅 24 岁的彭忠玉调任 1866 矿生技科副科长，成为矿上最年轻的科级干部。彭忠玉更忙了，一刻也闲不住，不是往坑口井下跑，就是到选矿车间查看设备运行的情况，或者到机修车间修理机器，刻苦钻研各种技术革新。他借鉴兄弟矿山经验，在 1866 矿推广“无支柱开采法”，得到了湖北省冶金工业局的肯定推广；将选厂碾碎机改造升级，从动选、电选，再到复选，产量不断提高，效益明显增长。

工人们在彭忠玉的带动下，创新热情高涨。工人陈逢斌研制了震动放矿和自动卸矿技术，肖厚生研制了光电对位和自动掰班系统，他们受到了中南五省现场会表彰。彭忠玉说：“特别值得写一笔的是，1866 采用露天开采与坑道掘进相结合的方式，采用天井卸矿、轨道运矿的工作模式，创造了该矿在同行业中死亡率最低的纪录。”

面对冲击，军代表命令开枪威慑

因为是军工矿，1866 矿长年驻有 3 名军代表。一名副团职干部带队，两名干事，加上矿本部的保卫科，联合负责矿山的生产安全、保密等工作。钽铌精矿生产出来之后，要送往湖南株洲冶炼厂和东北冶炼厂，一路都由军代表押运。在最初转送国家有关部门检测时，军代表以高度的责任心，一副手铐一边铐着矿石转运箱，一边铐着自己的左手，人不离矿，矿不离人。

1970 年的一天，造反派企图冲击 1866 矿，被保卫人员阻拦在铁丝网大门处。因为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保卫人员多次劝告无效，军代表眼见情况紧急，果断命令开枪示警。保卫人员一齐拔出手枪，军代表瞄准造反头子的后脚跟，“叭”的一枪，手枪子弹从造反头目后脚跟进，前脚趾出。闹事的造反派见状，慌忙逃窜。事态得以平息，矿区的生产继续有序进行。

左为当年军代表的驻地，被称为“将军楼”（黎权龙　摄）

矿山下马，“两弹一星”精神永续

1978 年，彭忠玉被任命为 1866 矿党委副书记，成为矿上最年轻的矿级领导，也是目前唯一健在的矿级领导。

1980 年，1866 矿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宣布下马解散。矿上干部职工来自全国各地，远的四川、甘肃等省份，近的湖南和河南，当然人数最多的还是湖北。当时全矿登记造册人员 790 余人，加上随矿家属、民工，共计三四千人。1866 矿下马后，工友们分散各地，武汉、鄂州、黄石、大冶、咸宁温泉、崇阳等地都有，其中转到大冶钢铁厂的人最多。

彭忠玉 1980 年分到大冶钢铁厂，担任车间主任，这一干又是 20 年。2000 年，彭忠玉离职回到武汉。

2018 年，1866 矿工友们自发组织 50 周年聚会，彭忠玉回到他梦魂牵绕的断峰山下，看到不少工友相拥而泣，不禁感慨万千。这里的山山水水，曾承载他的青春和梦想，曾见证 1866 人激情燃烧的岁月。

彭忠玉现在和女儿一家居住在广州，含饴弄孙，晚年幸福。采访时，

2022 年 5 月，矿友们在黄石市老矿工胡仁香家里聚会（黎权龙　摄）

彭忠玉得知通城县政府于2022年3月，将1866矿旧址列为历史建筑加以保护，非常高兴。他反复对笔者强调，他只是1866矿普通的一员，是众多矿山人不畏艰辛、无私奉献，共同为东方红一号卫星作出了贡献。他个人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深感光荣。

每年4月24日，50多年前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的那一天，如今已成为中国航天日。从首颗人造卫星到一箭三星，从航天员太空出舱到火星探测，半个世纪过去，天高地迥，神州巨变，中国人民探索广袤宇宙的步伐永远不会停息。而包括1866矿在内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中国航天人向更高、更远的目标进发！

黄利鸣[①]（口述）　田吉高[②]（整理）

政协委员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黄利鸣谈履职经历

编者按　黄利鸣，1958 年 1 月生，湖北监利人，历任三峡大学医学院院长，三峡大学副校长，宜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湖北省卫生厅副厅长，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对黄利鸣委员的访谈，是在他曾经担任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时的一间会议室里进行的。谈及政协工作，黄教授一脸的兴奋，话匣子一下打开了。从参加 1992 年宜昌地、市合并后成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宜昌市委员会第一届会议起，到湖北省政协委员、常委，再到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担任政协委员已满 30 年。政协委员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他用一句句质朴的话语，给我们讲述自己的履职故事。

当政协委员要懂政协

做好政协工作，当好政协委员的首要点，就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懂政协”。怎么懂？要认真“读政协”，才能真正“懂政协”。要读“政协成立和发展的历史”，读“我国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读“我

①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三峡大学副校长、宜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② 作者系研究员，三峡大学工会原常务副主席。

国国体、政体和政党制度的特色”，读“宪法、政协章程载明的性质定位”。

只有认真读后才会有清醒的认识，懂了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我们就会坚持政协是政治组织的属性，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懂了政协是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我们就会多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工作，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懂了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参加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就会努力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把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懂了政协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我们就会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贯穿于政治履职的全过程，在协商中促进广泛团结、推进多党合作、实践人民民主，就会注重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在“专”出特色、“专”出质量、“专”出水平上下功夫、见成效；懂了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就会着力提高建言资政、凝聚共识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履职的效能，充分发挥政协的作用。

只有“读政协”“懂政协”，才知道政协工作怎么干，就是政协章程载明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四大工作原则。要把这四大原则落实到政协继承传统和创新发展，以共同目标寻求最大公约数，以大团结大联合画出最大同心圆，以协商民主凝聚强大正能量，以改革创新激发工作新活力。

知道了政协工作怎么干，才能明白政协委员怎么当。

当责任委员。政协没有名誉委员，只有责任委员。政协委员作为“政治人”，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政治立场坚定，政治纪律严明，把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作为责任担当的首要任务。要理所当然担负起参政议政责任，做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把事业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认真履行委员职责。

有能力履职。党和人民赋予了政协委员神圣的“话语权”，我们要在政协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舞台上发出好声音，不计较“说了算”，而是追求“说得对。”一要提高“识局能力”，围绕大局，服务大局。二要提

黄利鸣委员正在准备提案

高“识情能力”，调查了解“实”情，研究掌握“真”情，建言注意“适”情。三要提高“识策能力”，知情知政谋策，知事知需献策，知时知效施策，做到于国有利，于民有济，于己有为。

起表率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政协委员要遵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我们身为政协委员，要始终加强品德修养，锤炼高尚情操，做德之师、行之范，努力展示新时代政协委员新风貌。

在抗疫斗争中建言献策

2020 年初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黄利鸣说：“我作为政协委员，在武汉保卫战的不同阶段及时反映社情民意，务实提出意见建议。例如在武汉封城初期，针对患者就医艰难，一床难求，以及社区防控工作的实际情况，提出加强社区防疫，在科学预判疫情的基础上，扩大定点医院和床位规模的建议；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变化莫测，发病机制不清的情况，发出开展尸体病理检验刻不容缓的呼吁；针对‘四类人员’还有部分未收治和隔离的情况，进行压实责任，落细落小，切实做到应收尽收的监督；针对武汉疫情清零后出现的无症

状感染者情况，未雨绸缪提出做好隐性感染者病毒传播的精准防控建议；针对留学生因停学停课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生活困难、心理压力和感染风险情况，建议将留学生比较集中、且疫情比较严重的欧美主要国家有回国意愿的留学生用包机接运的建议等。”

谈及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黄利鸣说：“我作为千万余武汉人中的一员，经历了封城、封路、封小区与复工复产、恢复常态化的城市巨变，见证了检测、隔离、救济与内防扩散、外防输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常态防控、精准防控的战斗过程，体察了惊恐、焦虑、悲观与激奋、信心、喜悦的情感起伏。新华网文章《壮哉，大武汉——献给英雄的武汉人民》中有这样的评价：封一座城，护一国人。武汉保卫战为全国乃至世界提供了经验，赢得了时间。这座千万级人口城市和人民做出的牺牲和奉献，必将通过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斗争被载入史册！

为此，他撰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花的靓丽绽放》一文，《中国政协》杂志 2020 年第七期全文刊登。

政协委员的为民情怀

人民政协来自人民，为民情怀是每个政协委员应有的情怀。每次开会前，黄利鸣委员都要深入基层，倾听民声，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建言察实情，履职在路上。多年的政协委员实践，他总结出建言献策要有质量，要真正反映群众呼声，心系国是，情牵民生，汇集民意，凝聚力量，用心用情诠释政协委员的责任与担当。

2020 年 5 月 8 日，黄利鸣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我将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呼吁在神农架建立第一个国家生态特区。我国有经济特区、自由贸易区、高新区等，但还没有生态特区，建立‘神农架生态特区’有助于先行先试，为全国探索出可复制的绿色发展新模式。”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生态保护在山应是对山系的保护，在水应是对水域的保护，说到底应是对生态的系统保护和区域性保护。神农架林区的生态系统跨越了多个行政区域，这给系统保护带来了一定困难，建立神农架生态特区就可以按照生态保护原则划定范围，建立起对完整生态系统的

2020 年 5 月 6 日，黄利鸣委员在黄冈市蕲春县扶贫企业调研

协同保护。

2019 年 3 月 12 日，黄利鸣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说大健康产业大有文章可做，人对健康的需求是无限的，大健康产业也有无限的可能，超乎想象的空间。为此，他建议武汉要在“大”字上做文章，他说：“大健康内涵非常丰富，包括健康意识、健康起居、健康饮食、健康运动、健康看护、健康养生、疾病防治、疾病康复，等等。”真正的大健康是从日常生活到疾病预防治疗再到康复看护的一条长长的产业链，不只停留于医护保健等层面，还可延伸到体育、文化、旅游、养生休闲、智能看护等很多领域。武汉市优质医疗资源虽有很大优势，但布局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存在，这些都要通过深入发展大健康产业、充分借助市场化力量得到解决。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群众最关切、最烦心的事一件一件解决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黄利鸣委员对此深有同感，认为说到大家的心坎上了。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丹江口库区移民生活怎么样。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十分关心丹江口水库移民问题，有关会议纪要明确要求指导支持有关地方编制实施移民后续帮扶规划。湖北省很早就开展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湖北省丹江口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处理及后续帮扶规划》的编制工作，主要包括库区和外迁安置移民产业

发展与扶持，基础设施配套与完善，村庄功能完善与社区治理能力建设，劳动就业创业培训，库区消落区保护与综合治理，库区地质灾害防治等 6 个方面，规划总投资 254.67 亿元。他在会上呼吁国家有关部委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湖北省丹江口水库移民遗留问题处理及后续帮扶规划》尽快批准立项，让每一个丹江口库区移民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上都不掉队。

“作为政协委员，我就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提点子，为解决群众现实问题提建议，争取说到点子上，说到关键处。”“只有守住初心，出于公心，做到尽心，才能不辜负民之所托。”黄利鸣委员如是说。

情系大别山

大别山革命老区，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大别山是一座革命的山，英雄的山，是与井冈山、太行山齐名的革命历史名山。

2021 年两会，黄利鸣委员带来了关于继续支持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的提案，这也是他连续两届关注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系列提案之一。

在全国政协和鄂豫皖三省政协的助推下，2015 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实施《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规划》。2018 年 6 月，黄利鸣委员作为提案人参加全国政协副主席马飙率领的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重点提案督办调研组，就“加快大别山绿色发展助推革命老区精准脱贫”在安徽、河南调研。

2019 年 9 月，由黄利鸣委员带队，20 余位民盟盟员专家赴大别山革命老区麻城市开展以“两不愁三保障”为重点的脱贫攻坚民主监督调研，深入 4 个乡镇、6 个村、50 余贫困户及教学点、乡镇医院、乡镇企业等，详细了解脱贫规划、措施、效果及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建议，黄利鸣委员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全会提交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提案。

2022 年 3 月，黄利鸣委员在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国政协第十三届第五次会议

2020 年 8 月，黄利鸣委员参加全国政协副主席邵鸿率领的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重点提案督办调研组，就“支持大别山革命老区探索走出一条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路子”，在安徽、河南开展督办调研，深入舒城、金寨、潢川、新县等地考察扶贫产业项目、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异地扶贫搬迁项目和美丽乡村建设等工作。调研过程中，大家切实感受到各项规划的实施，有力促进了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发展。

大别山革命老区红色资源集中，譬如红安县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新县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源地和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金寨县是中国第二大将军县。他建议大力支持红安县、新县、金寨县等革命纪念地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充分传承和发扬红色文化，发展红色旅游助推老区发展。

大别山革命老区特别是黄冈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众多、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当前湖北省乡村振兴正战略布局建设“大别山药谷”，着力推进“药、医、养、游、贸”五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实施大健康助推乡村振兴工程。他建议大力支持大别山区特别是黄冈市发展大健康产业，带动中药材及特色农产品中“种养 +”产业及乡村旅游、养生游等快速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为农民增收创造新途径。

2022 年 2 月 22 日，全国两会召开在即，我与黄利鸣委员通电话，他

告诉我今年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上提交《关于进一步推进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建议》个人提案，联名提案《关于以县域经济为突破口激发新时代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动力的建议》，并关注我国社会治理中基层组织公共卫生管理的提案《关于将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管理纳入相关法律的建议》。他有着深深的大别山情结，多年深入大别山革命老区调研，多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大别山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建议。他希望能早日看到在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大别山革命老区率先建成以全面小康向初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渡的标杆。拳拳之心，彰显着新时代人民政协委员的责任与情怀。

王照刚[①]

谷城对外开放的多个历史第一

在波澜壮阔的开放大潮中，谷城县在省市外事侨务部门及时指导下，在县委、县政府坚强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历任侨务工作者以顽强拼搏、执着追求的敬业精神，谱写了一曲曲划时代的奋进凯歌。现就谷城“对外开放史”——“20个第一”主要史料进行回顾，以此进一步发挥海外关系的独特优势，推动形成谷城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为新时代建设现代化强国凝心聚力，为谷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襄阳市第一个县级侨联组织的诞生

邓小平同志1977年接见港澳同胞国庆代表团时指出：“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中共中央〔1984〕15号文件强调：“广大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是促进四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扩大海外影响、争取国际朋友的一支重要力量。”全国、全省相继召开侨务工作会议，建立健全对外开放“窗口”。

1984年9月11日，谷城县委决定召开全县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同时成立“谷城县归国华侨联合会”，发挥其独特作用。9月16至18日，在县一招大礼堂隆重召开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56名，代表谷城海内外中华儿女2500多人；驻谷中央企业代表，各区（镇）长、县直部办委局负责人和二级单位党支部书记220人列席了大会。县委书记徐之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葛振明、县长魏天贵、县政协主席石代珍

① 作者系谷城县原侨联主席、县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等领导出席会议。省、市侨务部门领导到会祝贺并讲话，襄阳市属各县（市）都发来贺电或派代表出席大会，县委办、政协办及群团的主要负责人向大会致辞。县长魏天贵向大会作了《同心同德，锐意进取，努力开创我县侨务工作新局面》的重要讲话。大会传达了全国、全省侨代会精神。

谷城县第一届侨联委员会合影留念

在学习讨论中，代表们争相发言，热情赞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无比英明正确，激发千军万马共建“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壮志，一致表示要向海外亲友飞鸿传书告知祖国建设一日千里，突飞猛进，争取海外亲人把爱国之情变为报国行动，邀请他们带上眷属回家乡走一走，看一看。大会于 9 月 18 日闭幕，县四大家领导出席闭幕会，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通过了《致旅居海外同胞一封信》。至此，襄阳市第一个县级侨联组织诞生了。

襄阳市第一对台胞夫妇回谷城探亲

1983 年 4 月 27 日，襄阳市第一个去台人员王先生偕夫人从台湾几经辗转，回到了阔别 38 年的家乡——谷城县五山老家。

王先生夫妇回到家乡的那天上午，县政府办负责人和从老家赶来的胞兄侄子在谷城火车站迎接。一见面，兄弟二人紧紧抱成一团，久别重逢，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看到哥哥身体健康，侄儿穿着时尚，王先生心里踏实了。县政府安排专车接王先生住在县第一招待所。次日，县长魏天贵陪同他们共进早餐。王先生激动地说，真没想到家乡的父母官这样平易近人！回来时，一到广州，我的心就感到舒畅，到了武汉，更觉得亲切万分，

如同回到了家。旅行社的刘小姐十分热情，积极给我们订购到家乡谷城的火车票，挂长途电话，还为我和太太在长江大桥合影留念，并陪同我们参观东湖、归元寺风景名胜。

早餐后，王先生一家乘坐县政府专车回到西湾村。县政府通知五山乡安排村里杀猪供其家人盛情招待“客人”。王先生沿途看到家乡的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一田田、一畈畈小麦正值拔节抽穗，长得齐展展的像绿色的案板，麦穗一拃多长。这些年，亩产最低也是五百多斤，一打听，才知道使用的化肥也是本县生产。在老家期间，王先生首先祭祖，为父母的坟上捧上一捧黄土了却心愿。除游览参观外，还拜会了亲朋好友。

王先生对于今日家乡的进步、生产的发展、生活的变迁赞不绝口！王夫人告诉乡亲们：“……小时候，他家并不富裕，榆树皮、构叶絮、山枣都当粮吃过，面糊糊稀得照人影还得喝，为了活命嘛！点灯都是用桐油，哪有电灯电杠？眼前这大铁路，公路，高压电线铁塔，在台湾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家乡人早已享受现代生活了。”

在参观赵子沟水库后，王先生万分感慨地说：“过去老家整个村子只有一口堰塘，水经不起放就干了，遇上天旱，稻子就会干死，颗粒不收。现在有了大水库，渠道绕山转，山下是良田。家乡的一切都变了，变得更加美好。我回到台湾后，一定要把家乡的新貌照片和我们在长江大桥的留影制成幻灯片一起送到同乡会，告诉他们家乡美了，回家可别迷路了！”

王先生侄子全程陪同，将观感撰文交县政府和统战部，这篇《家乡的一切都变了》的新闻通讯在海峡之声电台《可爱的家乡》节目 1984 年 12 月 12 日播出，后被载入襄阳市《对台宣传稿选》。其实，早在 1977 年春，王先生就通过香港刘政兴先生转信至谷城县石花街五山乡田家河，用二哥的名字寻亲了，这封信转到公社书记何永太手中，阅后转给王先生胞兄，同意通信往来，封闭的山乡终于开放了。

王先生返台后，立即将返乡摄影制成幻灯片在同乡中播放，激起同乡返乡探亲的迫切愿望。一时间，县城、北河、石花、紫金、丹江的侨台属纷纷请托王先生在台湾及国外寻亲，先后有唐克贤、陈壁、陈继千、郭伯善、宋乃翰、刘家驹、杨世凯、杨秀清等 14 个台（侨）胞回乡探亲。

随着1987年台湾、大陆的双向开放并逐步实现“三通”（通邮、通航、通商），海外“三胞”在国外、港澳台、大陆自由往来，带动了大陆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对外开放前20年，海外同胞共为本县眷属捐款捐物达2000万元以上，不仅改善了“三胞眷属”的生产、生活及住房条件，而且活跃了谷城市场，加快了“三胞眷属”脱贫致富奔小康步伐，促进了谷城对外开放。

1987年，王先生携子赴美侨居休斯敦。1994年再次返乡，为村贫困小学生和其他公益事业捐款5000元人民币，在谷城县开启了海外捐赠公益事业的先河。1995年返乡时，针对台独势力猖獗和台商投资大陆困扰建言献策——《湖北旅美侨胞就当前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提出三点建议》交县委统战部，襄阳市委作为“重要信息”（内参）上报，引起高层领导重视。当年10月，中央派海协会会长汪道涵率团前往武汉、成都考察台资企业发展状况。此建议为台资企业健康发展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在湖北省优秀涉台信息调研材料评比中荣获三等奖。

第一家侨属个体户的龙头效应

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长期受极“左”思想的干扰和破坏，有海外关系群众的生活、生产极度艰难，海外同胞对家乡亲人的生存状况十分关心。中央提出侨务工作“基础在国内，优势在海外”“内扶一户，外慰一片”是做好基层侨务工作的重中之重。

党的侨务政策贯彻落实，像春风化雨，温暖着广大归侨、侨眷的心。鼓励、引导、扶持侨属有效利用海外捐赠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侨务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政治任务。除热情接待海外同胞回国探亲、寻根问祖和经常性地深入走访“三胞”眷属外，把他们的急难愁盼的子女升学、就业、住房、参军、入党、提干、发展生产、出国探亲等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就协调有关部门和所在单位“特事特办”，一时难以解决的做好耐心解释。利用春节、中秋节传统节日送上祝福和慰问品、慰问金，使他们倍感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充分发挥侨联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进而在海外树立社会主义中国形象，促使侨港澳台眷属放心、放胆发挥聪明才智，

为热爱谷城，建设家乡献计出力。

第一家侨属个体户正式运营。1984 年，盛康镇侨眷刘继孝利用自身特长和优势申办汽车客运专业户，县交通局开辟盛康—襄阳专线，市侨办协调购买计划汽油，副县长胡舜国参加通车典礼。以点带面为侨港澳台眷属脱贫致富铺开了阳光大道。刘继孝以“安全正点，服务周到”的敬业精神受到市、县交通部门的表彰。次年，刘继孝的年营业额达 6 万多元，被录入 1985 年《湖北省大事纪要》。1986 年，在“全省侨务系统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会议上被通报表彰为先进典型，在襄阳、谷城侨界引起很大轰动。由此，谷城的侨属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蓬勃发展。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及国务院、湖北省《实施办法》《湖北省侨属企业条例》施行，“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十六字侨务方针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

截至 2012 年底，本县侨属企业发展到 15 家，总投资 2500 万元，年创产值 3000 多万元，安置就业 200 多人。这些侨属企业除积极缴纳税费外，还在抗击非典、抗洪、抗震救灾、捐助贫困学生、支持新农村建设中慷慨解囊，回报社会，受到一致好评。

1992 年，原大峪桥镇供销社主任王大成在牵线姨姐、谷城籍港商——霍京凤，在深圳投资 85 万元与谷城双雄服装厂合资生产服装，产品外销，从城关镇招收 35 名缝纫工去深圳，月薪 300 元，比当时国营职工工资高两倍。大峪桥、沈湾等地 4 批 50 多名缝纫工先后劳务输出，有个打工妹在广东做工三年，为家里寄回两万元盖起了小洋楼，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美谈。从此，谷城大批剩余劳力向沿海输出。据邮政储蓄统计，本县城乡居民每年打工汇款收入达 2 亿元人民币，为建设大美谷城奠定了物质基础。

谷城是争取海内外侨界捐赠最多的山区县。1991—2012 年，共争取接受海内外侨界捐赠 200 多万元，建设了 10 所侨胞爱心工程学校（教学楼），2000 多名大、中、小学优秀贫困学生得到海内外侨贤资助，受捐同学的感谢信件被省市侨刊选载。2012 年，中国侨联基金会捐资 50 万元作为本县 104 名白内障患者复明手术费，在全县上下传为佳话。

谷城县委书记、县长接待旅居加拿大中国侨联顾问邓家昌一行

谷城侨联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群众组织活动，走出了一条“有活动就有活力，有活力就有生命力”的良性循环新路子。最有影响的是2000—2013年连续14年在全县中小学生中开展每年一次的“世界华人中小学生作文大赛”活动，2058名师生分别获奖，县侨联连续14次获得大赛组委会“组织奖”，两次获湖北省侨联“优秀组织奖”。

外宣力度史无前例。如《凝聚侨界力量，打造鄂西北侨乡》《切实参政议政，彰显侨界特色》先后在全国、全省侨联干部集训会议上交流发言。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国务院《侨务工作研究》《中国侨联通讯》、湖北省《湖北外事与侨务》等中央、省市县报刊及电视台上发表谷城侨务新闻300多篇。在加拿大华人《七天新闻》、香港《大公报》等媒体上宣传谷城，把一个开放发展的谷城推向世界。谷城县侨联多次获得省市“先进集体”，侨属企业家刘国本、李嘉萍、程丹丽、吴顺鄂以及知名侨港澳眷属杨玉琳、宋身凯、吴云芝等多次获得省市县表彰，侨务干部王照刚在2009年全国第九次侨代会上获得由中国侨联、国务院侨办颁布的“归侨侨眷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县长第一次走进侨乡、第一次走出国门缔结友好城市

开展“民间外交”，服务“大国外交”是侨联工作的又一重要政治任务。1999 年 3 月，为紧紧抓住国家实施开发中西部的战略契机，配合本县招商引资工作，征得县委、县政府领导同意，通过时任襄阳市侨联副主席林民湛同志牵线，谷城与全国著名侨乡——福建省福清市友好结对。5 月 24 日，刘立勇县长应邀组团如期抵达福清市，结识了福清市海内外侨界朋友，与市长签订了《福清市、谷城县建立友好县市协议书》，沿海侨乡的客商纷纷前来谷城考察投资经商贸易，取得了实质性效果。

与韩国外交大使的“书缘”。2004 年，为纪念“谷城县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 20 周年，笔者把对外开放在各级报道的新人新事汇集成《开放之窗》一书，弥补了外宣资料空白，得到县委书记刘立勇、县长李传寨同志的大力支持，中国侨联副主席唐闻生亲笔题字：“活力在基层，优势在基层。”2004 年 5 月，该书正式出版，恰逢韩国首任驻华大使金夏中先生《腾飞的龙》第二版发行。两书互寄，以文会友。金大使愿为中韩两“谷城”县郡缔结友好城市尽力。2012 年 9 月 20 日，“第十届中韩地方政府交流研讨会”和“湖北·韩国经贸合作洽谈会”在武汉召开，韩国谷城郡派两名郡守特使徐亨圭、赵铭益参会，在会后前往湖北谷城参观访问，受到县委书记艾文金、县长龙小红等领导热情接待，并递交了韩国谷城郡首许南锡的邀请函。2013 年 9 月

襄阳市首位返乡探亲台胞移居美国休斯顿，子媳均为留美博士

28 日，龙小红县长组团回访了韩国谷城郡并签订了《中韩两谷城友好交流协议书》，参观了韩国几家知名企业、市政及新农村建设。10 月 28 日，韩国世界 500 强企业——SK 集团副总裁赵重来应邀考察谷城循环经济园，拟投资 60 亿元打造鄂西北城市矿产项目。县长出访，开启了中韩两谷城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先河。

立足“大侨务”理念，有效挖掘利用“海外 5000 万侨胞是我们共同的资源宝库”。时下，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坚持开放发展，形成内陆高水平开放新体制，服务西部大开发，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对此，我们充满信心和期待！谷城的海内外侨界朋友一定会在新时代继往开来，奋发有为，不辱使命，再创辉煌！

沧桑岁月

黄永昌[①]

“革命党内老同志，湖北省中大伟人”

——郭肇明与近代湖北革命运动

在湖北革命史上，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等革命家和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武汉中学等学校扮演了重要角色，播下革命火种，彪炳史册。鲜为人知的是，作为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和武汉中学董事长，十堰竹山人郭肇明在近代湖北革命运动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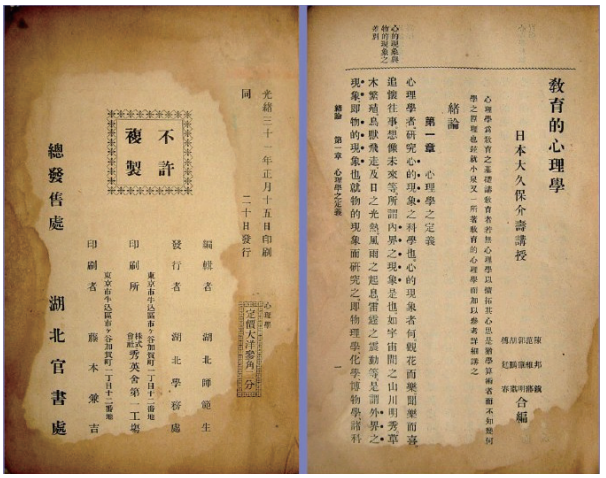
从两湖书院学生到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郭肇明 (1871—1928)，号炯堂，竹山县城关人。他从小聪慧过人，勤奋上进，18 岁时考取秀才，后考入两湖书院。读书期间品学兼优，受到监督梁鼎芬器重，后留校任教习，从此与湖北教育界结下不解之缘。

1904 年，郭肇明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入速成师范科，一年后毕业。1905 年 1 月，他与陈邦镇等人合译了日本学者大保久介寿讲授的《教育的心理学》，由湖北官书处（学务处）发行，日本东京印刷，这是中国人编著的最早的心理学著作之一。1904 年 6 月，文高等学堂（亦称两湖大学堂）被改为两湖总师范学堂，监督梁鼎芬，副监督刘洪烈，

① 作者系湖北汽车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副教授，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武当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副主任。

堂长（也称“教务长”）胡钧，后郭肇明继任堂长。两湖总师范学堂规模宏远，成为全国师范学堂翘首。1908 年，学部为湖北省城各学堂管理员、教员请奖，郭肇明被授予拔贡，以府经历归部选用。



1905 年版《教育的心理学》书影

1903 年 5 月，归国留日学生吴禄贞邀集爱国青年在武昌花园山聚会，以传播革命宣传品、“开通士子知识”作为主要任务，郭肇明也常奔走其间。花园山聚会，也称“花园山机关”，虽无正式组织形式，实际上是湖北革命团体的源头。20 世纪初，为了抵制帝国主义抢夺铁路利权，各地兴起铁路商办，后来发展为“保路运动”。1909 年 10 月，湖北各界 40 余人在省教育会集会，成立湖北商办铁路协会，会长刘心源，副会长吴兆泰，下设书记、会计、庶务、纠查员、招待员、起草员等职位，其中庶务由蔡文会、李国镛、郭肇明、张子林、刘邦骥等 5 人担任。湖北铁路协会在全省设立分会，发动各地官民踊跃筹款，郭肇明作为郧阳地区代表挺身而出，承担筹款任务。

辛亥革命前夕，新军和学生中很多倾向革命，尤其是两湖总师范、文普通、方言等学堂以及各兵营，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剪掉长辫子。彭刘杨三烈士就义后，武昌城内人心惶惶，郭肇明向当局施压，设法保全被捕革命学生。蔡寄鸥《鄂州血史》记载：“郭肇明回校，向学生安慰一番，大家方才放心。然而别的学校，都是人人自危，尤其是各营盘的士兵，恐怖得更加厉害。”郭肇明的多方优容和暗中保护，使很多革命者留在武昌，为武昌首义作出特殊贡献。两湖总师范学堂学生中，张振武、苏成章、牟洪勋、高震霄、蔡济民等数十人参加辛亥革命，后在军政府中担任主要

职务。

武昌起义爆发后，省城内学堂陷入停顿，两湖总师范学堂破坏尤为严重，图书、设备焚毁殆尽，校舍被军队占据。1912 年 10 月，郭肇明被委任筹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省一师”）。次年，新学校在原文普通中学堂校址开办，郭肇明被任命为首任校长，不久被以“不受节制”为由免职。民国时期，湖北政界和教育界的派系斗争严重，从开办到撤销的 13 年间，省一师校长更迭达 10 人、12 次之多！当时掌控湖北教育界的是李廉方、张继熙为首的“经心派”，郭肇明作为“两湖派”代表处于下风，随着郭的免职则更加衰落。

1913 年 3 月，湖北省第一届议会成立，覃寿堃任议长，郭肇明被推选为议员。1913 年 4 月，他被增选为国会第一届候补参议员。1914 年 2 月，湖北省议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自行解散。1916 年 10 月，黎元洪继任总统后，恢复郭肇明等议员身份。1918 年 12 月，郭肇明当选湖北省第二届议员，后担任副议长。民国初年，外省军阀长期霸占湖北政坛，议会中党争不息，多数议案有头无尾，遭人轻视和诟病。1920 年，湖北省长之争中，湖北省议会分为三派，其中平社 42 人，崇正俱乐部 56 人，中立派 6 人，为首者即郭肇明。可见，郭肇明在湖北政界和教育界中较为孤立，并不得志。政局和教育界的乱象，让不惑之年的郭肇明走上同情和参与革命运动的道路。

担任武汉中学董事长

辛亥革命后，董必武和詹大悲为共和而奔走，受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决心“从头来”，用办报纸和办学校的方式去唤醒民众，组织群众。在董必武等多方筹措下，私立武汉中学筹办工作开展得井井有条，校址和校舍、开办费和基金、董事会的董事长、教员职员、学校立案等问题先后解决。武汉中学董事长，董必武提议由郭肇明担任，获得大家一致赞成。郭肇明与当时多数官僚和政客不一样，他信任董必武，勇敢地和进步力量站在一起。1963 年，董老在《私立武汉中学简记》中写道：“关于董事长和董事会问题。学校创办人为学校董事会董事。董事长公推竹山人湖

北省议会议员郭肇明担任，郭曾任两湖师范学校校长，是张国恩、刘鼎三、李缄三、刘质如的老师，湖北著名的教育家，国民党员。借郭之声望，学校立案就少受阻力。郭忙，不能出席董事会，又公推其乡人崔琴甫为董事，所以董事因添了郭、崔，就由九人成为十一人。”由于郭肇明居中斡旋，私立武汉中学顺利在省教育厅备案，具备了办学资格。

1920 年 4 月 10 日，武汉中学在武昌涵三宫的湖北教育会西侧支郡师范学堂旧址上正式开学。学校聘请了许多进步教员，采取新的教学和管理方法，多招收贫寒家庭子弟，很多来自黄安、黄冈、麻城等鄂东北地区。学校首期开设两个班，以后每季增设一班，约五十至六十人。到 1923 年春，学校招满八个班，直到 1928 年武汉中学停办。董必武团结全校教职员，把这所极为简陋的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很快成为武汉地区首屈一指的新型中等学校。

武汉中学创办以后，成为湖北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中心。董必武、陈潭秋等除了完成每天的教学任务外，还经常找学生促膝谈心，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接受新思潮；通过恽代英主办的利群书社，设法为学生购买《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邀请李汉俊、钱亦石、恽代英等人到学校演讲，传播和宣传革命思想。1920 年 10 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妇女读书会、青年读书会。通过这些组织团结进步青年，把他们引导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由于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 7 名成员中，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 3 人在武汉中学教书，这里成了小组的主要活动地点。1920 年 11 月，由董必武等发起，在武汉中学召开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受到进步思想熏陶，武汉中学许多师生走上革命道路，黄麻起义 10 位指挥者中的 4 位从这里毕业，“朴诚勇毅”的校训成为大别山精神的一部分。

革命烈火形成燎原之势，引起教育界反动势力的敌视。湖北省教育会会长谢世钦勾结警察署，勒令学校停课，妄图封闭学校。董必武和郭肇明拿出省教育厅颁发的批文予以驳斥，赶走警察，使其阴谋未能得逞。

寓革命于职业教育和平民教育之中

郭肇明（左）和董必武合影

共产党成立后，发动群众和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心任务。1922 年，在董必武、陈潭秋领导下，湖北女子师范学校和省一师先后爆发学潮，反对封建守旧势力违背社会潮流、推行旧式教育、压迫革命师生的行径。“女师学潮”发生后，省一师校长刘凤章将几个支持和参与的学生开除学籍，这些学生不堪重压，悲愤溺水而死。在董必武领导下，学生爆发抗议运动，刘凤章被迫辞职，由郭肇明、居励今等接任校长，董必武、钱亦石和陈荫林等受聘到校任教，开始对学校进行改革，省一师成为武汉地区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之一。

面对政局混乱，内忧外患，教育救国呼声日趋高涨，职业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等多种教育形式出现。为了促进师生接近工农大众，更好传播马克思主义，董必武、陈潭秋等联系其他学校，发起成立湖北教育社和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通过这两个组织发动各校师生，办起劳工学校、女子补习学校，识字班、平民夜校，传授文化知识，宣传革命道理。1923 年初，董必武等发起成立湖北职业教育研究社和湖北职业教育促进会。湖北职业教育研究社分研究、干事两部，郭肇明为名誉董事长，董必武为董事长，陈潭秋、钱亦石、恽代英等为董事。该社以教育发展职业、以职业扩展教育为目标，创办《职业》杂志。

1924 年，董必武、张国恩组织成立了启明工读学校。经郭肇明居中斡旋，学校很快获得省教育厅备案，并将位于武昌佑新巷省立半日制学校校舍一半作为校址和研究社与促进会办公地。启明工读学校师生坚持半日教学、半日工作，附设江汉编印社。编印社设备精良，服务良好，除印刷

革命书刊、编印平民教育读本外，还承接了不少政府、学校和社会的业务。启明工读学校和江汉编印社是当时湖北共产党地下活动的重要场所。工读学校还办有粉笔制造社、墨汁社、鞋粉社、牙刷鞋刷制造社等。在郭肇明、董必武等督导下，启明工读学校成效显著，学校产品质量好，业务兴盛，这些为日后开展工农运动作了准备。鄂豫皖苏区领导人王平章就曾在这里从事印刷革命书刊的工作。

投身国民大革命洪流之中

从 1924 年至 1927 年，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国民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在以董必武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湖北的大革命风起云涌，高潮迭起。郭肇明作为湖北政坛的重要人物，在这场国民大革命中也有积极影响。

1925 年，“五卅运动”后，英国、日本制造了多起屠杀民众的惨案，全国各地兴起反帝爱国运动。6 月 11 日，汉口租界内英军悍然向游行工人开枪，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一惨案”。惨案发生后，武汉各界爆发抗争活动。7 月 6 日，湖北各社团外交后援会和旅京同乡召开联席会议，成立湖北外交委员会，聘郭肇明、时象晋、张知本等人为委员。7 月 13 日，湖北外交委员会提出交涉条件，如严惩肇事者，赔偿损失、收回租界，撤销领事裁判权、内河航运权，并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由于北洋军阀的软弱和阻挠，交涉完全失败，这进一步激起了民众支持大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热忱。

1926 年 3 月，时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的董必武在汉口花楼街洪益巷内（后迁至锦春里 2 号）创办了《楚光日报》。《楚光日报》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报，但领导人全是共产党人，实则是在我党直接领导下公开出版的一份报纸。董必武提出，报纸的基调不能太红，要用“灰色”包装起来，求得存在，站住脚跟，取得阵地。该报独树一帜，经常以社会新闻版刊登有关工人、农民、学生的消息和报道；采用浅近文言，通俗易懂；每周出版一期画刊。《楚光日报》很受工农大众和青年学生欢迎，销售量达到 7000 多份，发行了 400 多期。《董必武传》记载，“董必武还用文化

界名人郭炯堂的名字履行了登记手续，自己则担任社长，总编辑由共产党员、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筹备主任宛希俨担任。其他主要记者、编辑龚孟贤、划竹贤、祖山竹都是共产党员。”“文化界名人郭炯堂”就是郭肇明，有的地方误写为董必武“化名郭炯堂任经理”。用郭肇明的名字登记，既由于郭肇明在文化界和政界的崇高声望，也源于他对革命和董必武的一贯信任和支持。

1926 年 8 月下旬，北伐军进入湖北，北洋军阀垂死挣扎，到处捕杀革命党人。9 月初，北伐军围困武昌城，因遭到军阀陈嘉谟、刘玉春等负隅抵抗，一个多月未能攻克，城内几十万居民粮食与饮水短缺，两千多人饿死。郭肇明等秘密成立武昌攻城别动队总指挥部，做北伐军攻城的内应。为了拯救苍生，郭肇明联合各界人士成立妇孺救济会，帮助武昌城百姓度过灾荒。10 月 10 日，北伐军光复武昌。郭肇明参加阅马场群众集会，登台致欢迎词。

北伐节节胜利的同时，国共矛盾却日益激化，国民党“分共”“清党”的反动势力占据上风，多处爆发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反革命政变。“七·一五”政变后，董必武被搜捕，郭肇明尽力掩护并帮助其离汉赴沪。经历此番腥风血雨，郭肇明心灰意冷，1928 年在武汉病逝，年仅 58 岁。武汉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辛亥革命党人张难先得此噩耗，写了一副悼念挽联：“革命党内老同志，湖北省中大伟人。”这是对他恰如其分的评价。郭肇明灵柩由家人运回竹山，停放于县文庙内，后葬于竹山县城东北田沟，即现在城关镇刘家山村，目前墓碑尚存。

从莘莘学子成长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郭肇明一生倾心于教育事业，是近代湖北教育变革的见证者和推动者。从辛亥革命到共产党诞生、国民大革命，在几次重大历史关头，他深明大义，作出正确的抉择，扮演进步的角色。尤其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与董必武肝胆相照，创办武汉中学，推动平民教育，为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从郭肇明身上可以看到，中国革命是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接续奋斗而最终取得胜利的。

卢纲[①]

武汉黄埔与中共建军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也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建校和北伐赤色首都武汉建都95周年，这些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有着其内在的必然联系。因此，梳理探析一下黄埔军校与中共建军的历史渊源，特别是其中武汉分校与中共建军的历史关系及武汉黄埔军校对中共建军的历史贡献，填补这段历史空白，补上历史这一课，是个绕不开的重大课题。对于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来处，赓续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继承发扬伟大的黄埔精神，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武汉黄埔军校与中共建军的渊源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亲自领导下，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于1924年在广东广州黄埔区长洲岛创办的一所著名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共在军校中着力思想、政治建设，促进确立爱国革命的精神，在军校中形成了国民党主抓军事、共产党主抓政治的局面。军校采用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针，将黄埔军校办成一所新型的军事政治学校，为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培养了众多的军事、政治人才，也为中共建军准备了大批优秀的政治、军事干部，成就了黄埔军校近百年来的辉煌。黄埔军校甚至被誉为与美国西点军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等齐名的世界级著

① 作者系湖北省政协委员，湖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湖北广播电视台高级记者。

名军校。

1927 年 1 月 19 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两湖书院”旧址开办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在创建黄埔军校时，中共对孙中山先生给予了极大支持，不仅从全国各地选派优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踊跃报考军校，而且派周恩来、恽代英、聂荣臻、萧楚女等一批中共干才担任黄埔教官。中共不但为黄埔军校创立了一整套新型的政治工作制度，还为建立革命武装在思想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

黄埔军校虽然在中国大陆开办了二十三期，但中共党籍的黄埔师生，主要集中在一期到六期，因为这个阶段为国共合办时期。1926 年 10 月，北伐军光复武汉，国民革命的浪潮从珠江流域席卷到长江流域。为迎接革命大发展，满足政治、军事人才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将位于广州的黄埔军校政治科移至武汉武昌，设立分校。1926 年 12 月，黄埔军校五期政治大队 500 余人，1927 年 1 月，黄埔军校五期工兵大队和炮兵大队 1200 余人，三科合计 1800 人左右先后迁往武汉创办分校；加上 1927 年 2 月，武汉分校招收的第六期政治科入伍生总队男生 986 人、女生 213 人，近 1200 人；再加上 1927 年 4 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学兵团并入武汉黄埔的 1300 余人；“四一二”后，从广州、长沙两地黄埔革命师生和湖北省农协农民培训班两批学员来到武汉黄埔军校的数百人，算上武汉黄埔的教职员工，其人数相当甚至超过广州黄埔本校前四期毕业生 4971 人的总和。因此，史料记载“武汉分校规模之宏大不亚于黄埔主校，有男女学生及入伍生 6000 余人，实为中国腹部武装革命势力之大本营”。

“四一二”“七一五”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在一片风声鹤唳的白

色恐怖下，受恽代英等著名中国共产党人影响的武汉黄埔军校师生，大多投入到中共领导的“用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的坚苦卓绝的斗争中。武汉黄埔军校师生有数百人参加了南昌起义，还有一些参加了秋收起义，另外 1000 多人参加广州起义等中共建军的三大武装起义，产生了陈毅、徐向前两位元帅，罗瑞卿、许光达两位大将，程子华、陈奇涵、陈伯钧等一大批高级将领，还有赵一曼、胡兰畦、谢冰莹等巾帼英雄。中共党史、军史上一大批著名人物和将帅，都与武汉黄埔有着很深渊源。

黄埔军校为中共建军奠定思想、政治、组织、人才基础

黄埔军校对中共建军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前六期，前六期又分为广州黄埔本校和武汉黄埔分校两个阶段。武汉黄埔军校对中共建军的特别意义在于黄埔军校由广州黄埔的国共双方合作逐渐演变为武汉黄埔的中共实际主导。1927 年 1 月 19 日，武汉黄埔军校被命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一般简称黄埔武汉分校。1927 年 3 月 22 日，鉴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迁至武汉，国民党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取消分校名称，将武汉分校正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从名义上和实际上，武汉分校都已经成为黄埔本校，徐向前元帅把它称为“第二黄埔”，是比较形象的。这里指的“黄埔”，不仅是个地理称谓，更作为一个历史和品牌概念。黄埔军校（广州黄埔军校一至六期和武汉黄埔军校五至六期两个阶段）为中共建军锻造了爱国、奉献的黄埔精神，为中共建军积累了宝贵理论和实战经验，培育了大批军政人才，在思想、政治、组织、人才等主要方面打下了重要基础。

黄埔军校与中共的思想建军。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开始，就以革命精神培育黄埔师生，他亲自批准将这样一副对联贴在军校大门上：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周恩来、恽代英等黄埔军校中的中共精英，根据孙中山提出的建军纲领，进行了一系列建立革命武装的思想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探索，他们制定政治教学总纲，其主要课程的精神要义是：“养成士兵确定革命观”“为打倒一切压迫中国民众的黑暗势力，解放全中国民族，建立独立自由而作战的军队”，等等。

在武汉黄埔阶段，每周例行的全体师生训话中，恽代英等号召：要学习先烈，不怕牺牲，为革命奋斗的精神！在教学与训练中，既让学生有了一定的政治理论知识，又使学生在思想上确立了“爱国、革命、团结、奋斗”等黄埔军校的“三观”。

卢立群（作者祖父）大革命时期，任武汉黄埔军校教官

黄埔军校与中共的政治建军。中共从黄埔军校开始了创建人民军队的探索，其中包括主要在黄埔军校设置的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党代表制度源于苏联 10 月革命，黄埔军校一建立，首先就将这一制度确立下来，党代表制度使军队逐步由“私人工具”变成为“党的武力”，更进而成为实现“理想的先锋”，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校和军队的领导。政治部制度也对中共建军产生了重要影响，黄埔军校的办学宗旨就是要培养造就既能进行军事指挥，又能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的军政人才，由此在军校专门设立了由共产党人负责的政治部。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中七个军由共产党人担任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为军队培养出一套“为主义而奋斗，为民族而牺牲”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锻造出了一支有理想、有信仰的铁军、钢军。“四一二”后的武汉黄埔时期，恽代英要求每个学员区队中加设一个指导员，“代替政治部做工作”，这实际上都为中共“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等原则奠定了基础。

黄埔军校与中共组织建军。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掌握军队，始于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1924 年秋冬）之际，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在廖仲恺及苏俄顾问支持下，以黄埔教官、学生为骨干，组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一年之后（1925 年 11 月），在铁甲车队的基础上，组建了第四

军独立团，亦即叶挺独立团。铁甲车队和叶挺独立团在两次东征、北伐战争中，克敌制胜，威震敌胆，屡建奇功，这是中共独立组织和领导军队的开端。叶挺独立团北伐到武汉后，以独立团的干部为基础，组建了几支部队，如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等。这些部队后来有的参加南昌起义，有的参加了秋收起义，武汉黄埔军校师生除了一部分参加上述两大起义，其他则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由此可见，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开始独立组织、掌握军队，是中共建军的源头，为中共建军创造了宝贵的实战经验和建立了基本的组织机构。

黄埔军校与中共人才建军。中共建军初期的武装名为“工农红军”，是中共掌握的工人、农民的武装，由之前各地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等组成，其中大部分带兵的军事骨干则来自于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前期不过是个学制半年左右的速成军政学校，为何能造就将星如云的历史奇观？究其原因，一是生源好，学生大多是有文化、有抱负的进步青年；二是进对了门、走对了路，铸就了爱国、奉献的革命理想，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三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时代，提供了报效国家、大展宏图的历史机遇和舞台。广州黄埔师生在中共军队中资历较早，武汉黄埔师生在中共军队中人数更多。1956年我国实行军衔制时，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中，黄埔军校出身者有五人，他们是林彪、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共和国的十位大将中，黄埔军校出身者占三名，他们是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在57名共和国的上将中，黄埔军校师生占有8人，黄埔军校师生还有中将9人、少将11人。这还不包括在1956年授衔前虽然够格，却已经牺牲或未授予军衔的师生53人，计89人，仅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解放军将帅录中，足见黄埔军校师生在中共军队高级将领中军阶之高、占比之大、影响之深，同时也佐证了黄埔军校是中共建军人才的摇篮。

武汉黄埔军校是中共建军的雏形

武汉黄埔军校在中共领导下。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形势发展急需大批军队政工人才继续北伐，北伐军总政治部主

任邓演达在汉创办政治训练班，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将位于广州的黄埔军校政治、工兵、炮兵三科先后移至武汉武昌。1927 年 1 月 19 日，又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分校选址在位于武昌文昌门、平湖门之间的两湖书院旧址，同时面向全国招收新生。3 月中旬，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军校决议案，改分校为本校、改校长制为委员制，谭延闿、邓演达、恽代英三人为常委，恽代英兼任政治总教官主持军校实际工作，成为武汉黄埔军校的灵魂人物。

黄埔军校担任特别教官和政治教官的人中，既有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邓演达等，也有中共党员，如董必武、毛泽东、包惠僧等，还有社会精英，如许德珩、沈雁冰、卢立群等。军校设有健全的中共党团组织，由恽代英、施存统、陈毅组成军校党委，陈毅具体负责内部党务。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青年在学生中间，占了绝对优势，其中一部分青年团员在入校后多数转为共产党员。武汉黄埔军校实际上已经置于中共的领导之下，成为中共军政干部的培训基地和令蒋介石闻之色变的“赤色黄埔”。

武汉黄埔军校的办学与工农运动相结合。1927 年 2 月 14 日，武汉分校正式开课，政治总教官恽代英亲自编写教材，给学生上课。他指出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要使军队与人民结合，使之成为人民的军队。1927 年 1 月 3 日，武汉工人、学生、市民在汉口江汉关附近集会庆祝北伐胜利、定都武汉，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政治科学生 30 多人在现场进行演讲时，英国水兵用刺刀驱散集会群众，伤数十人，激起武汉人民反帝的怒潮。惨案发生后，武汉黄埔政治科宣传队组织了“一三惨案化妆宣传队”，连续 5 天在汉口血花世界进行演出，支持和鼓舞武汉人民进行反帝斗争。军校师生还发表宣言通电全国，要求严惩凶手、收回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和武汉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推动武汉国民政府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成功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成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获得的反帝斗争的重大胜利。恽代英主持的武汉黄埔军校与毛泽东同期在武汉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国共合办中共主导，著名共产党人实际领导，双方的教师相互兼任，

杨森、夏斗寅叛乱时，农讲所学员还参加了由武汉黄埔师生组成平叛的中央独立师，武汉黄埔与农民运动就此结缘。

武汉黄埔军校师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武汉黄埔军校创办于如火如荼的大革命风暴中心、北伐赤色首都武汉，虽然前后不过半年左右，却先后经历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杨森、夏斗寅叛乱，直至武汉分校解散等。武汉黄埔师生在战火中成长，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5月13日，驻防鄂西南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策动下，与川军杨森等暗中勾结，公开发动叛乱，兵分三路直逼武汉。此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正在河南与军阀张作霖南犯的军队殊死拼杀，武汉防务空虚。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国民党要员们纷纷准备逃跑，在这危难关头，武汉政府急调叶挺率部抵御叛军。5月10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将武汉黄埔军校等临时改编成中央独立师，以恽代英为党代表、侯连瀛为师长，配合叶挺卫戍武昌的军队，南下镇压夏斗寅的叛乱。在叶挺的指挥下，中央独立师配合第二十四师等部队，经过激战，打败了夏斗寅叛军，解除了武汉的危机。武汉黄埔师生们参加了坚苦卓绝的战斗，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凯旋而归。

三大武装起义中的武汉黄埔师生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形势风云突变，武汉黄埔军校中共组织，将已暴露的党员相继撤走，党的活动由公开转入秘密。武汉黄埔军校学生的毕业分配，也被迫提前，5月第五期政治科第1队毕业的200多人，部分被分到我党实际掌握下的湖北省保安队。7月16日，武汉黄埔军校决定，将军校中名声较大的、已经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或在城市隐蔽下来从事地下工作，或深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或转移到贺龙、叶挺所部充实力量，仅派往贺龙所部的就有陈赓、段德昌、范长江等300多人。7月18日，第五期工兵、炮兵等科学生800余人，由恽代英主持在武昌两湖书院举行毕业典礼，被分配到包括贺龙、叶挺所在的第二方面军各军。女生队也被迫提前结束，有80人左右留下来，编入第二方面军军医处或医院等。7月21日，武汉黄埔军校被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

作者在位于武昌彭刘杨路的武汉黄埔军校旧址前留影

整体接收，在校学生 1300 多人被编为军官教导团，由严复生任团长，后为叶剑英，季方任参谋长。至此，武汉分校结束。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为了反抗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中共领导了三次重要的武装起义，分别是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三大起义是中共建军的开始，是中国工农红军和人民军队的起点。

八一南昌起义中的黄埔师生。8 月 1 日，中共领导发动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是中共建军三大武装起义中最早、最大的一次，史称八一南昌起义，这一天后来也成为中共军队的建军节。南昌起义高级干部中的黄埔人：主席团成员前委领导周恩来（黄埔教官）、恽代英（黄埔教官）；二十军党代表廖乾五（黄埔教官）、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黄埔二期）、二十军参谋长贺声洋（黄埔一期）、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李明铨（黄埔四期）、第二师党代表陈恭（黄埔二期）、第三师师长周逸群（黄埔二期）、第十一军党代表聂荣臻（黄埔教官）、第

十一军政治部主任罗懋奇（黄埔教官）、二十四师党代表阳翰笙（黄埔教官）、二十四师参谋长蔡申熙（黄埔一期）、十师三十团团长范苣（黄埔教官）、第四军二十五师师长周士弟（黄埔一期）等。武汉黄埔军校的五期、六期，由于刚毕业不久，大多为各支部队中的基层官兵，在一线冲锋陷阵，有名可查的大约有 114 人，如许光达等。

秋收起义中的黄埔师生。1927 年 9 月 9 日中秋节，由毛泽东和卢德铭等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秋收起义是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的一部分，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秋收起义中共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了自己的旗号，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打出了带有镰刀、斧头、五角星的第一面军旗。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途中，进行了“三湾改编”，核心内容就是建立党代表制度，把支部建在连上，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它正是借鉴了黄埔时期的党代表制度。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共三个团：第一团由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和来自湖北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 2000 余人组成，是起义的主力部队，第二团由安源矿工及平江农民自卫军等组成，1000 人左右，第三团由浏阳农民自卫军 1600 人组成，秋收起义也是由湖北武汉来的队伍作为主力。秋收起义高级干部中的黄埔人：总指挥卢德铭（黄埔二期）、副总指挥韩浚（黄埔一期）、师长余洒度（黄埔二期）、一团团长钟文璋（黄埔二期）、二团政委蔡以忱（黄埔教官）、三团团长苏先骏（黄埔四期）等。武汉黄埔军校五期、六期，有名可查的大约有 21 人，其中比较知名的有陈伯钧、谭希林、臧克家等。

广州起义中的黄埔师生。1927 年 12 月 11 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恽代英等在广州发动的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广州起义高级干部中的黄埔人：政治领导人、政府秘书长恽代英（黄埔教官），副总指挥叶剑英（黄埔教官），南方局军委委员赵自选（黄埔一期），广东省军委负责人聂荣臻（黄埔教官），广州市军委书记黄锦辉（黄埔一期），广州工人纠察队队长季步高（黄埔四期）、第四军警卫团团长蔡申熙（黄埔一期）、起义指挥部参谋兼第四军警卫团参谋长陶铸（黄埔

五期）等。广州起义的主力为第四军教导团，该团全部由武汉黄埔军校学生军改编而来，叶剑英兼任团长，该团共1300余人，装备较好，战斗力也较强，是广州起义的5000人中最主要的武装力量。

黄麻起义中的黄埔师生。黄麻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27年秋收起义的组成部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新四军二师、新四军五师等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均由黄麻起义发展而来。黄麻起义及鄂豫皖高级干部中的黄埔人：黄麻起义总指挥潘忠汝（黄埔五期）、黄麻起义副总指挥吴光浩（黄埔三期）、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曾中生（黄埔四期）、鄂豫皖红一军军长许继慎（黄埔一期）、鄂豫皖红一军副军长徐向前（黄埔一期）、鄂豫皖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黄埔一期）。

尹新秋 ①

武汉空战最后一位亲历者的回忆

做了二十多年电视，留下的影像资料不多，我没有攒资料的习惯。采访吴鼎臣的素材，却一直珍藏着。刻了光碟，怕不保险，在电脑里、硬盘里，还做了几个备份。那是武汉空战最后一位亲历者的深情回忆，饱含着民族情感与军人的荣耀。

初访吴鼎臣

一直想做 1938 年武汉空战的片子，那是抗战史上精彩的一笔：2 月 18 日，击落日机 12 架，我方 5 名飞行员牺牲；4 月 29 日，击落日机 21 架，我方一死一伤：陈怀民以身做弹，血洒长空；吴鼎臣的飞机被敌机打中油箱，面部烧伤，成功跳伞。两次较量，伤亡人数和飞机坠落架数，我方都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的武汉空战宣传栏

① 作者曾任武汉电视台高级编辑、海外专题部主任。

远少于敌方。武汉这片天空，告诉了日本侵略者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嚣张。

那年在厦门召开纪录片选题会，我就报了空战的选题。央视的陈晓卿说，他也一直想做，可惜影像资料太少。他只收集到日本随军记者拍的几个镜头：日本飞机从安徽飞往武汉的画面。上海台一位同行也想过这个选题，从钱包里取出陈怀民的照片给我，说陈怀民是她的偶像。我是第一次看到陈怀民的照片，那真是英气逼人。后来，采访郝梦龄将军的女儿郝慧英。她说，那次空战，她们都跑到房顶去看，当看到陈怀民撞向敌机，敬佩得不得了。一张照片，一个目击者的采访，几个资料镜头，画面感觉还是太弱了。听民革的朋友说，吴鼎臣还健在，住在监利。他女儿 17 岁从武汉下乡到监利人民大垸农场，在那里结了婚。吴鼎臣退休后，跟女儿住一起，有时还会来武汉。我一下子兴奋起来，便托朋友帮忙联系采访。

2001 年 6 月 21 日下午，朋友来电话，说吴鼎臣到了武汉。赶到上海路他落脚的地方，他正躺在沙发上休息。吴鼎臣身材魁梧，喝了一点酒，面色红润。要不说，看不出脸上的烧伤。他是 86 岁的人了，声音洪亮，思路也清晰。他很乐意回顾空战那段历史，讲述起来，绘声绘色，那些是他忘情和兴奋的时刻。他说采访拍摄的时候，先到陈怀民路走一走。4 月 29 日，他和陈怀民的飞机，都是大队长领队长机的僚机，陈怀民的飞机在机群最前面，也是最先被敌机包围的。然后去解放公园苏联空军烈士纪念碑，当年对日空战，苏联志愿队 100 多人牺牲，15 位烈士埋在这里，其中，有他并肩作战的战友，他边走边说。再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那里有空战的展览，可以边看边说。

与周恩来未见面的“一面之缘”

参加过武汉空战的飞行员，中国大陆就吴鼎臣还健在。即使能寻访到其他的亲历者，恐怕也没有他那样传奇的故事。陈怀民路，解放公园苏联空军烈士纪念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吴鼎臣提到的几个拍摄点，我们一一拍过了。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挂了周恩来的戎装照。自然想起了吴鼎臣说周恩来看望他的事。“四二九”空战的第二天，吴鼎臣从徐家棚粤

吴鼎臣用日军飞机残骸做的铝盆

汉铁路医院转到汉口万国医院，即现在的武汉中医医院。听人说周恩来看他来了。周恩来这个名字，他当然听说过，但没见过真人。当时他听到声音好熟悉，是乡音，淮安离他老家涟水只有60里。他脸上缠满了纱布，想把眼睛上的纱布拉下来。周恩来赶紧拦着，说，别这样，别这样，以后还可以见面。安心养伤，养好了再上前线。

吴鼎臣喜欢讲这没见到面的“一面之缘”。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周恩来的身份是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1938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周恩来担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的陈列展品中，有一个不起眼的铝盆。它正是由中国第一代抗日飞行员吴鼎臣捐赠入馆。当年，吴鼎臣和战友们将打下的敌机残骸制成各种生活用品，其中就有这只铝盆。它不仅用来洗脸、烧水，每当发现敌人偷袭，战士们还会“敲盆示警”。

纪念馆讲解员在讲铝盆的前世今生，讲得很好，但让人总觉得还是隔了一层。其实，我们的画面，我们的解说，不管如何费尽心思，也不可能会有那种亲历的味道。

回忆武汉空战

2001年6月24日上午，我们再去上海路。由于种种原因，吴鼎臣始终不愿面对镜头。可是，节目急着要播，为庆祝建党80周年，武汉空战的内容要编进《抗日烽火》。无奈之下，我们只好进行隐蔽拍摄。

我们把三脚架放在一边，摄像机搁在腿上。很多人都知道，摄像机工作时，红色指示灯会亮。但很多人不知道，关掉指示灯，摄像机照样在

拍摄。老人家以为没开机，很快就进入了回忆。

吴鼎臣回忆武汉空战时指出面部的烧伤处

4月29日是什么日子呢？是天长节，日本天皇的生日。日军有意在那一天对武汉狂轰滥炸，好回去报喜，给天皇祝寿。前两天得到这个情报。本来我们到了海南，准备出击日军的空军基地。知道这个情况后，立马回撤。我们三十几架飞机，苏联志愿队驻在南昌，他们来了18架。那天，日本来了54架飞机。双方飞机数量差不多。我们击落敌人21架飞机，苏联一死一伤，我们中国一死一伤。陈怀民牺牲，我受伤。

中途我们换了一块电池，换了一盘磁带。他耳背，听不到我们的小声交谈。他已经沉浸在回忆里，眼前只有战斗的场面。

两条狗打架，你们没见过吧？这个狗咬那个狗的尾巴，那个狗又咬它的尾巴。尾巴后面是被咬的地方。一咬，就转圈子了。战斗机也一样，一打起来，就转到它的屁股后面。我驾的是苏联E-15战斗机。4挺机关枪，都装在前面，后面一挺机关枪都没有，是致命的弱点。苏联飞机性能好，速度快，转弯灵活。我们引诱敌人跟到后面来，一来，我一个急转弯，一下追到它尾巴，把它打下来了。我为什么受伤呢？我们跟大队长一起，3架飞机，被敌人多架飞机包围了，突然听到“当当当当”。2月18号空战，我们不是死了5个人吗？椅子后面就加了防弹钢板。防弹钢板经住了考验，我觉得没问题，就沉住气，想再跟它转几个圈。敌人一架飞机侧面跟上来，把我的油箱打起火了。那

火烧得，赶快跳伞。晚一秒，就跳不起来了。

他的飞机前后四次被敌机打中或与敌机相撞，他四次侥幸生还。生与死，血与火，以及他的辉煌与自豪，都属于万里长空。

1936 年，他 21 岁，入笕桥中央航空学校五期。毕业后分到航空第四大队任战斗机飞行员。

1937 年 8 月 14 日，参加中日首次空战，后在江苏溧水击落一架敌机，他的飞机受创迫降。

1937 年 8 月 15 日，参加南京保卫战。

1937 年 9 月 19 日，参加沪宁保卫战，右腿受伤，被迫降落。

1938 年 2 月 18 日，参加武汉空战，击落日机一架，战机受损，成功跳伞。

1938 年 4 月 29 日，参加武汉空战，受伤跳伞。

1940 年 5 月 18 日，参加重庆空战。

……

苏联空军志愿队老战士赠送给吴鼎臣的纪念章（现藏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

说起空战来，他完全变了一个人，精神、状态、声调都变了，手势、动作也多起来了，摹声拟态，好像战斗就在今天打响，敌机就在眼前坠落。他感情丰富，表情也丰富。说到陈怀民牺牲，眼睛红了，声音哽咽了；说到自己受伤跳伞，惊险又到了脸上；说到把日本飞机的残骸放到中山公园展览，市民争睹，群情振奋，他开心地笑了。

如果说现实生活之外有梦境醉境，那么，对日空战就是他的梦境和醉境。不只是他自己陶醉其中，我们也醉在他的回忆里。同他一起紧张，陪他激动、兴奋、热血沸腾，几乎忘了身边的摄像机。

出门时，我们说过几天来拍。其实内容都拍到了，只是想掩饰一下偷拍的尴尬。老人家笑笑："你们换过电池。"我们原本以为瞒过他了，没想到中途还是被他看破。他只是不想中断回忆，不想中断讲述。那样惊心动魄的场面，那样激荡民族情感的战事，不应该出现断点。也许，是他意识到了对着他的摄像机，其实是站在他一边的。抗战和宣传抗战，是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统一战线"。

2012 年，吴鼎臣以 97 岁高龄离世。他那段影像资料更值得珍藏，我也更愿意与人分享。如果我知道台里台外的同行在做有关的节目，都会主动提供。武汉空战最后一位亲历者的生动回忆，应该去为更多的节目增色；长空见证的民族精神和抗日英雄的形象，应该闪耀在更多的荧屏上。

李笙清[①]　彭建[②]

档案记忆中的武汉新生

1949 年 4 月，伴随着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的巨大胜利，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失败已是大势所趋。同年 5 月，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兵锋直指武汉，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司令长官白崇禧率国民党军队从武汉仓皇逃离。5 月 16 至 17 日，武汉三镇兵不血刃获得解放，广大市民载歌载舞，欢庆江城回到人民手中，武汉的历史从此翻开新的篇章。

抚今思昔，在感受武汉日新月异的巨大变迁的同时，不禁令人想起武汉迎来新生的历史性时刻，想起那些为了这座城市解放而作出重要贡献的革命先辈，无不令人激情满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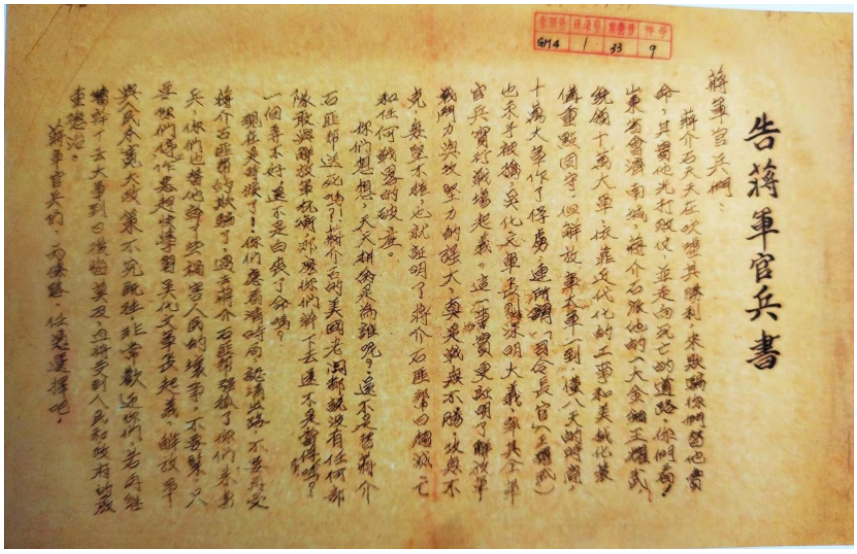
统战策反　助力解放

在武汉解放之前，中共地下组织冒着流血牺牲的风险，在武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秘密统战策反工作，为武汉的顺利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地下党寄给汉口市警察局 13 分局等处的宣传传单《告蒋军官兵书》，纸质，单张。钢板刻版，然后在褐黄色的纸张上用油墨油印而成，现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这件《告蒋军官兵书》由中共地下组织草拟印制，是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分别寄往国民党汉口市警察局 13 分局、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特捐处等部门的各种信件、宣传传单中的一种，字体娟秀飘逸，遒劲有力。

① 作者系武汉博物馆《武汉文博》编辑，馆员。
② 作者系武汉博物馆《武汉文博》编辑部主任，研究馆员。



宣传传单《告蒋军官兵书》

《告蒋军官兵书》内容分为三个自然段，第一个自然段结合当时全国的战场形势和济南战役中国民党军王耀武、吴化文两人的不同选择及结局，对敌军官兵进行了攻心诱导："蒋介石天天在吹嘘其胜利，来欺骗你们替他卖命，其实他光打败仗，并走向死亡的道路。你们看！山东省会济南城，蒋介石派他的一大金刚王耀武，统领十万大军，依靠近代化的工事和美械化的装备重点固守，但解放军大军一到，仅八天的时间，十万大军就作了俘虏，连所谓'司令长官'王耀武也束手就擒。吴化文军长则深明大义，率其全军官兵实行战场起义。这一事实更证明了解放军战斗力与攻坚力的强大，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无坚不摧，也就证明了蒋介石匪帮日趋灭亡和任何战略的破产。"第二、三自然段呼吁蒋军官兵："看清时局，认清出路……学习吴化文军长起义。"《告蒋军官兵书》宣传传单虽然没有印制时间，但从内容来看，济南战役发生于 1948 年秋天，可见这张传单应该是在济南战役结束之后印制的，对瓦解守敌军心、投向人民怀抱起到了一定作用。

地下活动　卓有成效

1946 年春天，中共南方局派曾惇与夫人王一南、工作人员徐远等人来到武汉，与先期到达的赵忍安、李声簧等人汇合，开始重建中共武汉地下党组织。1947 年 11 月，成立中共湖北省地下工作委员会，曾惇任书记。

1948 年 7 月，中共武汉市委员会正式成立，曾惇任书记，江浩然为组织部长，张文澄为宣传部长（11 月到任）。中共武汉地下组织相继在工人、职员、教师、新闻工作者、妇女积极分子中，发展了武汉工人协会、新武汉建设协会、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新民主主义建设工作者联盟、新民主主义建设者协会、新民主主义教育学会、新民主主义新闻学会、民主妇女联谊会等秘密外围组织，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在工人、青年、妇女和爱国人士中开展工运、学运以及其他民主爱国运动。中共武汉地下组织还运用各种条件，建立秘密收听站、地下印刷厂，创办油印小报，广为散发。大量翻印《新民主主义论》《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毛泽东著作及中共中央文告等重要文献，加强形势、政策的宣传工作。

中共地下党组织武汉电信局工人纠察队护厂，严防破坏

在武汉解放前夕及国民党军狼狈逃离、解放军进城之间的真空时期，中共武汉地下组织发动群众，护厂、护校、护公共设施，反搬迁、反破坏，保护了城市完整，为顺利接收武汉打下了基础。

中共武汉地下组织对武汉社会情况和敌特状况进行调查，由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组织编辑成《武汉调查》及《武汉调查（补篇）》资料 40 余万字，送往解放区，在郑州出版后随南下大军送到武汉，对中共中央中原局和第四野战军制定进入武汉的军管手册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1949 年 2 月，中共武汉市委建立以陈克东兼组长，吴明勋、陈陶、尚家齐为成员的策反工作组，对武汉国民党官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策反活动，主要是“三府两局一会一司”，“三府”即国民党湖北省政府、汉口特别市政府、武昌市政府；“两局”即汉口特别市警察局、武昌湖北省会警察局；“一会一司”即湖北省参议会、武汉警备司令部。汉口特别市市长晏勋甫、武昌市市长蒋铭、汉口特别市政府秘书长杨锦昱、警察局局长李经世、武昌湖北省会警察总局局长胡慎仪等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均被中共武汉地下组织策反，配合了武汉的解放、真空时期的社会稳定及城市各项接收工作的顺利完成。

张轸起义走向新生

在武汉解放的过程中，国民党高级将领张轸的阵前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武汉解放的历史进程。

张轸（1894—1981），河南罗山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武汉解放前任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十九兵团司令、河南省主席。抗战时期，张轸与八路军驻第五战区长官部代表朱瑞、唐天际有接触。1939 年在重庆期间，张轸先后与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共产党高层领导人见面，对共产党人有了全新的认识和评价。淮海战役前后，张轸曾派女婿张尹人前往解放区同邓子恢等直接取得联系，接受中共指示。

1948 年 10 月 31 日，中央军委给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电：“近张轸向我关系方面表示，愿举兵起义，称彼能直接控制的只有两个旅，另数师虽归其指挥，但动作时把握不大。希你处派代表前往信阳联络。接头办法：

去人须持有预先印好之名片，衔用私立南洋正德中学校长，姓名陈协一。见面时必须亲交张一个写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纸条即可……”指示电文中还提到张轸身旁有国民党特务监视，联络人必须与张亲自见面，不能经过第三人，可见当时张轸所处环境形势之险恶，亦可见他起义之决心。

1949年3月，张轸率部退到湖北，在武昌以南沿江一带担任江防任务。5月10日，张轸根据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的通知，派张尹人由金口渡江到沔阳县彭家场，与江汉军区拟定起义计划。5月14日，林彪、萧克密电十二兵团：“……敌鲁道源部十六号集中武昌南撤，张轸部拟由土地塘、山坡、贺胜桥三处向鲁部截击，张部要求我军以一部十六号在金口渡江配合……”

5月15日，张轸率所部第一二七军1个师、第一二八军3个师共2.5万余人在武昌以南30公里的金口、贺胜桥一带举行起义，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先遣兵团的军事行动，加速了武汉解放的历史进程。

入城在即　严明军纪

武汉解放在即，为严格部队入城纪律，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政治部曾印制了大量《入城纪律守则》，分发给干部战士，号召部队官兵切实遵守解放军总部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体现了人民军队保护城市与人民、秋毫无犯的优良传统。

这张《入城纪律守则》为单张，钢板刻版，然后在褐黄色的纸张上用蓝色油墨油印而成，落款时间是5月15日。武汉三镇解放的准确时间是5月16日至17日，根据《入城纪律守则》落款时间来看，可能是对敌人弃城而逃的时间有些估计不足，而由部队政治机关临时刻印散发的，虽然有些仓促，但对部队进城后的各项要求制定得具体而充分。

《入城纪律守则》共十二条，前面的引文开宗明义：“一切入城部队和接管城市的人员，均须切实遵守人民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约法八章布告与入城守则，严格保护一切，一切原封不动，等候接受。特规定入城纪律十二条，我全体指战员均须认真学习，切实遵行。”其后的十二条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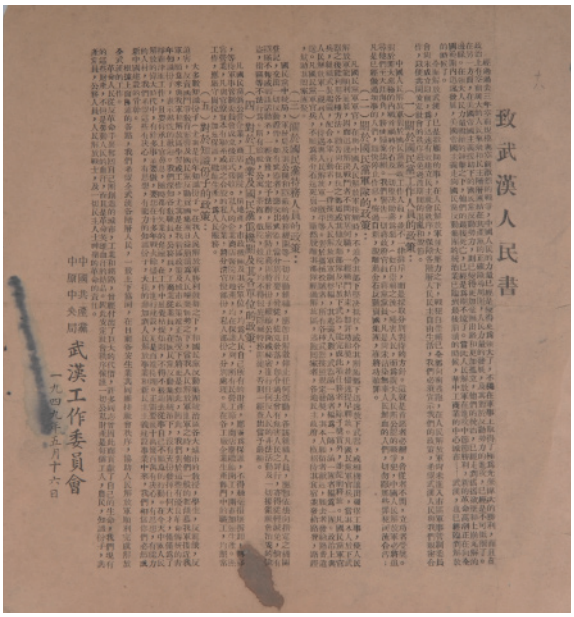
纪律的基本内容，要求入城官兵遵守市内卫戍、勤务、军风纪、交通及娱乐场所公共卫生等各项规则，服从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的指挥；保护市民生命财产不受侵犯，除抢劫放火、行凶等现行犯外，不得随意抓人。纪律守则中特别规定不许骚扰外侨，对公共房屋建筑及家具设备等不得移走、拆毁和破坏，对官兵与中外新闻记者的接触也有明确规定。要求官兵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看戏、看电影、理发、洗澡及进入公共娱乐场所游览、乘坐公共汽车等均须照章买票，照章给钱，不得要求免票或减价”，保持了人民军队的光荣本色。此外，纪律守则还对社会各阶层宴请、送礼，官兵借住或租住民房、整肃军容、提倡礼节，以及维护城市秩序、不得在城内放枪扰民、放养骡马牲口必须在城外等，均做了详尽的规定。

《入城纪律守则》的制定和颁发，是人民解放军实施城市接管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使入城官兵有了规范的行为准则，对维护新生的城市公共秩序、顺利接管城市发挥了积极作用。

多措并举　稳定人心

中国共产党中原中央局武汉工作委员会《致武汉人民书》，纸质，竖行排列。告示形式，针对武汉解放后国民党工作人员、国民党残余军队、国民党特务人员、工商业及国民党伪机关、各单位、知识分子分别制定了完善的政策。前面引文开宗明义，振聋发聩：“经过过去三年空前规模、空前激烈的战争，中国人民的力量已经是变得更为强大了，不独在军事上取得了极为光荣伟大的胜利，而且在政治上有空前广大的人民群众和民主阶层团结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周围，人民力量的发展，及其对于反动势力的进攻，已经是不可抵御了。……当此人民解放军在进攻中节节胜利，新的革命高潮正在向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美国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业已临到最后崩溃的时候，华中工商业的中心城市——武汉，也已经临到解放的时候了。”

根据《致武汉人民书》内容，显然是在“人民解放军尚未进入市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尚未成立以前”，目的是为了在武汉解放后迅速在武汉有


致武漢人民書

中國共產黨中原中央局武漢工作委員會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

中国共产党中原中央局武汉工作委员会《致武汉人民书》

效建立民主社会秩序，“保障各阶层人民民主自由生活”，避免武汉解放后出现“过渡期间的混乱和脱节”。

《致武汉人民书》正文有16行，按五项政策分为五个部分，内容详尽。每个部分的标题以较大字体排列，特别醒目。对国民党党政工作人员，采取的是分别对待的方针。对国民党官兵，只要放下武器，战斗结束后一律尽早释放，起义及配合我军行动的官兵，一律按照人民解放军军制整编，政治上与人民解放军一视同仁，待遇亦与人民解放军一律平等。对国民党中统局、军统局及其公开和隐蔽的特务机关等一切反动组织，应即日解散，停止活动，人员要依法向指定的机关登记，交出武器和一切反动证件，分别首要、胁从，从宽发落，而对隐瞒不报或潜谋活动者，一经查获，定予严办，并要求所有旅社、公寓、医院、茶馆、戏院、妓院均不得包庇隐藏国民党特务人员，否则一经查出当予以惩罚。对于国民党伪公企业、商店、医院、房地产、市政机关及其各单位，是人民自己所有的财产，将妥为保护，不得损坏、拆卸、转移，等待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后予以接收。属于私人的企业、商店、医院、房地产，都在保护范围之内。为稳定市场，所有民营工厂、商店要继续开工、开市，加强生产，照常营业。对与官僚资本有联系或与之合股的私人企业，将分清官僚部分和私人部分，分别处理。并要求所有工厂、企业生产部门的职工严守岗位，照常工作，加强保护，继续生产，为人民服务。对有决心、有思想、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希望他们“大批地参加到人民解

放事业和新民主主义建设事业中来”，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骨干”。《致武汉人民书》的最后，呼吁“全武汉各阶层人民，一致上下协同，在目前各安生业共同维持社会秩序，协助人民解放军顺利完成解放全武汉的工作”。

这份《致武汉人民书》是中国共产党中原中央局武汉工作委员会制定并印发，旨在武汉解放后，面对各个方面的情况在城市里实施多项政策，稳定人心，维持社会秩序，为即将建立的人民政权打下基础。

新生银行　欢庆解放

1949 年 5 月 16 日下午 3 时，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第四十军一一八师在师长邓岳、政委李伯秋的率领下，由刘家庙进入汉口市区，汉口解放；17 日拂晓，江汉军区独立一旅在旅长李人林、政委刘勇率领下从蔡甸开进汉阳市区，汉阳获得新生；17 日下午，第四十军一五三师一部从葛店进入武昌市区，武昌回到人民手中。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解放，人们载歌载舞，挥舞彩旗夹道欢呼，热烈庆祝。

1950 年 5 月，为庆祝武汉解放一周年，武汉市举行各种隆重的纪念活动，欢庆城市新生周年。当时，武汉各行各业多家单位纷纷制作武汉解放周年纪念品，如搪瓷脸盆、茶水杯、开水瓶等。四明银行制作了庆祝武汉解放周年纪念钱夹，黑色，皮质，手工制作，线缝。面皮上由左至右竖行印有“庆祝武汉解放周年纪念”“四明银行敬赠”等烫金字样。里层分左右两边，分别有装纸币、照片的夹袋，最里面的一层还有拉链。由我馆收藏的钱夹保存完好，只是由于已经过去七十余年，皮夹的面皮上已经有些褪色泛白。

四明银行创办于 1908 年，总行设于上海。汉口分行于 1919 年设立，坐落于汉口歆生路（今武汉市江汉区江汉路）的四明银行大楼于 1936 年落成。武汉解放后，作为旧社会的金融机构，四明银行“官股”部分由军管会派出的军代表接管。在随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四明银行于 1952 年 12 月与其他行庄合并组成公私合营银行，开始新的金融旅程。从这件四明银行纪念钱夹上，可以管窥当时人们对江城新生由衷的喜悦之情，以及被接管后的四明银行呈现出的新面貌。

罗建华[①]

新武汉服装业铿锵起步

1949年5月16日，新武汉一经诞生，伴随军需被服率先恢复生产，武汉服装业开始了转型发展的第一步。

父亲的经历，恰恰见证了这一起点。作为武汉地下党军需系统的一员，父亲先后协助军代表接收国民党军队联勤仓库和被服厂，更名为中南公安部被服厂，协助招募工人恢复生产，留下一张戴八角帽的单人照片，背面标记“中安被服”四个字。

父亲这一回忆，在《武汉服装志》中得到印证——“武汉解放后第二个月，即1949年7月中南公安部组织临时被服厂，招行业失业工人近500人缝制军装”“1950年元月到10月，先后有240家服装店承制中南军需部被服局的棉衣、被单、背包等军活。”

从此，伴随军需向民用的转换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武汉服装业实现了由个体向集体、分散向集中、店铺向工厂、门市加工向专业化规模生产、脚踏缝纫机向电机流水线、为富人服务向为大众服务等一系列划时代巨变，跻身全国大城市同行业前列。

“洋服独大”业态扭曲

1949年武汉统计局工业科统计“家底”：武汉服装店、裁缝铺共2647户10896人，其中汉口2100户9394人，占了绝大多数，显然这与大汉口的商业功能、市民结构、消费层次极为相关。

① 作者系长江日报高级编辑。

武汉解放前夕，中上层“洋装旗袍中山服”，富家青年“美式茄克西式裙”，平头百姓“对襟小褂扎腰裤”，一边是繁华闹市的大店，一边是偏僻角落的小摊，构成服装业的畸形生态。

早在清末长袍马褂当家的时候，汉口就有了“洋服店”。1909 年开设“祥康”专工男装，一开风气之先。共和创立之后，1915 年出现“胡海记”主理女装。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山大道“洋服店”比比皆是，集中在保华街至三元里的黄金地段，“怡和”“信康”“玉峰”“陈泰祥”“艾新记”，一家接一家。

从保华街到六渡桥，号称“军服店”的门面隔三差五，战时承接军活，平时主做保安、邮政及学生装一类制服。所谓“军服店”，其实有店无厂，窄小门面仅是一个业务接洽点，接到活临时招人，或干脆转包小摊赚取差价。有的连业务接洽点也没有，派出“店堂先生”背个包袱，带上面料出示样品，四处游走招揽客户。因此，这些人被称为“包袱师傅”，就靠串街走巷生存。

普通老百姓穿不起衣服，更买不起成衣，大多自己动手，粗针大线缝制便装，少量送料加工，给了一些个体裁缝活路。同时，也有人看准这个低端市场，采购劣质面料简单加工，发给摆地摊的到码头车站叫卖，这一类称“新货店”。坊间俗语“新货新货无好货”，从业人员一天“车”它七八件，为业界瞧不起，落了个“新货师傅”“浆糊师傅”外号，带有贬意或自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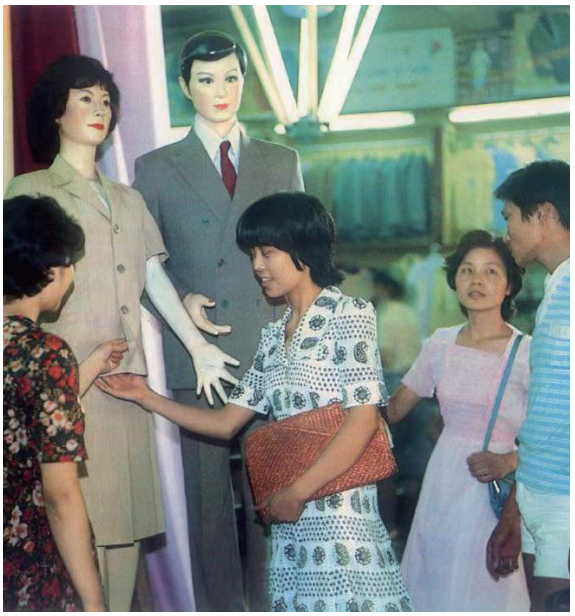
总之，“洋服店”标领风骚，“军服店”望天收割，“新货店”低端求生，三种店家分层明显；“红帮师傅”堂上打坐，“包袱师傅”风雨奔波，“浆糊师傅”埋头赶活，三种师傅地位悬殊。如此图景，反映出服装业的分散和隔膜，构成一种畸形生态，制约了技术进步和产能扩大，期待着从业人员和生产力的双重解放。

“军需力量”龙头高昂

中山大道朝上走，走到尽头是硚口，迎面横着几幢高大坚固的灰色楼群，门口设有岗楼。抗战前后，它曾两度是国军联勤总部汉口被服总

厂，中间一段由日军侵占使用。

汉口被服总厂员工大多临时征用，有活干，无活散，计件发工资，经常遭遇克扣和拖欠。1947 年 11 月，因物价飞涨而工资迟迟不发，工人索讨反遭厂长辱骂和关厂威胁，激怒全厂集合到市政当局请愿。遭遇特务滋事、警卫队阻挠，厂部秘书带人开枪打死两人、打伤十余人，酿成震惊武汉的“一一·七血案”。



“人民”挺括考究的西服

1949 年 5 月 16 日武汉解放，四野“江 031”被服厂接管空空的厂房，马上在璇宫饭店设立招募处，补充两千多工人开工，赶制被服支持大军南下作战。

1950 年，“江 031”“中安被服”“214”三家合并，番号改为“201”，俗称中南被服总厂，员工一万多人，成为中南地区最大的军需工厂，原有厂房已满足不了发展需要。1953 年，遇上新建解放大道经硚口路上行的契机，选址其相交之处拓建新厂。

硚口老厂房留下一个车间 300 余人，作为“加工科”开始为地方服务，不久单独建制称 202。1954 年，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岳阳 336 的武汉籍职工并入 202，“军转民”为武汉织造厂，后名武汉服装厂。

武汉服装厂诞生，成为武汉第一家国营服装生产大厂，拥有 800 多军需技术工人和设备齐全、工序完整的优势，开始走上衬衫专业生产之路，当年内销 39.51 万件，产值 433.35 万元，奠定武汉服装工业“旗舰”的地位。后来生产的“大桥牌”男衬衫、“友谊牌”府绸男衬衫、“红苕牌”绣

花女衬衫，不仅全国叫响，还先后出口苏联、东欧，行销东南亚、欧美日，年产衬衫 150 万件，跻身全国衬衫定点生产基地行列。

同时，武汉服装厂服务于江城市民，1958 年在兰陵路口、民众乐园、硚口厂部设三大门市部，为顾客来料加工；在江汉路中心百货大楼设销售柜，销售多品种成衣。武汉商场开业后，分出 100 多员工在商场旁另建门点，后成长为汉口服装厂。

武汉第二家国营服装大厂，乃是中山大道水塔对面的红旗服装厂。它起步于“中安被服”宋朝贵等 9 位军需骨干组建的生产组，1956 年合并联社时，地下党出身的武汉手工联社主任吴正东甚为高兴，为之取名“红旗”。吴正东调广州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数年，1972 年又回武汉任二轻局局长，宋朝贵作为“开厂元老”任武汉服装工业公司副经理。

红旗服装厂职工达 850 人，技术实力雄厚，又地处黄金宝地，精制中高档毛呢制服，拥有“女服大王”等驰名三镇的高级技师。因此，该厂一面为中心百货大楼和武汉商场批量生产毛呢服装出售，一面为顾客单人定制产品，修建长江大桥的苏联专家也慕名前来定制西服。“红旗”时常设计新款服装在店堂展示，引领三镇潮流。

此外，军需被服厂输出一批骨干，参与手工业改造，整合个体裁缝摊合作办厂，大多担任管理、技术中坚。有的以自身家属和部队家属为主体组建集体企业，如 3506 军工厂家属组建硚口服装厂，3510 军工厂家属组建光辉服装厂，3604 军工厂和高级步兵学校家属组建汉水服装厂，248 部队家属组建工农服装厂等，增加翻新、改制、锁边、打补丁等业务，填补空白优化网点，也安排了家属就业。

“军需力量”的强大注入，建立起龙头企业和主体框架，武汉服装业和服装消费市场，格局为之一新。

“手工业改造”重构版图

1950 年，武汉市工商联组建“缝装制绣工业会”，纳入原“服装同业公会”，组织起 7 个生产合作社，职工近 700 名，成为与私营服装店不同的集体企业。

“首家”缤纷多姿的女装

1956 年 1 月 8 日，全市服装业敲锣打鼓报喜，5700 余人组建 67 个合作社，带动 46 家私营服装店公私合营。“祥康”“怡和”“首家”“兴记”“胜记”都卷入热潮，吸收 734 名职工，产业集中度明显提高。

1957 年秋，分属手工业局、纺织局的服装业，由第一商业局统一管理，步入专业化分工发展的道路。1960 年，武汉国营服装企业达 30 家，会同公私合营的“老字号”遍布三镇，构成完整的产业版图，一家家厂名富有时代特征，连缀起来犹如诗行：

“中华”“新国”立“东方”，“中原”“人民”迎“解放”，
“星火”“金星”映“曙光”，“民众”“为民”浴“朝阳”。
“胜新”“春风”拂“春光”，“培红”“红桥”又“虹翔”，
“雄伟”“长城”放“光华”，“工农”“群益”“友谊”长。
“灯塔”“光明”闪“火炬”，“大桥”“新中”“扬子江”，
“快乐”“实验”逢“羽绒”，“海燕”“海鸥”追“祥康”。
“江汉”“江岸”“水果湖”，“硚口”“汉口”连“武昌”，
“南京”“上海”大“武汉”，“首家”“时代”“红旗”扬。

1965 年，服装业“工商分家”，成立武汉服装工业公司统辖“大批”生产，原有“前店后厂”保留在商业系统从事加工服务，各自承担不同功能，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

《武汉服装志》以 1980 的数据为基准，对比勾勒了其发展壮大的基本轨迹：

——服装工业系统 116 个厂家，加快专业化步伐，释放生产力产能。1965 年产量 570 万件，1975 年产量 1062 万件，十年翻一番；1980 年 1630 万件，五年又增长百分之六十，相较 1952 年的 116 万件达 13 倍。1630 万件中，600 万件出口创汇，打开国际市场，为未来“汉派服装”传播先声。

——服装商业系统店家星罗棋布，主营供料定制和来料加工，创新花色款式品种，1980 年产量近 80 万件，相比 1970 年翻一番，为市民求新、求美、求丰富、求方便加大供给，武汉人穿衣有了基本保障。

“工商并茂”规模升级

“白海记”服装店的旗袍闻名海外

“工商分家”促进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西服、便装、制服、童装分工明确，定制加工、自制展销、大批供货相互补充，本地、内贸、出口三管齐下，呈现“工商并茂”的繁荣局面。

“老字号”名店青春焕发，在保持原有品位特色的同时，探索服务大众的切合点。

“白海记”制作高档旗袍，老板是黄陂白家湾人白海山，1938 年在汉口华清街开店，不久遇日军侵略而营业萧条。起家之时，10 平方米铺面，一台缝纫机，靠妻子叶桃和弟弟白荣山帮工。后迁到胜利街武汉

“扬子江”呢绒服装店（老牌子“祥康”）以定制中高档毛呢中山装著称

电影院附近，也只有 20 余平方米铺面，添了一台缝纫机，雇工七八人。1956 年合作化后发展迅猛，“一白三红”——分出“红升”“红光”“红霞”三个便装厂，本部在中山大道挂出“海燕时装”招牌，拥有 500 余平方米厂房，添加电动缝纫机 50 多台。

“扬子江”位于江汉路，定制中高档毛呢服装，为在汉外宾和出国人员的首选。它的前身便是久负盛名的“祥康”，传有“穿西装，找祥康”的口碑，解放后从三德里一迁“五芳斋”对门，二迁江汉路无线电商店之侧，门市营业面积 120 平方米，生产车间面积 600 平方米，实现电机流水线作业，年产 4 万件。

比起 1909 年面世的“祥康”，“首家”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才从南京撤退来汉，抗战胜利后推出“海勃龙女式大衣”，一夜爆红，此后雄踞中山大道兰陵路段，以西式女装见长，用料讲究，款式新颖，为武汉“新娘子”所钟情。

“新郎官”则有“怡和”悉心伺候，以西式男服著称，备料丰富，工艺精湛，长期走高端路线，1946 年从武昌搬来，与“首家”并蒂为“姊

妹店”。正因如此，1956 年合作化时，周边西服店“胜家”“新民”“信孚”“慎记”“艾新记”纷纷加盟，以“怡和”为首成立“怡和总店”，年产增至 1.4 万件。

服装工业系统的厂家，以武汉服装厂、红旗服装厂为龙头，主要承担“大批”任务，批量生产成衣供百货商店销售，不断创新品种和款式，改善市民的穿衣质量。女式列宁装、布拉吉，男式军干服、两用衫，刷新人们的精神气质。西式长裤、球裤、乒乓裤，让传统的扎腰裤、大裤衩子退出城市生活。

1978 年，当改革开放大潮奔涌而来，武汉服装业凭借强大的实力基础，释放积蓄的能量，实现第二次跨越，最终在海内外崛起为“汉派服装”重镇。

梅赞 ①

鄂豫皖苏维埃银行寻访记

“小小红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黄安（今红安），是一块红色的土地，这里曾经是鄂豫皖苏区的核心根据地，曾产生了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两支重要的红军，对中国革命产生过深远影响。伴随着军事斗争的经济、金融斗争同样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值得我们去探寻。

鄂豫皖苏区银行旧址

①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办公室资深经理，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草创银行

在中国工商银行红安支行杨行长的向导下，我们走在长胜街上寻访当年的苏维埃银行旧迹。青石板路，马头墙，翘拱飞檐，店铺林立。长胜街中段 55 号，一座不起眼的民居，条石的门楣之上，写着“银行”二字，这便是当年苏维埃银行所在地。作为工商银行的一员，我们不由得就有了一种亲切感，仿佛看到了前辈们筚路蓝缕创办银行的辛劳。

走进屋内，不大的面积里，右边是黢黑的柜台，柜台后的墙上贴着当年的“寄售规则”，原来这里曾经是“鼎泰祥”当铺。柜内有个侧门，上书“金库”字样；左边是一些情况介绍和银行发行的银元和纸币照片。我们边看边了解银行产生的背景。1927 年 11 月，黄麻起义爆发，起义军迅速占领了黄安县城，建立了县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随后，大别山地区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到 1930 年春，以黄（安）麻（城）光（山）边界地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1930 年 2 月 25 日，中共中央给湖北省委、河南省委和六安中心县委发出指示信，决定将鄂豫皖相邻的 21 县划为鄂豫皖边特区。7 月，特区苏维埃政府在黄安七里坪成立，政府下设财经委员会，郑位三任委员长。根据中央政治局“统一金融和统一币制的规划”，筹备成立苏维埃银行。10 月，苏维埃银行成立，郑位三兼任行长（后由郑行瑞兼任）。

据参加过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早期工作的李正山老人在 1978 年（时年 81 岁）回忆，鄂豫皖特区银行是在郑位三主持下筹建的，并开过一次筹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王功国（新县陈店公社王家湾人）、郑行瑞（红安七里坪郑必湾人）、徐朋云（红安七里坪孟家窪人）、曹学秀（檀树岗就家湾人）、吴子清（黄陂河口人）。银行正式在七里坪开业，一共五个人：曹学秀是会计，负责管账；吴子清是出纳，管钱；李正山是押运员，负责运送；方思训（檀树岗陶家边人）是炊事员，还有小同志郑国南（檀树岗郑家湾人）专门做勤杂。银行营业后，由于纸票子还没有印好，只做了收付银器、光洋、铜、钱的工作。那时，银行主要做了这么几件事：第一，红军部队和地方特务营缴获来的金银、光洋等都交给银行清点、包

装、记账、保管。金银是按重量计算，光洋是一百元一包，纸票子也是一百张一包，都是按包计数。第二，地方各机关单位（包括苏维埃在内）和红军部队用钱，都向银行领取，银行按批准数额拨付。第三，负责苏区纸币印制和光洋铸造，发行用纸票子与光洋的兑换工作，主要是经济公社到白区去购货时，可拿苏区的纸票子到银行兑换光洋，如果银行有国民党的票子就换国民党的纸票子给经济公社。第四，银行也发放少量的贷款。

苏维埃建立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支援苏区发展生产和红军建设，彻底粉碎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主要业务是集中管理现金，组织存款，代理财政金库；建立印钞厂，发行纸币，组织货币流通；发放贷款；兑换货币；设立商业市场与扶持出入境贸易等。

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首任行长郑位三，虽然兼任行长时间不长，但一辈子都记得这段经历。新中国成立后，他还专门给红安的人民银行（工商银行前身）写信，将自己工资的大部分存入该行，以资助贫困亲戚。信曰“红安银行的同志：寄上贰百元，请作为活存以作为我帮助亲友之用……”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受他资助的军烈属达数百人之多。

1931 年 2 月，红军打下新集（今河南新县）后，鄂豫皖党政军机关便迁到新集城，并成立了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省委、军委、省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四方面军总部。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也随之迁来，当时打前站的是李正山和曹学秀两人。四五月间，七里坪的苏区银行就全部搬移到了新集城开业，并更名为“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亦称“鄂豫皖省工农银行”，也叫总银行，行长仍由郑位三兼任，因其工作太忙，就派郑义斋（河南信阳人）到银行负责。时有会计、出纳、保管员等 9 人，会计还是曹学秀，李正山负责出纳，保管员叫王泽兰（籍贯不详），专门负责保管钱款，做勤务打杂的是高厚梁（也是一个小孩，新集箭厂河肖家窪人）。

在新集时，财经委员会、经济公社、税务局和银行都是在一栋屋子办公，总共有四五十人。总银行既是货币发行机关，又是财政拨款机关，下设一个（道）区级银行和两个县级银行。在没有设立银行的地区，银行业务由经济公社代理。红军每打下一个地方，就建立一个经济公社，银行的业务，都是委托各地的经济公社办理，调拨收发金银、光洋。纸票子都

苏区银行铸造的银元

是由银行与各经济公社联系解决。各经济公社均安排有一至二人负责银行工作。据李正山老人回忆，当时宣化店经济公社是王功国，檀树岗经济公社是程昭若，箭厂河经济公社是赵基斌（两道桥人）等。总银行与各经济公社都有直接的往来，各经济公社负责银行业务的人每月都要到总银行开会、结账。总银行虽然没有明确的成文制度，但银行内部分工是会计不管钱，出纳不管账，每天由会计和出纳结一次账，清点现金。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的建立和业务的开展，标志着根据地金融业的兴盛。

组织资金

建立苏维埃银行，资本金何来？存款如何组织？我们都很感兴趣。尤其杨行长是 80 后，刚从省城到支行挂职，对 90 多年前我们的前辈如何组织存款更感兴趣。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工农政权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下，生存都十分艰难，要组织资金来源，那就更加不容易了。据介绍，资金来源主要靠缴获国民党军队的货币、没收土豪劣绅的钱物，征税及经济公社的销货收入等，也鼓励群众存款和捐献，但不作强求。

据《红安县志》记载，1931 年，红军活捉了国民党军第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以其为人质，与国民党谈判，最后以 9 万银元成交。同一年，红军南下，没收豪富黄金 5 公斤，白银 500 多公斤。收获的金银和各种货币，由银行分类清点，记账装箱，金银按重量，银元 100 枚 1 包，纸币 100 张 1 包。如此组织资金来源，其艰辛自不消说，甚至还会牺牲生命。筹集来的资金，苏维埃银行用来支持经济发展，保障苏区经济运转。

1931 年 9 月 21 日，鄂豫皖苏区政府致函各地经济公社、合作社“没有钱用的时候，可由银行去挪借，或由银行委托经济公社代收。这样才能使你们自身营业不致停滞，而农村的经济亦得畅行无阻。”银行还发放贷

款，主要分为农业、工业和商贸三类，农业贷款的对象首先是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其次是从事农产品加工的各类小作坊。期限一般 2 至 6 个月，利息 1 至 2 厘，贫苦农民的贷款到期如不能偿还，还可延期，有的还免息，真正体现了“人民至上”的理念。据李正山老人回忆，他在七里坪时还经手入过一笔皮油贷款，是放给红安县城附近郭十九湾的一个油榨坊，资金是大家合伙筹集，用作油榨坊购买木梓，再加工成油，后来连本带息共收回 13 个半皮油（1 个皮油有 100 多斤）。

精心造币

看到展厅一张张精美的纸币和一枚枚质地上乘的银元，我们都很感叹那一代共产党人的认真，在那样简陋的工作环境和匮乏的物资条件下，还能有如此表现，不得不佩服我们革命先辈们的智慧。据有关资料介绍，鄂豫皖苏区的货币按质地划分有纸币、硬币和布币（主要由“经济公社”印制）；按货币面额划分，有主币和辅币。种类多，券别多，迄今为止，已发现 33 种之多，是全国苏区发行货币券别较多的地区之一。经专家推测，鄂豫皖苏维埃银行发行的货币总币值超过 80 万元。

据李正山老人回忆，苏区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主要是总银行自己印制的纸票子。纸票子都是一元一张的，当时一元纸票子可以抵一块光洋用，折合铜钱六串六，市面上的大头、小头光洋也很多，还有银分子、铜钱也一样流通。国民党的纸票子很少，也允许用，但要打九折。总银行收集起来，就拿到白区去买东西，这对反经济封锁很有好处。但总银行印制的纸票子和铸造的光洋，在白区就不能用，被国民党发现了，不仅要没收钱，还要说你通“匪”，抓到要坐牢、杀头。

鄂豫皖苏维埃银行的纸币和银元均由石印科负责，我们寻访了印制纸币和铸造银元的地方，主要有三处：一是杨家畈石印科。何谓石印？简言之，就是在石块上凿刻纸币模型，然后上色印制。1930 年 6 月至 1931 年 5 月，石印科厂址设在七里坪附近的杨家畈。鼎盛时，工人有 60 人。二是机棚石印科。1931 年 5 月迁到新集机棚，石印科改名机棚石印科，有石印机 6 台。石印科印制的纸币有浅黄色、蓝色和棕色。当时做版的师傅

苏区银行印制的纸币

是专门从黄陂请来的兄弟俩，一个叫芦楚桥，一个叫芦汉桥。当时的一元纸币，正面图案为哥特式的楼房上飘着斧头镰刀的旗帜，上书“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下书“凭票兑现全国通行”，背面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文字图案清晰、美观、大方。票子印好后，还要用号码机打上号码，然后再盖上财经委员会的公章，交银行入账使用。银行还印过布票子，方法是：先把白布剪成长方形，一块一块的，再印上字，编好号码，盖上道委会和郑位三的印章，再用明油油（一开始是用桐油炸，效果不好），吊在绳子上晾干，就可以使用。三是皖西北苏维埃银行印钞厂和造币厂。这是鄂豫皖苏区唯一正规的造币（铸币）厂，先设在金家寨阳山小学，后迁往麻埠等地。请的师傅是黄陡冲的黄银匠。铸造的银元一面镌刻着镰刀、斧头，一面还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字样，质地光滑，甚是精美。

苏维埃银行的纸币和银元曾在根据地风行，有很高的信誉和美誉。1932 年底，红四方面军西征途中，贺健（红安人，1911 年生，1955 年授予少将军衔，2008 年去世）将军将 1931 年底在红安县城照的一张照片和

身上仅有的一元五角钱边币寄给了家中的母亲。母亲一直舍不得用，冒着生命危险，保存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当贺健将军五十年代回红安时，母亲将一元五角钱边币交到贺将军的手上时，贺将军热泪滚滚，怎么也想不到母亲竟将它保存了二十多年，这哪里还是一张一元五角钱啊，这分明就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深深的念想啊。贺将军把钱紧紧攥在手中，也把母爱紧贴着胸口。而今，这一元五角钱的边币，已成为贺健将军家的传家宝。

回眸 90 多年前的苏维埃银行的历史，看看今天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我们不禁感慨："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目前，小小红安竟有十多家银行在此扎根，我们工商银行已在红安设立三个网点，各项存款总量近 31 亿元，各项贷款接近 20 亿元，秉承红色基因，以大行的担当和为民的情怀，竭诚为全县 60 多万老百姓和数以百计的工商企业服务，成为红色金融在红安这块红色土地上的赓续和传承。

寻梦荆楚

徐少芬[①]

寻访汉冶萍

百余年之前，亚洲最大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成立。这个公司虽然已在中国历史上消亡，但它曾经所属的企业大冶铁矿、大冶铁厂、萍乡煤矿等仍然存在，而且在不同程度发展壮大。它创立的公司管理体制和沉淀的企业文化，对当今发展工业仍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回首往事，在汉冶萍公司成立的风云岁月里，埋藏着一个民族富国强兵的梦想。为此，我参加了一次汉冶萍寻访活动，希望通过汉冶萍这一根线读懂中国近代史。我们从武汉、黄石到江西萍乡，行程 1500 余公里，寻访“汉治萍”公司。

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办钢铁企业，诞生于 1890 年，由晚清名臣张之洞创办，是当时中国第一家，也是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从此，中国钢铁工业蹒跚起步，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的标志。汉阳铁厂遗址在现今武汉市汉阳区琴台大道，现为武汉钢铁集团汉阳钢厂。

在汉阳钢厂门前，竖立着一个门楼，上书“汉阳铁厂”四个繁体字。门楼左边有一个巨大的钢模，数吨重的钢模被安放在一块基石上，上面镌

① 作者系湖北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武汉汉阳铁厂旧址

刻着“华夏钢源”。1924 年，这座铁厂的高炉就熄火停炼了，大量的设备和厂房都在乱世风雨中睡大觉。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汉阳铁厂设备大量起运到重庆大渡口 (后演变为重庆钢铁集团)，其余被日军侵占，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作为敌伪产业清理，被全部炸毁，基本没有什么遗迹存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汉市政府在原汉阳火药厂遗址上重建汉阳钢厂，最老的厂房、机器，也只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

如今汉阳钢铁厂也熄火了，整个厂区已经变成了钢铁贸易市场的堆栈，到处是铁锈和尘灰，空荡荡的红砖厂房上原来笼罩着的煤灰变成了棕黛杂糅的沧桑色彩。走过废弃的铁轨，油草、葎草和早熟禾把轨道间的空隙填得严丝合缝。走过一条条管道、一根根烟囱和一间间厂房，上面都被武汉市文物局挂上了文保标识。

在汉阳铁厂牌坊门口，汉阳钢铁厂特地修建了一个小广场，为张之洞立像。顶戴花翎的张之洞面沉似水，注视着他一生最大的手笔。

当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摇摇欲坠、千疮百孔。1889 年，清廷的海军衙门奏请修筑京通铁路，在国内引发一场修筑铁路的大争论。满朝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认为“铁路为自强第一要端”，他设想，西方列国之所以强大，跟铁路息息相关。所以如果能从卢沟桥开

始，一口气把铁路铺到汉口，构成大清朝南北贯通的大动脉，清帝国强盛的那一天就指日可待了。为此，他多次上奏皇帝。清廷于是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督修卢汉铁路。张之洞上奏言明，修筑铁路必须用中国自己的材料和自己的资本，这就要开采煤铁，兴建新式钢铁厂，轧制铁轨及其铁路器材。当时，还曾因选址问题发生争议。李鸿章主张将厂址建在产煤的地方，盛宣怀主张建在石灰窑。最后，按张之洞的意见建在了汉阳。经清廷批准后，便以当时世界第一大钢铁厂德国的克虏伯钢铁厂为蓝本，建设集开铁矿、采煤炭、炼钢铁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由湖广总督管理。主要是在汉阳兴建汉阳铁厂，开办大冶铁矿作为汉阳铁厂的原料基地，开办大冶王三石煤矿和江夏马鞍山煤矿为铁厂提供燃煤。

1891年元月，官办的汉阳铁厂破土动工，其高炉容积达到470立方米，是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之一，全厂包括生铁厂、贝色麻钢厂、西门士钢厂、钢轨厂、铁货厂、熟铁厂6个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片钩钉厂4个小厂。此事在国内外造成巨大的轰动效应，日本记者、美国驻汉口领事的报告均称其为“中国之雄厂”，西方舆论更视其为中国狂睡初醒、与欧美争雄的标志。1894年5月，汉阳铁厂试产成功。但张之洞的踌躇满志，却没持续多久。他的重要支持者醇亲王去世；创办经费严重不足，恰在此时，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清廷库空如洗；经验不足，工厂管理弊病百出……这些使张之洞心力交瘁，思虑再三，他向皇帝请示由盛宣怀接手。1896年4月该厂改为官商督办企业，5月24日，盛宣怀到任。经过一番励精图治，汉冶萍才真正拿出了合格的钢材，这是中国人真正意义上的“炼出的第一炉钢”。2012年11月，有关部门在检查铁路线时发现在万源市境内的万白货运专用线一处山间铁路桥上，100余年前“汉阳造”钢轨还在正常使用。2015年11月，有网友在陕西略阳县的一座大桥上发现在大桥的辅轨中有数根钢轨上铸有凸起的数字和字母：“M.C。–1906–A.T。”等字样，经查这些钢轨竟然是清代制造的。在北京、湖南衡阳、河北石家庄、四川达州也有过类似的新闻报道。经专家鉴定，这种钢轨确实是清末民初汉阳铁厂制造的。汉阳铁厂的产品质量由此可见非同一般。

汉阳铁厂旁修建了一座“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里面收集了当年汉阳铁厂大量的图片与实物，详细介绍了这段历史。其中让人印象最深的是张之洞的读书墙。两面墙夹成走廊状，上面撰刻着他经常阅读的各种书籍，如果仔细端详，会发现绝大部分都是洋书，其中有不少是西方各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方面的书籍，还有大量西方工业生产制造方面的书籍。或许这就是“湖北新政”的奥秘所在。张之洞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但他在担任地方领导人的过程中，以西方为师，大刀阔斧兴办各种新事业。当年，张之洞在武汉大力推行兴实业、办教育等新政，创办了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汉阳针钉厂、汉阳官砖厂等，在汉阳龟山至赫山临江一带，形成蔚为壮观的十里“制造工业长廊”。现代制造业的兴起，直接成就了张之洞的“湖北新政”。可以称得上是功在湖北，利在千秋。

汉冶萍煤铁厂矿博物馆

黄石工业大名鼎鼎。黄石这个名字，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江之右岸有黄石山，水迳其北，即黄石矶也。”黄石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是中部地区重要的原材料工业基地，湖北省最早的铁路、最早的水泥厂、最早的电厂、最早的煤厂都因为汉冶萍的关系，纷纷诞生于黄石。

黄石汉冶萍煤铁厂矿博物馆内景

我们首先参观的是汉冶萍煤铁厂矿博物馆，该博物馆位于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旁的新冶钢厂内。进入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锅炉，亮蓝色，在蓝天白云映衬下格外壮美。里面一座两层高的苏式小楼就是汉冶萍煤铁厂矿博物馆。博物馆讲解员首先讲解了新冶钢的辉煌成就，如 2017 年 5 月 5 日，我国 C919 国产大型客机首飞成功，离不开新冶钢生产的特钢产品的幕后发力；还有我国的高铁铁轨、航天产品等。

在这里，可以通过图文进一步了解汉冶萍的前世今生及从中衍生出来的新冶钢的发展演变史。1890 年，为修建卢汉铁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建汉阳铁厂。1908 年，在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的基础上，成立了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它集勘探、冶炼、销售于一身，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用新式机械设备进行大规模生产的、规模最大的钢铁煤联合企业。

大冶铁厂是中国最早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重要组成部分。1913 年 5 月 20 日，汉冶萍筹建大冶新厂，即后来的华中钢铁公司、大冶钢厂。100 年来，炉火不断，生生不息。如今，新冶钢产品从常规向高端转移，研制汽车关键部件用钢、海洋系泊链用钢；从优钢向特钢转移，开发轴承钢、齿轮钢；无缝钢管由通用向专用转移，研制高强管、耐高温高压管。

好在之前曾经参观过宝钢和原武钢钢铁生产线，对钢铁的生产流程已经比较熟悉，倒是第一次知道通过馆内声光电技术获悉钢管是如何炼成的，并不是模具造，而是挤压成型。在这里还看到了管壁薄如纸张的钢管，也有一个重达几吨的超厚钢管样品，还有一些航空航天和机械设备钢构件。我们还了解到新冶钢在中国钢铁史上的 18 项第一，如中国最早建成的亚洲第一高炉、新中国第一个自行建设的新钢厂、中国第一次合作试验转炉与电炉混合炼钢法炼钢成功。

出了汉冶萍煤铁厂矿博物馆，就是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该旧址是近现代代表性厂矿建筑。2006 年 6 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汉冶萍煤铁厂矿旧址现完整保留有汉冶萍时期的高炉栈桥一座、冶炼铁炉一座、日式住宅四栋、欧式住宅一栋、瞭望塔一座、卸

矿机一座。

广场上引人注目的钢之鼎，是目前湖北省内最大的铜鼎，整个鼎高4.899米，有张之洞和盛宣怀两尊雕像悄然屹立，有十分醒目的加拿大造空气压缩机，1956年制造，重15.56吨，服役45年后于2000年退役；有几根长火车轨，分别是1891年德国进口的两根铁轨，已经锈蚀严重，还有一根是汉阳钢厂1908年制造的钢轨，更宽更厚，保存较为完好。

随后看到冶炼炉遗址，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近代工业中钢铁冶炼遗址，具有非常高的文物价值。在这里，曾经是亚洲第一的汉冶萍大高炉述说着中国近代钢铁工业艰难而曲折的发展历程。1917年5月，在中国近代钢铁工业发展史上，发生了一件令人瞩目的大事：两座堪称当时亚洲第一、日产铁400吨的大高炉在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大冶铁厂正式开工兴建！高炉炼铁是钢铁生产中的重要环节，汉冶萍公司的两座高炉当时均向美国订购，造价22.35万美元，容积达800立方米左右。这两座大高炉，代表了当时世界先进技术。

据《中日近代钢铁技术史比较研究（1868—1933）》一书中论述：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汉冶萍公司实际上拥有了当时亚洲最大和最先进的高炉。然而，大冶铁厂两座大高炉在兴建中却命运多舛。因时局关系和焦炭供应断绝等问题，两座高炉先后闭炉停产。在两年零两个月的生产中，两座高炉实际只有一座投入生产，共计生产生铁25.8万多吨，平均一天只出32吨铁。抗日战争时期，两座高炉被迫炸毁。

已经毁弃100多年的遗址上可以看到2至3厘米粗的钢筋，混凝土也不是现在细沙和水泥混合的，而是粗砾和水泥混合，结实无比。残存的砖上还有印字，而上面灰色的耐火砖居然全部是从英国进口的，历经千度高温和一百多年的风霜雪打、日晒雨淋，还完好如初，连砖缝勾线都还是整齐划一。

黄石国家矿山公园

1948年，汉冶萍的名号消亡，但它衍生的几个钢铁矿实体依旧存在，大冶钢厂有不少单位仍在继续生产。

穿过重重管道和房屋，就到了黄石国家矿山公园。它位于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境内，是中国首座国家矿山公园，湖北省继三峡大坝之后第二家“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8年1月，入选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在矿山公园首先到达的是北纬30度广场。这里满眼的绿树和鲜花，让人很难想象这里曾是寸草不生的矿山硬岩废石堆放场。广场中轴线的矿冶文化雕塑群向游客诉说着黄石那段辉煌的历史。黄石国家矿山公园隶属于武钢大冶铁矿。大冶铁矿是中国近现代钢铁工业发展的缩影，开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自公元226年三国时期开采迄今，已有将近1800年的开采历史。吴王孙权曾在这里造刀剑，隋炀帝杨广在这里铸过钱币。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兴办钢铁，在这里建成了中国第一家用机器开采的大型露天铁矿山，成为汉阳铁厂的原料基地。它是中国人聘请外国矿师运用近代地质科学勘得的第一座大型铁矿山，是张之洞在湖北兴办的众多洋务企业中唯一保留至今的企业。

可是，曾经的辉煌也引来了东邻日本的觊觎。1904年，主掌汉冶萍的盛宣怀为了挽救经营不善的汉阳铁厂，被迫以每年向日本提供大冶铁矿头等矿石7万吨每吨3元期限30年的代价，从日本兴业银行借款300万日元，作为改良汉阳铁厂的资金，从此就被套上了日本债务的枷锁，慢慢地从亚洲第一钢铁企业，逐渐沦落为日本制铁的原材料供应商。

汉冶萍的发展史其实也是一部对日借债史。1913年又向日本借款1500万日元，1925年又借款850万日元，1927年再借款200万日元，日本人势力从此一步步深入汉冶萍公司内部，最后完全控制了管理权。矿山周围有很多当年侵华日军留下的痕迹，如设在矿山的碉堡遗址（远端观景台）等。

回想当年，让人之不胜唏嘘。1938年10月大冶沦陷。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宣怀之子盛恩颐投靠了日本，日本制铁吞并了大冶铁矿，就是在这些军事碉堡的监控下，铁矿石最高时期产量达到历史之最的145万吨，再由日本人运到日本炼成钢铁，变成枪炮轮船飞机坦克，然后在中华大地上四处蹂躏。

经过广场，沿着缓坡往东走十几分钟，就可以看到一座高大的毛主席塑像，这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毛泽东石雕像。1958 年 9 月 15 日，毛泽东视察大冶铁矿，这是他一生唯一到过的铁矿山。他手拿一块铁矿石，身后就是一口东西长 2200 米、南北宽 550 米、最大落差 444 米、坑口面积达 108 万平方米的矿坑，形如一只硕大的倒葫芦，这就是汉冶萍时代的大冶铁矿，也被誉为“亚洲第一天坑”。

这样规模的露天采场，是世界矿业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也是黄石矿山公园的最大看点。毛主席像身前不远处就是一块硕大的铁矿石原矿，目测至少重达数千斤，据说铁含量高达 64% 以上，质量优良，是名副其实的铁疙瘩。

大冶铁矿东露天采坑自 1958 年投产到 2005 年结束露天开采，累计剥离岩石 3.64 亿吨，采铁 1.3 亿吨，生产的矿山铜 32.5 万吨。21 世纪以来，当地矿产资源逐渐枯竭，但矿山人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走上了“修复环境、改造环境、治理环境、再造环境”的科学发展之路，在露天采矿废弃的岩石堆上种植生态复垦林，创造出在石头上种树的奇迹。

峡谷栈道的终点是“石海绿洲”，为绿化复垦，矿山人在废石场上种出了面积达 247 万平方米的刺槐，一跃成为亚洲最大的硬岩复垦林。每年槐花绽放时节，非常壮观美丽。

走过“天坑”，上到矿坑的西北处山丘上的怀盛亭，亭子后面还有一块摩崖石刻，这些都是为了纪念创造汉冶萍辉煌的盛宣怀而设立的。摩崖石刻用楷书赞颂了盛宣怀开创大冶铁矿事业，使得大冶地方日渐富庶的成绩，落款是：大冶铁矿全体同仁暨大冶士绅等建立。沿着怀盛亭往上爬到山顶，荆棘杂树之中有好几处颓败的碉堡，这就是当初日本人留下的遗物。

公园里还有“井下探幽”景点。据查，“井下探幽”由 712 级台阶直通地心，游客可零距离观看现代采矿工艺流程，感受百米井下隆隆炮声，并可进入“矿冶峡谷”底部，仰望大峡谷之雄奇伟岸。我们一级级台阶往下走，井道越来越暗，只有打开手机电筒才可以移步。行至大约 200 多级台阶，大家实在是有点气馁，停下来。因时间原因，团长周鹏飞要求大家

全部关闭照明设备，安静下来倾听心声。好不容易灯光熄灭，周边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但很快就有人尖叫，无法持续安静下来，随之探照灯、手机也亮起来了。

想起在过去科学不那么发达的年代，矿工们在幽深地底挥镐放炮，把一块块矿石运到矿车上，辛苦艰辛难以想象。返回时，十几步一停，小腿直打颤，才上到矿洞口。好在沿途有不知哪里来的暗风，吹来丝丝凉意。黄石天然就有地下风，在没有空调的年代，人们就是挖洞引地下风避暑。

萍乡煤矿

萍乡安源，这颗镶嵌在赣西大地上的璀璨明珠，以其在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中国共产党史、中国工人运动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和重要贡献，安源同时也是中国少年先锋队诞生地。这里是中国工人从事运动的摇篮、震惊中外的秋收起义的策源地和主要爆发地，是我们这个国家回望历史寻找初心的红色圣地。1920 年到 1930 年的 11 年间，毛泽东同志先后 11 次到达安源。那幅最为著名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就是记录了这样一段时光。

当时我们到萍乡煤矿厂时恰好举办了专题展览，制作了十几个大型展

江西安源煤矿总平巷

板，详细介绍了萍乡煤矿 120 余年矿厂的厚重历史、辉煌传承、红色底蕴、艰苦创业等详尽历程。萍乡煤矿因地处安源，又称“安源煤矿”，是洋务运动后期采用西方机械开采的煤矿，是中国近代十大矿厂之一。

张之洞设立汉阳铁厂的时候，在炼铁的燃料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就匆匆上马，结果不得不进口洋煤和洋焦炭，汉阳铁厂亏本严重，当年不得不请出盛宣怀来收拾残局。接手的盛宣怀于 1898 年在江西萍乡安源镇找到产量巨大的煤矿，解决了铁厂的燃料问题，汉阳铁厂自此才走上正轨。1939 年因抗战撤退而关闭。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成立赣西煤矿局，新中国成立后改为萍乡矿务局。经过多年努力，逐步建设成为“萍乡矿业集团”，集煤炭、焦化、电力、浮法玻璃、新型管道、机械制造、工程施工、国外工程、医疗、现代服务等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形成了“以煤为本、多业并举、综合发展”的产业格局。

沿长坡到山上的萍矿总局旧址盛公祠。这栋三层砖木结构的德国式建筑始建于 1898 年，初为萍矿总局办公楼。该办公大楼系两幢相连接的砖木结构建筑，前幢三层，后幢两层，中间一条通道相连。屋顶为白锌皮覆盖，颇像西欧的天主堂。后因地势较高，上下不方便，即在山下重建了公务总汇，这里改为德国工程技术人员居住楼。1916 年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宣怀去世，为纪念他，此楼改建为盛公祠。我们去的时候，大门紧闭，似已废弃。

沿着坡路下到山底，就是后来修的办公楼安源公务总汇，也是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谈判旧址。1922 年 9 月 14 日刘少奇作为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与汉冶萍路矿当局在这座楼房里举行谈判，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维护了工人的利益。公务总汇是两层砖木结构欧式建筑，进门之后木台阶十分厚重大气。上面是工人运动大罢工的资料展示和谈判场景还原。公务总汇楼左边角上就是安源煤矿金库旧址，可以遥想当年发工资盛况。

随后我们参观了 1921 年毛泽东安源旧居和安源煤矿总平巷。总平巷是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红色旅游的重要景点，建于 1898 年开矿初期。总平巷是安源煤矿一个总的井口，里面有东平巷和西平巷，矿井是平巷，故称总平巷。井口上方的徽帜是由斧头和铁锤组成，斧头代

表井下工人，铁锤代表机械工人。井口两旁的亭子是当年监工用来专门检查工人的。让人惊喜的是，参观时一列装载满满十几节车厢的运煤车从总平巷缓缓行驶出来，大家连忙拍照记录下这珍贵的瞬间。

我们还参观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其前身是创办于 1956 年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遗址陈列室，1984 年 8 月改现名。纪念馆坐北朝南，占地面积 200 亩，建筑面积 3245 平方米，陈列面积 2400 平方米。纪念馆陈列大楼高 24 米，长 100 米，宽 30 米，系二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正中间建有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部徽，两边是红色瓷砖组成的五星红旗和大型有机玻璃火炬灯。大厅门口有 6 根用大理石砌成的方开形大柱，高约 14 米。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是在这里开始的。当时，正好有几个班的中小学生在进行红色教育，穿着红军衣服进行操练，煞是可爱。在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有一些早年的大方桌、长板凳、青瓷水壶、青瓷大碗、推磨、木桶等老物件，让人想起童年家中场景，分外亲切。

汉冶萍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民族工业开始进入现代化轨道，它的出现、发展与壮大，无不体现着求实、务实、自强的进取创新精神。一是创新体制求发展。汉冶萍从创办之日起，就在不断改变企业性质，从开始的官办，改成官督商办，后来改为商办公司。成立公司便按照近代企业管理办法设立董事会，定期召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及查账人，推举董事会长。二是瞄准世界谋壮大。汉冶萍公司总事务所设上海，其企业除向国内各省扩展外，还向国外发展。三大主体厂矿分布于湖北、江西。随着公司经营状况的改善，兼并合办了国内不少工矿企业。到民国初年，附属厂矿遍及全国 7 省，初显一家跨省、跨国、跨行业的大型公司的雏形。三是打破壁垒跨越式发展。汉冶萍除集采铁、开煤、炼焦、冶炼钢铁于一身，还经营铁路和水上航运事业，有一支庞大的长江航运船队和湘江航运船队，并投资机器制造厂，打破了地区和行业壁垒。

刘少奇曾指出：“汉冶萍在东亚，他的存在比平常产业要有更深几层的重要。他不独在国民经济上占了极重要之地位；且为发展东方‘物质文明’之根据。”“在汉阳、大冶、萍乡各厂矿之下直接倚为生活的工人有四万人，连同此四万人之家属，不下十余万人，再依各处厂矿间接生活之

商民各业人员等亦数十万人，联株萍，粤汉铁路，湘江，长江至上海日本一带之直接或间接有连带的人民，亦不下数十万人；故汉冶萍之存在与否，实为百余万人民之生计所关。”

汉冶萍公司虽然消亡，但沉淀的企业文化却相当深厚。汉冶萍开放包容，洋为中用，广吸技术，广罗人才，海纳百川，形成与外部世界接轨的开放意识，呈现出包容性的“开放文化”特征，并形成和谐共处的“多元”文化。汉冶萍公司的创新精神和企业文化仍将继续发扬光大。同时，将汉冶萍公司的发展演变与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进行深入思考，更是引人深省。

田联申[①]

武汉首座跨街人行天桥蛇山桥与武昌南楼

家中存有民国时期父母亲在武昌蛇山上拍的一组照片，母亲说是1946年在黄鹤楼照的。虽然黄鹤楼在清末已经毁了，但武汉人习惯上将蛇山奥略楼一带仍称为黄鹤楼。

1945年9月1日，第六战区接管日方物资委员会在恩施成立，军政部武汉区特派员办事处在重庆成立，这两个机构的人员在巴东汇合，于12日乘船赴汉口。9月18日在汉口中山公园受降堂接受日本投降，10月9日开始接收日物资。委员会主任为第六战区司令官孙蔚如，副主任为第六战区副司令官郭忏与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我的父亲田镇瀛是这个委员会的湖北省政府专员、时任湖北省万县麻织厂厂长，从四川万县来到武汉，奉命接受日军设在汉口的被服厂。12月1日，陈诚电湖北省建设厅厅长谭岳泉，派田镇瀛为武汉被服厂厂长。

蛇山桥

来汉后闲暇时，爱好摄影的父亲与母亲同游武昌蛇山，在奥略楼、涌月台、禹碑亭、张公祠、黄兴铜像以及蛇山桥上都留下了照片。

蛇山桥是一座跨越长街（今解放路）的人行桥，天桥连接蛇山两边风景名胜。从蛇山西头奥略楼到东头的抱冰堂，游人不必上、下山，在山上步行即可。照片拍摄时正值冬天，母亲身穿貂皮大衣，拿着毛手笼，侧身站在跨街桥上。旁边桥栏上有典雅的云纹图案，桥面看上去铺着石

① 作者系武汉智能交通中心（原武汉交通科学研究所）退休干部。

板，一块块方方正正的，连在一起，桥后为长街西侧的商店。怎么会在一座人行天桥上留影？我推测当时蛇山桥还是新鲜事物，算得上蛇山公园景区一景，桥上留影乃当年的打卡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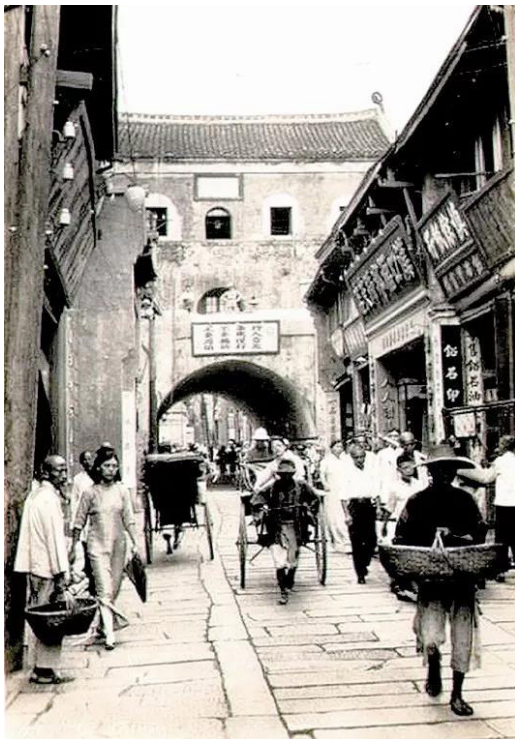
据《武汉地名志》载：1935 年长街扩修，蛇山鼓楼处全部斩断，鼓楼随之拆除。同年在原址修建钢筋水泥结构的蛇山桥。扩建后的长街，街面从 2 丈即约 6 米增宽至 13 米左右，并从司门口向北延伸约 1 公里，直抵中山路；南段扩修至中正桥，条石路面全部改成水泥路面。扩修以后，易名为中正路。新中国成立后，更名解放路。

《武昌志》写道："1935 年，武昌长街扩建，建筑蛇山桥""1936 年，武昌长街扩建竣工，蛇山桥古楼洞跨线桥竣工。该桥是武汉最早的过街人行拱桥，桥跨为 20 米。"这两条记载都出现在武昌大事记目录下，无疑被当作影响武昌发展的大事来看待。武汉以往桥多，但都是水上的，用石材或木材修建。而且过去街道路窄车少，也不须架人行天桥。

武昌南楼

长街在宋朝时已初具街市面貌，至明朝得到长足的发展。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于全国要冲建立藩国，分封诸王，第六子朱桢为楚王，驻藩武昌。武昌城墙始于洪武四年（1371 年），监修武昌城的江夏侯周德兴，按王城的规模和形制，花十年时间，将鄂州城增拓改建成了一座大型城池，主要是城墙向蛇山南扩展，不仅将蛇山圈在了武昌城内，还把滋养湖（紫阳湖）、长湖、歌笛湖、西湖、都司湖等，都圈进了城垣内。城周 20 里，共开 9 门。至清代 7 次修葺，规制大体依旧。1927 年拆除武昌城垣。蛇山南边的南湖堤演变为长街，渐成武昌城中的通衢要道，南楼演变为有交通功能的准城门，贯通武昌南北。

20 世纪 30 年代，武昌人口剧增，人力车为主要交通工具，汽车也已出现，宽仅 6 米的长街路面不适应都市的发展，加之蛇山公园景区正在兴建，于是，扩街修桥水到渠成。钢筋混凝土结构在武汉用于市政跨街天桥建设此为首例，蛇山桥也成为武汉有史料记载的首座跨街人行天桥。1956 年，该桥在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引桥时被拆除。



20 世纪 30 年代武昌南楼

那么，长街没有扩宽之前是什么模样呢？一张老照片再现了当年的情景。

民国时期，石板路人力车，手拿雨伞穿旗袍的时髦女士，身着衬衫西裤的先生，提篮做买卖的商贩，城楼上醒目的交通宣传标语，商店的广告招牌，一幅 20 世纪 30 年代武汉市井图。

这张照片很多武汉城市人文历史研究专家及爱好者都看过。2006 年 1 月 20 日，这张照片第一次出现在汉网“一组三十年代武汉的老照片”的帖子中，文中写道“三十年代的某个夏天，有个上海人来到武汉，拍了如下的照片。过了 70 多年，他的后代从阁楼里翻出了几百张旧照片……第二张应该是武汉的城门，门洞上方的文字是：行人靠左，车辆慢行，不要拥挤，不要滞留，城楼上站着个卫兵，双手叉腰，俯视着街”，没有人回答照片的背景是武汉何处。

之后这张照片出现在与武汉有关的书籍里，有说是汉正街某处，有说是武昌某城门，众说纷纭。在“汉网·人文武汉”论坛，众网友讨论历十年之久，照片摄于武汉何处？汉口还是武昌？直到 2016 年 6 月“一张老照片，看了几年也没有搞清楚是武汉哪里？”第三次现身，众网友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答案。

1926 年 10 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昌城后，受尽磨难的武昌居民强烈要求拆除武昌城门，上海的一家报纸闻讯后派出摄影记者，特地到武昌拍了一组武昌城门的照片，发表在报纸上，这张照片会是其中的一张吗？

有学者从上海找回了武昌城门的照片，没有这张颇似城门的照片。有网友提出如果能够找到照片上汉口福邦号支店与慎馀纸行铅石印书馆两家店铺当年在何处，就能找到答案。

受这个办法启示，我推测 1933 年出版的《武汉指南》可能有相关的资料。我在国家图书馆网站查阅到《武汉指南》，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仔细阅读，终于在“武汉之工厂—印刷工厂—武昌”栏目下找到“慎馀（商号）—南楼前街（地址）—黄明朗（负责人）”这条重要线索，但尚不能确认“慎馀”就是“慎馀纸行”，印刷与纸行应该是有联系的。同一本书的 714 页有“南楼街北至司门口，南至芝麻岭（今大成路口）”，慎馀纸行下面就有铅石印书馆字样，可见卖纸，印刷业务都有。有网友指出，根据这些资料，这个“城门”有可能是南楼。李白有“清景南楼夜，风流在武昌”，黄庭坚有“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清风明月无人管，并作南楼一味凉”咏南楼的诗句。

据 1933 年《武汉指南》第九编名胜古迹记载，有两处南楼：序号 24 的南楼在汉阳门内，黄鹄山顶；序号 25 的楚观楼，在布政司前，仿江宁南楼，柱包墙内。即蛇山西头奥略楼附近有一座南楼，蛇山中段布政司（1930 年为湖北省政府所在地）前的楚观楼也可以称为南楼。黄鹤楼公园官网这样解释，“南楼旧时称白云楼、安远楼、瑰月楼、楚观楼等，它与黄鹤楼、头陀寺、北榭并称为古时蛇山的‘四大楼台’。1985 年重建于公园南区。”照片中的建筑显然不是奥略楼附近的南楼，而是司门口附近的南楼。

关于这个南楼（老鼓楼）还有一个故事在民间流传。明朝崇祯年间，清兵南攻，明朝告危，明朝统治者听说武昌蛇山是龙脉所在，凿断龙脉便可永葆江山，于是命人分别在武昌蛇山和汉阳龟山铁门关取土除石、开山凿洞（即所谓的“龟断颈、蛇断腰”），以此破坏风水，消除心患。崇祯在武昌蛇山开凿山洞的地方正好在著名的南楼亦称“鼓楼”或“楚观楼”之处，故称之为“鼓楼洞”。此洞的开凿并没有保住大明江山，不过倒是大大方便了武昌城内的交通。清同治年间，鼓楼洞内以城砖砌墙和拱顶，加固洞内过道。

在1883年的《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上，南楼在司门口前，异常醒目，颇像城门，位于武昌城蛇山中段南北交通要道。三层的南楼一楼系敞开的，行人从长街、芝麻岭（街）经南楼街（武昌人俗称老鼓楼洞），可到司门口（布政司）；1909年、1911年的《湖北省城内外详图》、1930年的《武汉三镇市街实测详图》上亦如此，只是长街被兰陵街替代。

“孤证不立”，历史学者张胜林在照片上武昌南楼附近继续寻找，城门旁有“一品”。花了两小时，他终于在1933年《武汉指南》中找到，帽业类中有“一品，南楼前街”。结合慎馀在南楼的记载，我认为应该可以确认就是南楼。“想不到，蛇山过街桥未修时的南楼，竟然被大家找到了。”张胜林十分兴奋。在一张长街扩宽后名为中正路的老照片上，左侧有“福邦号武昌支店”的大幅店招。

说起武昌南楼，童年时代常在天桥上玩耍的网友“快乐大歌”胡世高打开了话匣子：88岁的老母亲说武昌蛇山有两个鼓楼洞。现在武昌路的蛇山鼓楼洞其实是新鼓楼洞，是后来开的，新鼓楼洞是连接民主路与阅马场的重要通道。蛇山老鼓楼洞在长街（即解放路，民国时期叫中正路）上。母亲娘家住在蛇山北的司门口青龙巷，父亲家住在蛇山南的水陆街金龙巷。母亲10来岁的时候，经常跟在亲戚家开的钱庄当账房先生的外公，穿过蛇山老鼓楼洞去走亲戚。母亲说那时候的洞蛮窄，只有几尺宽，只能够走人与人力车。

母亲说那是1936年前后，武昌司门口因为做生意的人们与车辆渐渐增多就更加热闹了，司门口老鼓楼洞的交通显得蛮拥挤，过往的人们蛮不方便。当时官府就派人把老鼓楼洞炸掉，打通了长街，并且在蛇山建立了一座蛮漂亮的钢筋水泥结构人行天桥。我小时候经常与小伙伴们在蛇山人行天桥躲猫猫玩。这座天桥后来因为1956年修建长江大桥时被拆除。

“快乐大歌”母亲的回忆与1933年《武汉指南》第714页记载相吻合，“南楼街—北至司门口南至芝麻岭”，今武昌解放路繁华地段——蛇山南楼、南楼前街，今武昌解放路司门口铁路桥和公路跨线桥处。

武昌蛇山南楼何时从地图上消失

1927 年，市政部门在报纸上招标拆除武昌城门，除保留起义门（中和门）外其余的城门全部拆除。据武昌老居民的回忆及《武昌志》的记载，拆除武昌城门时，像城门样的建筑南楼没有被拆除，直至 1935 年长街扩宽，南楼才拆除，在此处建蛇山桥，又称南楼桥、南楼拱桥。主持修建的湖北省建设厅技正卢立群将此桥称为“南楼遗胜”。我个人以为，黄鹤楼、头陀寺、北榭、南楼并称为古时蛇山的“四大楼台”，其中的南楼，当是历史地图中的位居蛇山中段、扼守南北交通要道的司门口南楼，登斯楼，歌笛湖、都司湖、长湖、滋养湖等武昌城内的湖泊尽收眼底，这才有“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的诗句。

武昌老居民说的老鼓楼，有悠久的历史，人们口口相传，其实是有历史依据的，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 1733 年的《武昌府城图》图中央，蛇山中段的位置就是形似城门的鼓楼，武昌城内南北通衢的要道。

从蛇山桥上看长街，长街扩宽后改名中正路（今解放路）

在 1869 年江夏县志《城池图》中鼓楼变身为南楼，它的背后为藩司。据有关资料记载：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一座在今蛇山司门口跨线桥处的楚观楼（俗称鼓楼）毁于大火，湖广总督毕沅主持重修，仍取黄

庭坚“鄂州南楼天下无”之意改称其为南楼。1883 年的《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在南楼的背后为司门口、藩署，这也是武昌司门口地名的发端，贯穿武昌南北的长街从南楼下通过。1909 年、1911 年出版的《湖北省城内外详图》上同一位置都有南楼、司门口。直到 1930 年出版的《武汉三镇市街实测详图》仍能看到南楼的地标。

汉阳门内黄鹄山顶的南楼，虽有历史记载但并没有出现在地图上。可以这样说，司门口的南楼在历史上影响更大、更深远，不仅有南楼的地理标志，还有南楼前街，武昌商贸最繁华之处。从长街到中正路到解放路，百年来一直是武昌的闹市商业中心。

王松平 ①

罗田民俗趣谈

湖北省罗田县是千年古县，地处鄂、皖、豫交界，背倚中原第一峰——天堂寨，面向中部第一市——武汉市，交通便利，人口流动性大，文化底蕴厚重，民俗文化形形色色，蔚为大观。下面讲述的几则小故事，虽是罗田众多民俗中的“冰山一角”，但由此可见一斑。

耳目一新的“东山湾酒歌”

东山湾酒歌

东山湾，是罗田县白庙河镇的一个行政村，因位于该镇潘氏祠东侧山峰之上，故而得名。地处镇区东部，与英山县毗邻，距罗田县城 38 千米。

① 作者系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新故事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是罗田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罗田东腔戏的发源地之一。

酒歌又叫“拳歌”，也就是喝酒时划拳的歌，但东山湾人有个独特叫法“打擂得”，意为武台上打擂一样，以胜败决英雄。所谓歌，自然与一些地方的划拳不同，不是念而是唱。据该村 70 多岁的许受全老人说：“东山湾人无论红白喜事都唱这种歌。”比如结婚、嫁女、生儿、祝寿、考学等宴席，就唱恭贺一类的歌词；遇到忧事，则唱哀婉一类的词曲。但以喜庆事为主，因为喜庆热闹才容易出气氛。气氛浓，兴趣自然高涨，斗志也就愈加旺盛。

东山湾酒歌，多以数字入歌，一人起头，一人对之，续接数字，如此叠加，如“三只蛤蟆几呀么几张嘴？几个眼睛几呀么几条腿？”要对曰“三只蛤蟆呀么三张嘴，六个眼睛呀么十二条腿”。歌词有固定的，也有即兴编唱的，不变的是错者为输，输者罚酒。这种数字歌大多取材于熟悉的各种动物，生活气息浓郁，趣味性强，既锻炼口才，又增长知识。更有特色的是，每一次对歌都有一个“酒牌”(也叫牌子、词牌，相当于领唱)，七言四句，多为贺词，如“紫竹林中节节高，手拿仙棍打仙桃；仙桃落在金盆里，父子同科又同朝”。又如“大步来到贵府中，府前高挂红灯笼；不是公子中了举，就是小姐入皇宫”。有时也按时令出牌子，如春节期间就唱:“正月里来(点点呀嗬嗨嗨)是新年(哪嗨嗨哟)，家家户户(麦鱼子唆、青年奴的哥)，笑开颜(哪嗬子嗬)……”

词牌唱罢才正式进入酒歌，参与者在唱酒歌时，要边唱边划拳，在划拳的过程中，讲究手形、指形、腕形的变化、伸出指数的变化，需要脑、手、口、眼、肢体并用，比的是快和准。每每对唱到旗鼓相当时，双双兴致更为高涨，一支接着一支，唱得生动传神，余音绕梁。那曲子使用的是罗田小调，音调柔婉中透出高亢，前两句较和缓，第三句突然昂起，带着九分的热烈，又有着一分的苍凉，令听者心生慨然，一种说不出的情愫充盈着胸腔。尤其是看着他们歌之舞之的动作和怡然忘情的神态，心中充满着无尽的感动和感慨。如果没有分出胜负，对唱必须继续进行，直到一方出错，分出胜负为止。往往几个回合下来，双双都“斗”得热汗淋漓，但个个精神抖擞、人人喜气洋洋。

黄冈市地名专家、史志专家熊安平考察时说："罗田东山湾酒歌是一种独特的酒歌，它与北方的有不同的区别。"国家一级作家何存中更是这样评价："东山湾酒歌应该说是活化石，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东西。"据了解，酒歌在东山湾盛行了几百年，50岁以上的人几乎都会唱。形成了一道独特而亮丽的民俗风景线。

五更吃年饭

"吃年饭"是罗田人过年的重头戏，有的地方叫吃"团圆饭"或"团年饭"或"更饭"，多数人叫"还福"，也有少数人叫"过大年"。

罗田人吃年饭的日子时间不一，多数地方月大在大年三十吃，月小在二十九日吃，只有少数地方在二十八日吃。但无论哪一天吃，都是五更煮饭，吃完年饭后天刚放亮。所以有"更饭"之说。至今民间有歌谣曰："鸡不叫，狗不咬，半夜年饭罗田佬。"

老传统吃年饭时要先供祖人，供祖人时大门要虚掩或留点缝隙，以便于祖人进屋赴宴，供完祖人后吃年饭时则要关紧大门，如有人来也不开门，有人进屋叫"煞龙窝"，不吉利。一般来人见吃年饭也不会叫门，会立即走开，知道主人发现后会不高兴和怪罪。

为何要吃这么早？缘由大约有三点：其一，其他节日接祖先赴宴都是晚上，唯有吃年饭是清晨，所以必须在天未亮之前让祖先吃喝完毕，好迅速返回；其二，为了讨个好彩头，顺顺利利吃完年饭，防止中途有外人打扰，不吉利，所以认为年饭吃得越早越好；其三，相传过去欠债的穷人担心债主上门讨债，所以早早地吃年饭，便于出门躲债。

《罗田县志》载："吃年饭，家中菜肴尽其所有。家中在外地工作的成员，无论多远，都赶回家中……""放鞭炮是吃年饭的重要标志。放长鞭显示年事的丰盛。"

另外，吃年饭时，尽力避免儿童哭闹，忌说不吉利的话。吃饭的方式，境内南北略异；南方将各式菜肴或8大碗，或10盘碟不等，摆放桌上，家人围桌而坐，尽其所好。北部山区家人围坐火塘边，挂上吊锅，聚各样菜肴于一锅，且煮且食。饭后，打扫庭院，备足食用水，并放鞭封井。

此后两日，不担水，不扫垃圾，不泼水室外。此俗今已废。

总之，现在时代不同，人们亦“与时俱进”，吃年饭更是随各家各户而定，日子有二十六日就开始吃的，时间有早上吃的，有中午吃的，有晚上吃的。城镇有独家在餐馆吃的，也有亲戚尤其是男女亲家两家聚在一起吃的。农村亦有请女儿、女婿、外孙等来家吃年饭的，女儿女婿家请岳父岳母吃的。为了请吃时间不发生矛盾，双方商量错开吃年饭的日子。浓浓的亲情，使年味更加温馨甜蜜，更加芬芳四溢。

六月六过半年节的由来

“半年节”是罗田民间独有的节日，半年节为农历六月初六。当天买肉、捞鱼、打豆腐，中餐办上一席丰盛的酒宴，其间燃鞭炮、上香、化纸供奉祖先，然后就餐。

“半年节”定为六月初六，为何不定为六月十五或三十日呢？民间有三种说法：一传说罗田人祖先是从江西瓦西坝搬迁来的，到达罗田刚好是六月初六，故将此日定为“半年节”以示纪念；二传说远古年代罗田发瘟疫，活人所剩无几，某县令求菩萨解疫，菩萨批字说“人要死到半年止”，县令掐指一算，“半年”要到六月三十日，到那时恐怕人会死绝了。于是，县令召集民众提前“过半年”，使瘟疫停止，故半年定为六月初六。而最为普遍的是第三种说法：西汉末年，今九资河镇曾建立过松滋县，县令为原朝廷重臣何丹，字伯章，广东人，因忤逆王莽，遭受谪贬。何丹上任后，清正廉洁，带领民众开发山林田园，深受民众拥戴，任期届满，朝廷决定官复原职。当地民众跪地挽留，加之何丹也舍不得离开，得到朝廷准旨。何丹在继任期间，仍勤政爱民，造福一方，终因积劳成疾，于六月初六日累死在职期上。民众感其德，将何丹厚葬于今石柱山朝阳处，并树碑立表，每年忌辰民众自发致祭。离墓较远的县民则在郊外祭奠。年复一年，其悼念活动遂演变为一种年节。后逐渐向全县辐射，故有六月初六过“半年节”的习俗。

旧时，“吃新”是过半年的主要活动内容。吃新是以新米煮饭，打鲜鱼、宰鸡鸭为菜，改善生活。罗田有民谣曰：“山里呀，好伤心，过了立

夏望吃新”。同时掐几朵谷穗（早稻）置土地、社庙前供神。农人烹饪早熟果实“品新”，外出的家人赶回家“试新”，初嫁女回娘家“分新”，亲友邻里互相“赠新”，无不郑重其事。如今此俗渐废。

喝晁子汤

每当腊月初八一过，罗田乡下就开始操办年货，最隆重最喜庆的一桩事是刹年猪。刹即杀，但罗田人不叫杀，因刹与福同音，吉利。刹年猪就要“喝晁子汤”，这是千百年以来，罗田乡下人的一种淳朴而永久不变的风俗，同时也是刹年猪的高潮，令人难以忘怀。

所谓“晁子”，乃猪血凝结而成，而“汤”并非就是汤。制作晁子汤，自古至今是很有讲究的。年近 70 岁的乡村退休教师汪习清津津乐道地告诉笔者说，首先，乡下人刹年猪不是用车将猪“运”到屠宰铺，而是“赶”(走)去的。猪在走动中能激活兴奋度，增强其活动量，这个时候再将猪抬上屠宰台宰杀，猪肉鲜活甜润，特别是猪晁子（猪血）更是嫩漾细腻，吃起来鲜嫩可口。接(盛)“猪晁子”的脸盆，一要干净，而且要根据猪的大小来定脸盆的大小，不能让“晁子”溅出来、溢出来，更不能弄泼弄脏。二要添上能垫着盆底的少许清水，还要放上用水化开的少许食盐，这样新鲜晁子就不粘盆，最主要的是煮晁子时，晁子会结成很大的块状，不至于松散。在制作晁子汤时，锅里放入适量猪油，待油热后倒入白水，再将晁子入锅，煮沸后盛起切片；接着，将小肠、猪肚蘸上食盐、白醋、白酒和淀粉一起搅拌揉搓，以去臊除腥，洗净后切片，小肠也可打成疙瘩，风味更好；然后，把猪心、猪

农村刹年猪

腰、猪肝、猪肺和部分素肉以及葱、姜佐料切细备用；最后下锅，一锅炖。下锅前仍然要适量放点猪油，再将上述备料一起入锅，翻炒数遍后上水，撒少许食盐，慢火煨炖。至今罗田乡下有句俗语说："大火煮粥，细(小)火煮肉"，意思是说煮粥大火烧煮才好吃，煮肉则要小火慢炖才更有味道。待一股股清香味从锅里飘出时，便汤浓肉熟，晃子汤就能开始"喝"了。

说是"喝"，其实是"吃"，除晃子汤外，一般还备酒菜、挂面、汤圆等食物。

喝晃子汤有两种形式，一是请进家里来喝，二是送给人喝。请进家里来喝的人，自然是至亲好友，如家公、舅爷、岳父、亲家、女婿等。总之，这天，主人家是忙得不亦乐乎。全家人分工明细，煮汤的，打扫卫生的，抹桌椅洗碗筷的，外出接客人的……虽然忙和累，但人人心怀欢喜，面带笑容。亲戚都来了，大家相聚一堂，说说笑笑，整个厅堂里热热闹闹，洋溢着喜庆欢欣的气氛。

接下来是喝晃子汤了。灶台上，放着一码码汤碗；桌子上，摆着一双双筷子；筷子旁，搁着一只只酒盅。主妇盛晃子汤，儿女们将晃子汤一碗一碗掇到桌子上，这时，当家人从火塘里提起了淌着酽酽香气的大酒壶，请客人入座。客人们和主人抿一口滚烫烫的美酒，喝一口甜滋滋的晃子汤，挟一坨香喷喷的汤肉……一年的丰收喜悦，一袭的新老亲情，尽在晃子汤中流淌。

宾客就座尝喝之时，灶台上的角色开始变换了。有婆婆和儿媳的人家，婆婆此时主铲盛汤，开始向垮中左邻右舍送晃子汤；儿媳此时则拿着汤碗，再盛些晃子汤肉，给在座宾客的碗里后续添补。这时，往往主客相互客套地推让，汤勺在眼前不住地晃来晃去，就是这个勺子"晃"的动作，成就了晃子汤的美名。

送晃子汤是儿女们的事情，他们掇着"木托儿"，托儿上放着三至四碗热气腾腾的晃子汤，走东家，串西家，一碗碗飘着香气的晃子汤，送在垮里左邻右舍的手上，婶婶叔叔们喜笑颜开边说着感激的话边伸手拿过一碗，然后从碗柜拿出自家的碗，将晃子汤倒进去，替下主家的碗放回托儿上，那种其乐融融的景象简直无法形容。

如今，晃子汤不仅是罗田县“十大名吃”之一，更是乡间一代代传承下来的淳朴民风，乡亲们团结友爱、和谐淳厚的情感在“汤”中延续……

赛鞭拾趣

据《罗田县志》载：此俗行于罗田县凤山镇长塘坳和大崎镇、三里畈镇毛家嘴村及黄岗庙一带。每逢农闲时节，相邻村湾各自选对手。鞭用紫藤皮与苎麻拧绳，头粗尾细，鞭梢拧苎麻，鞭长丈许，最长约两丈，双方各备鞭数十百根。主选鞭手百十人，分别站在高平开阔地带，排成一行。比赛开始或结束，各放三声三眼铳。此时，男女倾村而出，远远观战。甩鞭人先将长鞭平平甩出，然后举过头顶，转一圈后突然使劲用力一折，鞭头就发出一声巨响，声如爆竹。玩鞭的活动很有趣，但也需要技巧。动作不到位，甩鞭力度不够，就没有鞭声。鞭声响后，常一天一夜换人不歇鞭，谁的鞭声最响，时间最长，谁胜。

据三里畈镇中学退休的校长毛群益先生告诉笔者说，他曾去毛家嘴村金耳岩采访了 80 多岁的老人蔡均全，记录了这样一则故事：

某年秋季的一天，金耳岩西村一个小伙子手握长鞭 (当地人称霸王鞭)，在东村山岗上独自玩耍。“噼噼啪啪”的鞭声惊动了东村的村民，那时的人好面子，纷纷议论，认为是西村人在挑衅，不能认输。于是，东村赶制了几十条霸王鞭，在山岗上摆开阵势。惊天动地的鞭声，把西村的老少爷们惊呆了。几个老人指着那个“惹祸”的小伙子说：“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杂种，不懂规矩，惹出这大的祸来！”但骂归骂，商议归商议。大家认为，不应战，认输了，西村从此就要矮几分。最后由族长决定：“冇得办法，只有应战。”

西村紧急出动，纷纷找亲朋好友帮忙，不多时搜罗了近百条霸王鞭，组织百多人的队伍直奔山岗，排成长龙阵。东村人目睹对方人多势众，并不示弱，鞭声挥舞得更响。两军对垒，各使技艺、神威，只听鞭声如雷，震耳欲聋。两边山岗上，尘土飞扬，遮天蔽日。

西村有一个叫江维清的年轻人，身长个大，膀阔腰圆，是个有名的鞭手。他手执一条特大长鞭，长约三丈，重约三十斤，鞭头扎着黄丝，舞

动起来犹如长龙翻滚，响声如炸雷刺耳。

这场鞭赛，持续了三天三夜。两边山上，看热闹的人山人海。双方人力物力几乎耗尽，但都死死撑着，不愿服输。万般无奈之下，两方不约而同地派出族长和德高望重的老人作代表，握手言和。这才在双方鸣放的三声三眼铳中，各自停鞭。

真是不打不相识，一场不分输赢的竞鞭结束后，两个村子不仅未伤和气，反而关系更加密切。为增强友谊，提高技能，两村商定每到农闲之时，组织赛鞭活动，慢慢自成一种习俗，流传下来。

最后，毛群益先生意犹未尽，当即作诗一首，评曰："年少无知只贪玩，引出鞭赛闹翻天。三声铳响停争斗，和谐乡邻世代传。"

戏联趣话

戏联是对联中的一种类型，更是一种民风民俗。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多才多艺的梨园弟子，在多彩多姿的戏剧舞台，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演绎出一幕幕精彩纷呈的戏剧故事，一副副融文学性、戏剧艺术为一体的戏联也就应运而生，闪耀着奇异的光彩，为戏剧文化增添了无限的生机。

戏联有用红纸或红绸布书写后临时贴在台前左右两边的，也有固定刻写在戏楼或万年台柱子上的，如上过央视的罗田县胜利镇陈家山东腔戏班的老戏楼有副对联："歌传流水谁能和，曲在高山哪个知"。相传是清朝末年一位名叫陈增信的新科状元看完东腔戏后，激情满怀的即兴赠联，自此后，该戏班便作为戏楼固定对联刻写于两边木柱之上，至今红柱金字，熠熠生辉。

戏联的内容或宣传戏剧的特点和作用，或指导观众看戏，或反映剧场的欢乐气氛。有的戏联还借题发挥，既寓意深长，又富于情趣。这类戏联诞生于民间，流传于民间，除个别请名人或名人自己题赠外，一般不过分强求对仗工整，但通俗谐趣，透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如：清末时期，罗田县城东门有座东岳庙，庙前有座万年台，每年庙会期间必唱戏，所唱剧目必有《目连救母》。有一年唱戏时，会首请一位姓李的老先生写一副对联

贴在台前的柱子上："唱目连歌声娓娓；酬东岳风景依依"。人们都说写得好。第二年会期会首又找那位李老先生写对联，他提笔疾书："唱目连又唱目连歌声娓娓如前调；酬东岳再酬东岳风景依依似去年"。人们一看便明白了先生的意思、戏班是原班人马，没有什么新花样。第三年戏班特地从外地请来了一位名旦角。会首仍然请李老先生写对联，他又提笔便写："唱目连唱目连还唱目连添一个红粉佳人歌声娓娓非前调；酬东岳酬东岳再酬东岳着几分明媚春色风景依依胜往年"。人们一看，都赞不绝口。

清末民初，曾两次代理罗田县长的余凤年和本邑文士叶君牧分别写过这样三副戏联："闻鼓乐之声近者悦远者来劳而不怨；见羽毛之美视思明听思聪乐以忘忧""在十字街头任尔摆尾；扎一张白嘴要他滚蛋爬球（题狮子戏）""兵器全销愿从此天魔罢舞；眼光共注看这回名角登台"这类戏联读起来似在说戏剧，又似在说人生，可谓一语双关，耐人寻味，同时更说明了"戏台小天地，天地大戏台"的深刻寓意。具有"以戏醒世"之效，"以联警人"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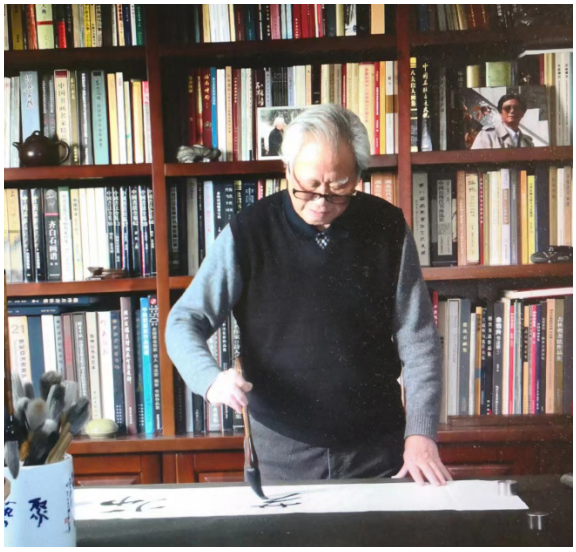
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有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北丰王家湾村请来戏班子唱大戏，并请一教书先生写了两副戏台联，其一："庆盛世台上笑台下笑台上台下笑惹笑；喜丰收看古人看今人看古看今人观人"，其二："文中有戏戏中有文识文者看文不识文者看戏；音里藏调调里藏音懂调者听调不懂调者听音"。这样的戏联，又喜庆，又好懂，而且意蕴深邃，富含哲理，有滋有味。

近年罗田凤城有一戏班子是由戏迷们组成，属于业余性质，他们在戏台上贴出这样的对联："上台生旦净丑角角有模有样；下地士农工商行行无拘无束"，横批是："能上能下"。虽不是佳联，却道出了扮演者的娱乐情趣，劳逸结合的潇洒韵味。更让戏联这种民风民俗与时俱进，更加鲜活，更显价值。

（毛群益、汪习清、朱清明等为文章提供了资料，本文参考了《罗田县志》等文献）

吴衍盛[①]

金伯兴个性对其书法艺术的影响



金伯兴先生在习字

自古以来，书画界就有一种说法："书为心画，字如其人"，意思是说，书画作品通常表达作者的内心情感，其字形常随心性而出。因此，西汉文学家扬雄说道："言者，心声也。书者，心画也。"清代刘熙载也说道："笔墨性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书，如也，如其学，如其人，如其志。"

正因为书画作品与作者本人个性特征，以及艺术修为诸方面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当我们首先了解一位艺术家的个人经历与性格特征后，显然更有助于对其艺术成就的理解与领悟。

而在当今书坛，素以特立独行，书风别具一格著称的耆宿大家、国家一级美术师金伯兴，其人生也具有浓郁的个性色彩，并对其书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① 作者系湖北省电信公司原宣传处处长。

做生活中的有心人

金伯兴1940年12月出生于浙江嵊州，此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不仅王羲之晚年在这里隐居，谢灵运、李白、杜甫、陆游等著名诗人都曾入剡(剡县即今天的嵊州市)览胜，留下诸如“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等许多咏剡名句。有基于此，当地人受到文化大背景的影响，很看重识字、写字，认为字写得好就是人的一张脸面。

不过，年幼的金伯兴一开始只是觉得写字好玩，当时家里条件很困难，便一个人在地上、墙上乱写乱画，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四处涂鸦”，用粉笔在墙面上写，在桌椅上写。与此同时，金伯兴看到母亲用来纳鞋底的毛竹笋壳（当时农村有很多人都这样使用），便用毛笔在竹笋壳子上书写，湿抹布一擦就掉了，又可以重新书写。日积月累，金伯兴的字在“涂鸦”的过程中越写越“有模有样”了，在学校里也算是写得好的，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作为肯定，老师在批改作业时，给他打的红圆圈最多，这使得他更喜欢写字了。

熟悉金伯兴的人都知道，他不仅做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同时还是个生活中的有心人，注重从日常生活与大自然中得到启示，对于书法的探求尤其如此，他能将书法与一些生活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思考，并从中受益。如“观夏云多奇峰，辄常师之”，从“惊蛇窜草”“飞鸟入林”中得到启示等，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其书法艺术的表现语言。

金伯兴10岁左右就开始放牛，干农活，上山砍柴，帮家里做很多事。从生活实践中他感悟到艺术来源于生活，即便是书法里那一点一线都与日常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比如田间劳作，金伯兴说:“当过农民的都知道，拿锄头锄草要有本事，会锄草的人能够不伤害禾苗，把禾苗中间的草轻轻地勾出来，他是灵活运用了锄头的二边角。我以此得到启发。写字要学会运用笔尖、笔锋。”

在此，金伯兴把书法创作中的笔锋使转，比喻为锄草，十分贴切。强调书法创作时应巧用笔锋，否则笔锋使转乱而无序，控制能力差，常常使书法作品失去形态。

金伯兴当年砍柴，上山下山不知道跑了多少个来回，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无不让他产生无穷无尽的遐想。

并且，四明山相对于平原地区来说，其山地海拔的差异导致的垂直变化明显，大自然春夏秋冬四季不同，五光十色，意味无穷。

金伯兴每当砍柴累了，坐下闲暇之余，仰望天空，那一团团飘然而过的白云，有的像羊群，来来去去；有的像峰峦，兀立碧空；有的像千万匹奔腾的骏马，还有的又像千万朵雪白的浪花，真是千姿百态，蔚为大观。傍晚的云彩更是绚丽多彩，云彩一会儿是红色的，像一朵朵娇艳的鲜花；一会儿是蓝色的，像茫茫的大海；一会儿又是金色的，像成片金黄的麦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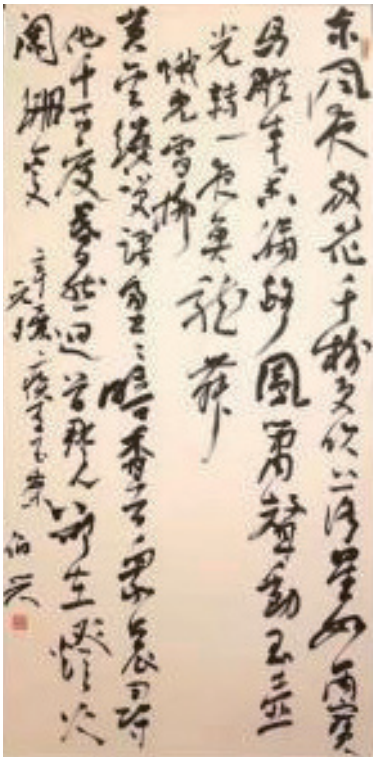
金伯兴由此联想到，汉字的结构为方块字，要想把字写得好看，须得突破方块字的各种形态，以构建千姿百态，恰如眼前这云海奇景总给人以美妙的，无穷无尽的想象空间。不过，并非仅靠功力使然，而是胸中具有应变调控能力，这种能力又来自艺术家审美的理想和胆识的自觉，去表达那具有无穷的魅力和遐想的空间之美。

书法与大自然息息相关，所以要到大自然中去领悟，大自然是创作的源泉。正如画家，在自然中写生不是纯粹的描写物象，也不是写自我，而是在大自然中寻求感悟，于物我交融后达到艺术升华的一种境界。古人云："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汉字起源于物象，日月山水，花鸟鱼虫，皆象形会意形声而成。因此，古人把字中的点画、字形都看成是与自然界某种物象和对应的具有生机的运动形态，并赋予审美的内涵，比如说"点"要像"高空坠石"、"横"要像"千里阵云"、"竖"要像"万年枯藤"等。

然而，书法又是有节律的艺术，是重精神气韵的艺术，是通过线条的律动、字势的韵味来抒发书法家情感的艺术。孙过庭在《书谱》中说："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中国书法不仅是"线条美""结构美"，更有"意境美"。

因此，金伯兴认为中国书法的线条不是普通的线条，字体不是一般线条结构的形体，它不只是表现"形"，还要含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具备"势""形""气""力""神"等诸因素，通过含蓄灵动的意境，引起人们无限的联想，产生出缕缕情思。

正是由于汉字自身的这些特点，书法家可以凭借自己的艺术构思利用笔墨技巧，创作出千姿百态的作品。换言之，不同的书法家会有不同的情思，会有不同的线条表现、字句建构和章法布局，从而使自己的书法作品表现出不同的景象，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艺术风格。没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任何艺术都没有生命力，这对于一个书法家而言，不只是其书法艺术水准提高的过程，积累的过程，更是一个艺术风格、艺术思想淬炼的过程。可见，其艺术风格的形成，是其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



金伯兴获第六届兰亭奖作品之一

师古而不泥古

凡是接触过金伯兴的人都会明显地感受到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嵊州人刚义直率，敢为人先的性格特征，其书法作品尤其如此。

金伯兴的书法首先是传统的，他在临习、研究碑帖中，除米芾外，还着重于对颜、王的深度追求和探索，以增其坚实的传统根基。这种传统深深地蕴含在作品之中，师古而不泥古，其对传统与创新的表现无疑是金伯兴书法语言机制的主体。

当然，相对于传统来说，金伯兴更是一位革新派。众所周知，一部书法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书法衍变史。要想在历史的道路上找到自己的落脚点，如果只是一味地雷同无疑是自我禁锢。

基于此，金伯兴在自己的领域里展开了大胆变革，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在传统技法上的突破。当今流行的书法作品大都以精、细、雅为特点。但金伯兴的作品却迥异于此，这主要体现在笔法上，金伯兴并不为勉强

追求某个笔画的精到而仔细雕琢，或许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其以雄强、生拙为主体的风格，金伯兴反其道而行之，形成自己不事雕琢的独特笔法，他的作品是大刀阔斧不拘小节的。所有这些与大多数人相去甚远的追求，给金伯兴带来了艺术上的个性，却又仍然与时代的脉搏紧紧地贴在一起。

由于对传统技法积累日久，所以金伯兴在以传统的中锋用笔主旋律得到体现的前提下，大胆地削繁就简，笔法上并不按部就班，而是无所顾忌，轻松自在地把握空间，恰如其分地靠控制笔锋的运行速度来表现自己的性情，同时巧妙地将魏碑的某些笔法掺入行书之中，方圆并使，使得作品别开生面。此外，金伯兴还在作品中创造性地使用破锋，即从墨色中分离出来形成黑白反差，从而打破作品平板的局面。

“黑墨团里天地开”，金伯兴追求笔下虚实相间，浓淡相宜，润燥相辅，这使得他的作品既有云彩般飞扬，又有枯藤似执着；稚拙不失古朴，灵动不失厚重。特别是在用笔上，他的率意、朴拙和东奔西突，都给人一种对传统书法的颠覆之感。

在结体上的突破。金伯兴的书法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结体是随机应变的，很少有与古人或今人结体相同的字，落笔虚实相生，图式标新立异，常变常新。这方面，作者一直都是抱着与别人绝不雷同的宗旨自出心机。但这种自出心机却又是在人们的可接受范围之内，有时候他的字变化得让你意想不到，你却又不得不叫好。可见，他具有个人特色的结体，是一种千百次磨炼后返璞归真、大智若愚的体现。

所以，当他将极具个性的结体与个性的笔法、墨法结合之后，在不懂书法或是初涉书坛的人看来，往往是陌生的，不理解，甚至有“难登大雅之堂”之嫌。殊不知，这样的作品才是历经“大雅”之后的更高意义上的审美图腾。

在章法上的突破。相对于当今书坛上铺天盖地的程式化作品来说，金伯兴作品的章法是立体式的。这首先得力于他厚重凝练的书风，同时其熟练的运笔技巧又加快了作品的节奏，笔墨轻重缓急地表现出来之后，使人们在欣赏其作品时，仿佛欣赏油画一般，立体地展现在观赏者面前。

除此之外，金伯兴亦注重章法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作品大都错落有致

地呈现跳跃性，一点也不显得流俗和呆滞。因为时代的共同特点是求变化、快节奏、潇洒、浪漫，而这正是他的作品富有个性的重要原因，也是他的成功创造之所在。

金伯兴追求每一幅作品都要各具面目，但大体风格又要统一。展现在大家面前的作品，每一幅都有自己独到之处，同一个字在同一幅作品或不同的作品里都有不同的写法：有的雄猛刚强如勇武之士，有的于雄猛中又透出细微的典雅之气，有的则是铮铮傲骨的书生……

虽然形式、追求不一样，在气息上也稍有差异，但整体风格基调却是一致的，金伯兴是一位成熟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力避雷同、单一，却又能够使作品于生拙中不失典雅，于雄强中又透露出轻灵的神采。

金伯兴的书法作品，却是与其独特的艺术领悟和奋发精神分不开的。金伯兴常说，创作书法作品，要有自己的“小动作”。微小技巧动作里面不仅有高技术含量，也有大学问。“小动作”是艺术的精妙所在，也是艺术家的可贵之处。“小动作”要在实践中去提炼，是自己私有的东西。正由于自己的“小动作”区别于他人，才产生了独特的书法语言。

艺术理论家陈方既在《〈金伯兴书法作品集〉序》中写道：“看似不经意之作，实是苦心经营之后匠心独运，绝无技巧的炫耀，确非技艺精能者不能至。”

常变常新，耻与人同

三办个展，艺术追求不停步。2002 年，金伯兴在湖北美术学院举办了第一次个展。2010 年，金伯兴在武汉美术馆举办了第二次个展。2015 年 12 月 18 日，金伯兴举办了第三次个展。

第二次个展金伯兴取名为“我写我法”。第三次个展，金伯兴取名为“我写我心”。

从“法”到“心”，金伯兴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

原来 2010 年的“我写我法”第二回展，标志着金伯兴“碑帖兼容”的书风基本形成，对书法有了更为深入而独到的思考。表现为不再计较具体的点画，而是通过笔墨表现自己的审美观念，能够按照自己的风格去

写，敢于追求“朴拙”这样的大道之美，寻找适合自我的新的形式和语言；而时隔五年之后的第三次个展，取名为“我写我心”，是从书风上来说的，标志其作品更加成熟，自己从年龄上、技艺上感觉也是到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时候，正如哲学上讲是从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了。

在金伯兴看来，“字即人，写字先做人，写字就是写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人是要有道德、修养的，什么样的个性、经历、功力，都能表现在字上。如果一个人做事不负责、说话耍滑头，笔下的字写得都是飘的。

常变常新，耻与人同。金伯兴常说：“我觉得跟着别人走是没出息的，要始终保持一个真正艺术家的独立性。”

多年来，金伯兴养成了一个习惯，他总是喜欢夜间书写，他说，这时候，天地间一片静寂，只听见自己心跳的节奏声，思维格外的清晰。置身此境，笔随心动，大有酣畅淋漓之感。

金伯兴在家练字成瘾，偶有心契，便乘兴挥毫，通过墨迹与古人会晤，往往是时至夜阑方休，结果满屋都是作品，几无立足之地，双腿只能似芭蕾舞般踮足跳跃。此时，金伯兴方放下毛笔，双手抱胸，对书写的作品逐一眯眼审视，觉得毛病比较突出的，便毫不犹豫地将其撕掉，再揉成一团扔到书案下，到最后往往所剩无几。最得意的，便自己留下，留待以后办个展，或者送展、送人，由此可见他治艺之严谨。

金伯兴早年刻苦研习颜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又主攻魏、隶和行草，着力于多种碑帖的练习与探索。在博取众家之长的同时，对前人的东西进行反复地咀嚼，吞进去，经过消化，完全变成了自己的营养，专肆古拙奇崛。因而他现在的行书中虽然仍明显地带“风樯阵马”的特点，但全不相类，而是书风已陡然一变。

金伯兴表示，当你把碑帖、笔墨、章法、结体等一切书法元素为己所用，为心所使时，其间快意难以言表。白居易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因此，金伯兴这期间是以“法不离度，书贵自然”的总体理念去把握书法创作，写出心中之笔墨的。即以我心写我法，以我法抒我心。由心调节情感、情性和情绪，不按常规写出千姿百态的字，每个字点画清晰，使转有序，可认可读。千变万化，得自然之气，可谓美在其中。

如此一来，他的书作虽有着浓厚的传统积淀，却全然如同己出，表现出鲜明的自家面貌——拙趣横生，如古之高人雅士。而在目前书法艺术还不十分普及、书法爱好者的审美修养也大多欠缺的情况下，能理解他的艺术的人并不太多。他的书法虽屡屡入选全国大展，但也有过落选。不过他不为外在的功利因素所动，仍然坚持按他自己选定的路往前走。有一则轶事说，他曾让书法圈外的人来品评他的书法作品，凡说好的，他都毫不吝惜地撕掉。他认为，字写到为常人所不爱、所不为时才算达到了高境界。王安石所谓洞愈深，而景愈奇，而至者少，即此谓也。

站在“理性”的高度反观自我。经过几十年的艰苦研磨，如今金伯兴的作品，其点画纵横，笔势运转，坚而柔韧，急而和婉，重笔不呆滞，轻笔不浮薄，结密处不闷塞，疏阔处不松散。意之所适，自然成形，无刻意为之的“精谨”，也非故意做出的“丑怪”。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达于和谐，如若天然铸成。

一直以来，金伯兴都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站在“理性”的高度，于总揽全局中反观自我，于眼花缭乱的时代场景中保持并调整自己的追求。他无意在流行书风中与人争高下，也不以俗好的褒扬而自足。他力求在广泛吸取营养的同时，刻苦地磨砺技能，着重深层次、高格调、更具内涵的向往与追求，写出与人不同、与众不同，立足于时代特色的作品，以展现自己做人的个性、艺术的个性。

葛昌永[①]

訇然开启的历史之门

——枣阳九连墩战国古墓发掘纪实

一条正在建造的高速公路，由九省通衢的武汉伸向十堰市，将穿起武汉、襄樊（今襄阳）、十堰这条中国亮丽的汽车带。2002 年 8 月，从枣阳热火朝天的建路工地传出一个轰动的消息：在枣阳吴店镇东赵湖村，发现了一座隐蔽的宏大战国古墓。

汉十高速公路无可回避地要途经随枣走廊，这一带是地下历史文物密集区。枣阳九连墩古墓群方圆几公里范围，高速公路规划部门在做规划时，既考虑了取路的需要也考虑了保护文物的需要，公路本应从九连墩一号墓经过，为了避过这座古墓，规划的路便略微摆动从一号墓的北侧擦过，因为那里是一望平地，种有绿油油的庄稼。可是施工不久，就在这一点儿也没有古墓痕迹的地下，发现了另一座隐匿的古墓。再改动高速公路的线路已经来不及了，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决定发掘这座古墓（二号墓），以及与之相毗邻的俗称鹰子包一号墓。

凄美传说为古墓发掘增添传奇光环

发掘这两座古墓的消息传开后，首先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枣阳市东赵湖这一带是一片古墓群，看得到的像小山岗一样的陵墓，共有九个，人们称为九连墩。地表看不到的如二号墓那样的陵墓，谁也说不清有

① 作者系湖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湖北省政协书画室成员。

多少。九连墩前呼后应，起伏的山峦一样一字儿联袂排列，每个上面都有一片参差不齐的松林。后来人觉得这墩子上风水好，为了沾点儿灵气，在九连墩之上的松荫里又埋下了不知道多少代人的多少堆旧墓新坟。

九连墩的真实由来，已经没有人说得清楚。现今留下的，只有一段似是而非的传说。不知什么年代，一个古老的国家里，有一个刚直不阿的大臣，因一件事被奸佞之臣陷害，国王受蒙蔽没弄清真相一怒之下草率下令杀了这个大臣，并将尸体悬挂在城墙上示众，任凭风吹日晒鸟啄虫蚀，两天下来竟连头也没有了。国人们知道这个大臣是忠臣，死得冤枉，乘风高月黑之夜将尸体解下城头，偷偷埋在郊外。奸臣们知道后着令严查，一定要再次挖出尸骨曝于荒野。谁知那个掩埋忠臣尸骨的小土包竟一夜之间长成小山包，上面还生出些陈年草蒿与丛丛松柏。国王听说这件事，觉得蹊跷，便微服私访重新调查案件真相，果然查清此大臣确系奸臣贼子陷害，而这奸佞臣子竟是里通外国的奸细，目的是要通过迫害忠良搞垮这个国家。国王果断地惩治了阴险的奸佞贼子。只可惜忠臣不能复生，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也为了褒扬忠良，国王请匠人铸就一颗金头，选择黄道吉日，挖开坟墓，将金头与尸体相接。为防止盗墓贼盗取金头，国王还下令修建了一模一样的九个小山岗。由于人们敬重忠义之臣，这坟墓虽历经无数个岁月，至今依然排列在枣阳这片热土上。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九连墩便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对象。今日听说发掘古墓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潮水一般地涌向九连墩，想看一看金头到底是什么模样。

凄美的传说，为古墓的发掘增添了传奇的光环。神秘与期待笼罩着整个发掘工作。而实地进行发掘，却要依据科学。2002 年 8 月份，湖北省考古研究所便派出专家，会同襄樊市、枣阳市考古队，实地进行了认真勘察，制订了一整套周密的现场发掘方案。10 月初，三级考古研究机构共选派几十人的考古队伍，在当地政府和高速公路建设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开始进行现场发掘的前期清理准备工作。

古墓惊现规模宏大的车马坑

前期发掘开挖工作，共进行了两个多月。11 月下旬，古墓穴的大致

轮廓已经展露出来。这是两个庞大的古墓，墓基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呈倒金字塔形状，每个共有十四级，每级台阶高的有一米多，矮的也有 50 厘米以上。一号墓口径面积约 1500 平方米。二号墓口径面积约 1300 平方米。墓道长均约 25 米左右，宽 5 米。墓坑垂直深度达十几米。据媒体报道，这是湖北省有史以来发掘的最大的古墓。

12 月初，发掘现场传出惊人的消息：在两座古墓的前方，均发现了保存完好规模宏大的车马坑。

一号车马坑有 33 车 72 马，南北长 53 米，东西宽 10 米，残深 2.3 米。二号车马坑有 7 车 16 马，南北长 22 米，东西宽 7 米，残深 2 米。一号车马坑粗犷大气。二号车马坑相比之下更显得精致细腻。每辆车的车盖、车辕、车轮全都用木头做成。车的轴头及其他饰物上的铜制装饰件，还铮铮发亮。大部分战车上的油漆依然可见。尤其是，一号坑有一辆与周天子齐尊的 6 乘（六匹马）战车；二号坑有一辆 6 号车，做工非常精细，花纹依然可见，车顶部还覆盖有幔帷顶篷，车轮均置于地槽中。车马坑里还出土了一批车軎、马镳、马衔等物品。马是活埋进去的，也发现有少数马似乎是射杀之后埋进去的，因为脖子上有钝器的痕迹。马与马之间马背相对。这些真马真车今天已如化石一般。在车马坑的一侧，有古城堡的痕迹显露出来。

著名考古专家谭维四说，这两处车马坑，是国内迄今为止发现的同类型最大的，保存最为完好的，场景最为壮观的兵马坑，超过了我国在此之前战国古墓发掘的任何发现！

车马坑的发现，为两座古墓披上了更加神秘的面纱。人们心中的悬念更加强烈。人们期盼知道，那古墓里面掩藏着的，到底是什么秘密。

诚如传说所说，也许真能挖出一颗金头来。真有金头，其实也算不上珍贵，最珍贵的是金头所展示的文明以及与文明相关的历史本身。当然，也不能排除挖出的只是两座空空的疑坟，因为传说有疑坟，又传说墓被人盗过。一号墓发现有一处幽深的洞痕，应该是盗墓贼们的“杰作”。

此时此刻，人们悬疑、期待、猜测。

人们等候开墓发掘的日子。

发掘现场大雪纷飞

九连墩古墓发掘惊动了北京，国家文物局局长、中国社科院专家、省府大员，一拨接一拨地到枣阳东赵湖这荒郊野外，来这里观瞻、研究、指导。主要承担发掘任务的省文物研究所与有关电视媒体接触，谈判独家现场直播发掘事宜，并最终12月21日至25日，为现场发掘和现场直播时间。

消息发布后，新华社、光明日报以及大公报、凤凰电视台等媒体共40多家，200多名记者云集枣阳，加上各路官员和研究人员等，潮涌而至，枣阳市与吴店镇大大小小的宾馆住得满满当当。

为了保证安全，发掘现场用铁丝网围起，省里还专门调来了武警部队，枣阳市的警察也积极配合，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进入现场必须持有通行证。省考古研究所和现场直播的电视台请来了许多全国著名的考古专家，共同研究发掘或做现场点评。

无奈，天公不作美，进行发掘工作的那几天，北风凛冽，长天雪飘，凄风、冷雨、飘雪，阴沉的气息似乎向人们铺陈一幕遥远缥缈且又雄浑沉重的历史画卷。九连墩处在黄土坡上，发掘现场泥水一地，穿齐膝深的胶靴还要弄得满身污浆。零下几摄氏度的天气，人冻得手脚肿痛麻木，身体不觉得是自己的身体，声音似乎也不是自己的声音。但考古人员并不觉得辛苦，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一生中能遇到这样一次发掘，便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

现场直播一、二号墓发掘

2002年12月21日，是现场直播一号墓开棺的第一天。在一声号音后，历史之门訇然推开，千古之谜次第展出，一个真实的过去开始逐次展现到世人面前。

两个墓都是五室，分为东室、西室、南室、北室、中室。中室为墓主人的“寝宫”。墓内两椁两棺，外形为方形，内髹红漆，颜色依然鲜艳。内棺为弧形。一号墓由于受过盗扰，内外棺均已塌陷。内棺开启后，有一具人体骨骸，约为一米七头向东，头顶处有一完好玉璧，尸骸的口部也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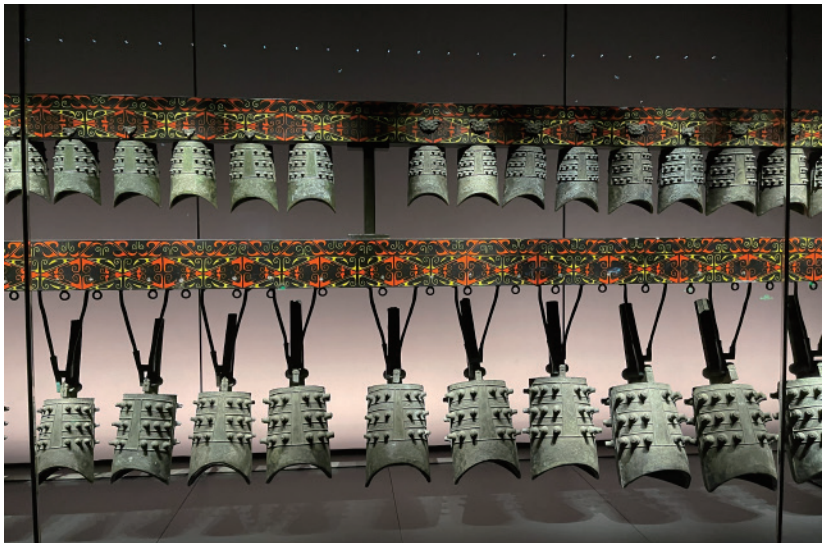
有一块玉，尸骸的南部有一副青铜佩剑，尸骨表面有大量碎片，很薄且呈黑色，为墓主人下葬时裹着的丝织品残片，已经炭化。二号墓，除了渗水，椁棺一切保存如葬时的风貌。二号墓的墓主，身高在 1.5 米上下，初步确定为女性。

好在这两座古墓并没有被盗。在前期清理墓围时，考古人员在一号墓发现了一条盗洞，怀疑该墓可能已经被盗。待清理至椁土时，发觉盗洞是从东南角打下去的，近二十多米深，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人员才发现盗洞只打到椁室外的青膏泥上，并没有深入墓室。这是因为，一号墓临近一湖塘，经长时间地下水的渗浸，墓室已完全被水淹没，盗贼不知深浅，因此望而却步，墓室里的文物才得以保存完好。地下水对文物的保护有利有弊，譬如地下水对文物有一定的腐蚀，但总体来看，利大于弊。俗话说“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地下水对于防盗贼，是极为有效的。这两座楚墓这样选址，是否另有深意呢？二号墓已经不知在什么朝代被夷为平地，不显山不露水，自然不会引起盗贼的注意，所以二号墓连一点被盗的痕迹也没有。

考古发掘共出土文物 4000 多件

经过近一周的发掘整理，两座古墓的考古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

——这是一次楚礼器发掘的大丰收。一号墓与二号墓各出土 11 件大型镬鼎，其中有一个鼎的鼎耳就有 30 厘米长，鼎体直径 82 厘米，通高 93 厘米，是迄今为止我国楚墓出土的体积最大的铜鼎。因为鼎在礼器中是核心重器，这就为确定墓主的身份提供了最主要的依据。墓中出土有一盏人擎灯，造型独特，工艺精湛，铜人手擎灯台，另一只手上还停有一只小鸟。人擎灯的铜人服饰清晰可见，眼神生动传神，这种造型别致的“人禽同灯”，在全国文物发掘中还是首次发现。一号墓中出土的礼器多是青铜器，还有大量的铜剑、盘车伞、戈、箭、戟、盘、削等文物。在二号墓中，出土有大量的仿铜木制礼器，如壶、敦等，还有耳环、漆连、漆盒等珍贵文物。这些木制礼器是战国楚墓中首次出土的礼器文物，引起了考古专家和人们的极大兴趣。考古人员还在二号墓的东室发现了两件木制人偶，



2002 年枣阳九连墩 1 号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编钟

一个略显粗壮，一个显见修长，应是一对男女。北京社科院及省级的考古专家们说，在这里能够看到九鼎八簋、五鼎四簋的组合，是较为奇特的现象。在二号墓的北室，还发现了一辆冥器车，车为拆开式，分开装置，轮子由整木做成，同时还发现了一套用青石做成的编磬，还有铜马、麻鞋等十分有特色的文物。

——这是一次楚乐器考古的大丰收。共出土乐器 90 余件。武汉音乐学院李幼平博士等四名音乐专家一直守候在发掘现场。两个墓室共出土了四组编钟，二号墓的编钟架至今还直立地靠在墙边，分上下两排，上排是钮钟，下排是甬钟。除一只坠落外，其余仍保留下葬时的原貌。编钟横梁上的彩绘花纹清晰可见。除了编钟，这里还发现了笙、琴、瑟、鼓等一大批保存较为完好的乐器。两只完整的瑟的枘上还保留有弦痕。尤其令专家学者们兴奋的是，这次在笙管中发现了十余枚铜制簧片，体积非常小，每枚只有一片瓜子那么大，竟能完整地保存下来，这对研究当时的乐器制作、发声及音谱，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二号墓发现的凤鸟虎座架鼓，仅比天皇观楚墓发现的同类器物体积小一点儿，但制作之精、花纹之美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出土的一组钮钟，明显有调整过音阶的迹象，说明

2002 年枣阳九连墩 1 号墓出土的战国时期鉴缶，主用于冰酒或温酒

是墓主人生前曾弹奏用过的实用物。

——这是一次楚文化发现的空前丰收。除了前面提及的那些文物，在二号墓，还发现了近 2000 件保存较为完整的竹简。这些竹简每枚宽约 1 厘米，长约 30 厘米，其数量是中国历代以来楚墓中出土竹简最多的一次。由于长时间的浸泡，竹简已经软得像煮熟了的面条。这些竹简的出土，也许是这次九连墩发掘最为重要的成果。考古专家王红星认为，这批竹简不像是随葬器物清单的遣策，很可能是一部书籍。如果是一部书籍的话，由于秦时焚书坑儒，留下来的文字极其有限，能够流传下来的人们又多怀疑是“伪书”，所以这竹简可能有不可估测的价值。1993 年从郭店一号墓出土的 800 余件竹简中，发现了年代最早的《老子》传抄本，使《道德经》面世，起到了为历史定位的作用。竹简传递的文字信息最为稳定真切，不像实物信息易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国正是因为楚简的大量出土，才填补了先秦文化研究的空白，被称为中国文化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考古发现。因为只有在南方，竹子作为记录文字的工具，资源丰富，刻写方便，又能长久保存。这批竹简在现场密封后，将运回国家博物馆进行化学处理，去掉竹简表面的淤污，用显形液显露出墨迹后，请相关的专家释文编联，竹简的内容便会昭然天下了。

——这是一次两千多年前楚人生活奥秘的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打开二号墓紧邻棺木的封板后，首先发现水中漂浮着一个黑色的果盘。因年代久远，果盘已有裂缝，但仍可断定是漆器。在果盘四周，散布着许多炭化的板栗和红枣，形状和现在的一样。二号墓出土的文物大部分是生活用品，

如酒具类、装饰类、工艺品类等，这对于研究古代楚人的生活有很重要的意义。

这次发掘，九连墩一号墓与二号墓共出土文物 4000 多件，涉及礼器、乐器、兵器、生产生活用具等方方面面。考古专家感叹：能参与发掘这样的古墓，一生足矣！湖北省博物馆王红星博士说，这次考古发掘是湖北省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丰富的一次，这次考古活动可能会被评为中国 2002 年考古十大发现之一，众多的发现让国内权威专家非常震惊。通过发掘这个墓葬，可以解开楚国历史上许多不解之谜。

墓主人身份仍然成谜

令人有些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墓主人的身份仍然还是一个谜团，因为发掘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的文字记载。也许这些记载隐藏在还没有被破译的竹简里，或者哪一个物品有铭文还没有清洗出来被人们辨认。尽管如此，大家还是纷纷猜测：一号墓主是位身份仅次于楚王的侯王？是位大将军？二号墓主真是位女性？她与一号墓主是什么关系？二号墓虽然墓基的面积小一点儿，兵马坑的车马少了一些，可是深入椁室的台阶也是十四层，椁室也是五个，这又是什么原因？据湖北省文物局局长沈海宁推测，一号墓墓主的身份很可能是封君以上的人物，他与二号墓主的关系可能是异穴而葬的一对夫妻。

楚人爱厚葬，说明了当年楚国的繁荣，证实了当年楚国生产力发展处于较高的水平。

据权威资料证实，中国迄今为止一共发掘了 6000 多座楚代古墓，像九连墩这样的古墓，获得如此丰厚的发掘收获，却是前所未有。

楚国立国 800 年，对外扩张的历史就有 530 多年，先后鲸吞了 73 个国家。战国中期，楚国处于全盛期，疆域极其广阔，几乎占据中国整个南方，“沮、漳、江、汉”是楚国的统治中心，枣阳这一带正是楚国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因此也是楚墓分布极为集中的区域之一。

历史悠久的楚文化不断被人们所发现，不断地给世人许多意外的惊喜和收获，主要来源于对古墓的发掘。楚国 800 年灿烂历史的真实，竟主

要是在众多的楚墓里得以保存下来！

九连墩发掘出来的众多国宝级文物，无疑打开了通向楚国历史辉煌的又一扇大门。其中鲜为人知的秘密，还要专家们考古研究之后才能作出更加权威翔实的回答。

何新恩 ①

楚望台：从皇家建筑到辛亥首义军大本营

楚望台又名楚王台，位于武汉梅亭山。它的历史起源于朱元璋与儿子朱桢的父子情。清末，湖北新军在这里兴建了全国最大的军火库之一。武昌首义发难后，楚望台成为起义军第一个夺取的据点，也是他们的临时大本营。这些历经百年风雨的记忆，如同一部立体的“时代档案”，见证着当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赋予武汉城市文化独特的内涵。

楚望台

在初夏的周末，天气晴好，我踏访此地，才知这方古城墙和楼台亭阁原来大有来头。这里，就是楚望台，位于武昌梅亭山，今起义门左侧山冈。

从武昌火车站右拐，步行约一刻钟，右前方就有一座突兀的山丘。沿着登山步道，拾级而上，抬眼即见半山坡上耸立的景观石，上面有原文化部孙家正部长题写的“楚望台”三个大字，笔力雄健，引人注目。碑石背面书写的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严昌洪教授对楚望台的考证小史。

楚望台

① 作者系湖北省商务厅制度创新处处长。

严教授考证了楚望台的来历，其间隐藏着一段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其子朱桢的父子情。

元朝末年，朱元璋追击陈友谅余部至武昌，曾驻扎梅亭山，并接受大汉陈友谅之子陈理纳降；恰好在此闻讯得第六子，朱大喜曰："子长，以楚封之。"

朱元璋称帝后，于洪武三年（1370 年）封第六子朱桢为楚王。洪武十四年（1381 年）朱桢就藩武昌（楚昭王）后，在梅亭山上修建"封建亭"，勒石为碑，上书洪武帝分封楚王的御制碑文。朱桢不忘父皇之恩，常在此遥望帝都南京，又建"楚望台"，故梅亭山一带亦称楚望台，是明清两代武昌较为著名的风景名胜之地。

如今，"楚望台"碑及"封建亭"均已重建。从楚望台石碑往上走几十步，就到了梅亭山顶的封建亭。亭中为一尊背驮石碑的石龟，昂首向东；石碑上刻写朱元璋诏封楚王的御制碑文。

楚望台（梅亭山）与蛇山、凤凰山一样，曾经是拱卫武昌城的"三山"之一，地势险要，具有极重要的军事意义。清末湖北新军在此建成全国乃至远东最大的军械库，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首义打响第一枪后，义军迅速抢占楚望台军械库，后各路起义军集结于此，楚望台一时成了起义军的大本营。起义军在此补充弹药后，发动了向湖广总督府、张彪第八镇司令部的进攻。因此，楚望台在辛亥首义中具有浓墨重彩的历史地位。

1981 年、2011 年武昌区在辛亥革命 70 周年、100 周年两度重修楚望台及起义门，建成了楚望台遗址公园，为国家 4A 级景区，现属武昌城区中心开放式公园。

多少楼台亭阁，几度风雨沧桑。楚望台得名于明朝洪武帝为巩固帝制而封土建王的一段父子佳话，最终却因有功于推翻二千多年帝制而在史册上熠熠生辉。时光绕过了五百多个的年轮大圈，在历史的大书上，把楚望台的前世今生写得格外凝重、厚实。

起义门

从封建亭左侧步道下行，穿过一段灰砖古城墙，就到了起义门。

起义门城楼远眺

“千年武昌看此门”。起义门原名“中和门”，是自明朝确定武昌城市格局后，至今唯一保留的古城门，旧址位于现在首义南路。

在武汉三镇，唯有武昌有古城墙，始筑于三国吴国孙权时期黄武二年（公元 223 年），在唐朝末年扩建，到明朝洪武年间特别是朱元璋六子朱桢就藩楚昭王后，大规模兴建武昌城，辟有中和门、汉阳门、平湖门等九门。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督鄂后，增设通湘门，形成了武昌古城十门。

1911 年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第一枪在这里打响，被誉为“首义胜利的开端”。为纪念武昌首义的胜利，中和门改名为起义门。近现代以来，武昌古城屡遭损毁，而起义门因在武昌首义中发挥重要历史作用而得以幸存。1956 年被公布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1981 年为纪念辛亥革命 70 周年参照原貌复建城门楼，2011 年在辛亥革命 100 周年之际再次修缮。

起义门是武昌古城仅存的一座城门，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

如今，两度修缮后的起义门巍峨雄壮，飞檐翘角，朱红楼阁，凝聚着武昌古城的厚重历史。

近 1800 年的武昌古城，600 余年的起义门，见过了朝代兴衰，几度更迭。在起义门爆发的武昌首义，彰显了这座城市敢为人先的精气神和选择担当的时代自觉，弥足而珍贵。

首义碑林

从首义门城楼下来，进城门洞，就看到了中国书协前主席、书法大家沈鹏题名的“首义碑林”。

首义碑林系 2011 年武汉市纪念辛亥革命·武昌首义 100 周年兴建的现代碑林，由景观石刻、碑林长廊、组合碑墙和情景雕塑等部分组成，集孙中山、黄兴、黎元洪等辛亥元勋的书法、题词及现代国共两党要人、书法名家对辛亥革命人物和武昌首义功勋的纪念与评价，共计碑刻、石刻 100 方，占地面积 1.4 公顷。

武昌首义碑林雕塑群

首义碑林与历史遗址“楚望台”、建筑文物“起义门”，共同呈现出武昌古城的来世今生与丰功伟绩。武昌首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为两千多年封建帝制鸣枪送行，也掀开了自夏商周以来以较少流血牺牲，实现和平更迭政权、走向民主共和的序幕。

辛亥革命后百余年来，虽说历史起伏跌宕，政权几经易手，但民主共和的旗帜始终高高擎起、迎风飘扬，这就是辛亥革命最大的政治遗产。而我们现在共同美好的祈愿，也正如首义碑林中一方书法名家的题词所言：“革命先烈精神不朽，起义城门永世长存！”

蔡华东 ①

海峡不隔故土情　老歌乡音中秋甜

——蔡琴“银色月光下”演唱会纪事

楚天都市之夜活动现场

由楚天都市报主办的“楚天都市之夜”，20 世纪之初一轮轮歌舞江城，反响热烈。2008 年被评为“湖北省重大宣传文化活动品牌”。特别是其间一场场“纳凉晚会”，选点在洪山广场、中山公园、东湖公园、武昌江滩等大众休闲娱乐场所，往往是成千上万的市民扶老携幼、摩肩接踵，台上台下汇成欢乐的海洋。

都市报是市民的报纸。都市报要为活跃、丰富、繁荣江城文艺、服务市民文化生活做出自己的一点点贡献。这是都市报人的心愿。

在这数以百计的演出活动中，我最难以忘怀的是，2004 年 9 月 28 日，在洪山体育馆举办的蔡琴“银色月光下”演唱会。

蔡琴，著名台湾女歌手。有人说，凡有华人的地方，都有她动听的

① 作者曾任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总编辑、第十届省政协常委，第十一届省政协委员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歌声。她 1957 年出生于台湾高雄。成为艺人后，给报纸写专栏、全球巡回演出、主持广播电视节目……获奖多多。

为什么要与她合作举办演唱会？一个原因，她的根在湖北，她热爱着、向往着，要回到这片土地上唱出自己的歌。

缘起祖父蔡汉卿

蔡琴的祖父，是原鄂军第四师师长蔡汉卿（1882—1952）。史料记载，蔡汉卿，湖北沔阳（今仙桃）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辛亥元老。武昌起义时，南湖炮队居功至伟。蔡汉卿向清总督衙门打响了第一炮，时人撰联赞其“揭竿汉上为先著，立马蛇山第一功”。蔡汉卿别名蔡希圣，人称“蔡一炮”，后任鄂军第四师中将师长。1952 年在武昌病逝。

蔡汉卿，是沔阳杨林尾镇蔡三家人，农民出身。壬午（1882 年）年正月十五诞生于沔阳老湾乡（今属洪湖市老湾回族乡沙洲村）前墩。十四岁丧母，十六岁丧父，孑然一身，遂投靠于舅父家，一面打工放牛，一面跟着老表们在私塾中学点写算，由是稍通文墨。年稍壮，常转徙于邻近州县，赁作糊口，也曾至蒲圻柳山一带荒湖中砍割柴草以贩卖，希图成家立业。无奈家乡频遭水旱，“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生活艰辛，加以清廷腐败，政令苛酷，因此滋生了蔡汉卿的反抗情绪，暗中参加了具有反清性质的帮会组织“圈子会”。后来，蔡汉卿参加帮会一事，为地方官绅所闻。一次蔡汉卿回到前墩，即被湾子里刘澄魁逮住。在送往官府途中，被同村捐有功名的刘澄之撞见，刘澄之出于同情，要刘澄魁把蔡汉卿放了，还给了他百十文钱，叱其即速逃命。家乡是待不住了，于是蔡汉卿便与史定邦等人一道流落至武汉。蔡汉卿到武汉后，先是打工度日，参加武泰闸等的修建工程。后通过同乡、当时已是南湖炮八标排长的刘鼎丞，引荐入伍当兵。其时军营中已有革命组织，蔡汉卿不久即加入共进会并为炮队代表之一员。

1911 年 10 月 9 日，彭、刘、杨三烈士就义，是为直接导火索；同年 10 月 10 日晚当邓玉麟、李春萱将起义的通知传达至炮队时，7 时许塘角辎重营的火光，宣告起义的号角已经吹响。早已按捺不住的炮八标官兵纷

纷摩拳擦掌，跑出营房。蔡汉卿即赤膊上阵，伙同夺炮欲出。时有队官试图拦阻，蔡汉卿说“你若阻拦，今日有你无我”，遂一脚将其踢翻，推炮至操场，首先向马队方向发炮，促其起事，继而向楚望台进发。蔡汉卿率山炮四门登起义门城楼，朝清总督衙门方向射击，各起义部队，见此斗志倍增。但黑夜中目标不明难以命中，围攻督署的部队将小都司巷一当铺献出的所储煤油燃烧起来，顿时火光熊熊，照得督署一派通明。蔡汉卿乃以其旗杆为目标，连发三炮击中督署签押房。此时清总督瑞澂及第八镇统制张彪，见再不能据督署顽抗，于是遁上楚豫军舰逃逸。

蔡汉卿也曾参加刘家庙等战役。一日在战斗间隙回营休息，当欲脱下皮靴时，有一只却拉也拉不动，才发觉系小腿受伤血液黏结所致。在前线由于精神高度集中于战斗，虽已负伤竟毫无察觉。当时革命军同仇敌忾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1938 年武汉沦陷前，蔡汉卿一家住进法租界的一个买办潘恕安家中。一天，潘家空着的楼梯转折处的亭子间里，突然住进了一个人，他就是石星川。原来，日寇在入侵武汉前便放出风声，欲以高官厚禄收买某些人。国难当头，岂能当汉奸？蔡汉卿便邀石同赴四川，一起上了轮船。哪知当船将启碇时石星川却避着蔡汉卿，偷偷下了船。当日寇占据武汉后不久，石星川便出任了伪职，直至抗战胜利后，石终因汉奸罪受到惩处。蔡汉卿赴川，辗转至离重庆几十里地的山洞镇，定居于平正农场 18 号。抗战烽火连天，蔡家与全国民众一道，盼望着抗战胜利的那一天。1945 年深秋，蔡汉卿一家与邬晓丹家结伴顺江而下。途中一共走了 12 天，险情迭生。回到武汉后，蔡汉卿每当双十节即来到武昌烈士祠，祭奠先烈且与辛亥老友聚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时任湖北省副省长熊晋槐等介绍，蔡汉卿正欲参加民革组织，为新中国的建设聊尽绵薄，不幸于 1952 年因脑出血逝世于武昌，享年 70 岁，葬于武昌公墓。

蔡汉卿育有两女两男。1944 年，蔡汉卿出于抗日的动机，把尚在沙坪坝中学读高二的老大蔡世骏，送至美国接受海军培训。大陆解放前，蔡世骏随国民党部队去了台湾。后来他脱离军界，当了一位远洋轮的船长。

1988 年前后，他准备回内地探亲，不幸发生车祸，多年诊治未愈，于 1993 年去世。

蔡琴便是蔡世骏的长女、蔡汉卿的长孙女。

一脉相承，血浓于水，故土情深。当蔡琴有了回故乡演出的念头后，都市报即欣然冠名协办这场演出。

情动楚天都市夜

时间，定在 2004 年中秋佳节之夜。

中秋节，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又名团圆节，与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并称共著。中秋节，以月之圆满兆人之团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古往今来，寄托多少的情思！

地点，选在洪山体育馆。

曲目，按照楚天都市报文艺活动宣传报道擅长的“造势”做法，提前几天由广大市民投票选定。结果，经过千余名歌迷投票，“以下十首歌曲得票最多，从蔡琴千余首作品中脱颖而出，殊为不易”。其评选理由简述为：

蔡琴情动楚天都市夜。图为中秋明月老歌乡音演唱会现场

排第一的是《恰似你的温柔》——相信每个经历过那个温情脉脉时代的人，心底都会萦绕着这支动人的旋律，尽管岁月在变、容颜在变，这首作品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一直不变。第二是《被遗忘的时光》——蔡琴唱回忆是山温水暖、哀而不伤。这首《被遗忘的时光》收录在蔡琴最经典的老歌专辑《民歌蔡琴》中，但为大家熟悉却是因为电影《无间道》。她那低沉婉转的歌声，是细

雨敲窗的心事里淡淡的一幅剪影画。第三为《你的眼神》——它是爱意初萌的沉默之语，是满心欢喜欲说还休的爱慕之歌，是能穿越时代的界限打动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歌。第四为《出塞曲》——相较于张清芳清亮高亢的嗓音，蔡琴的低醇嗓音更能表现那永不湮灭的乡愁。第五为主题曲《银色月光下》——蔡琴唱出的这首哈萨克民歌，有种难得的清澈与明亮。其后，依次是《读你》《最后一夜》《把悲伤留给自己》《在那遥远的地方》《南屏晚钟》。

“回湖北开唱百感交集。”这是蔡琴接受都市报记者查昭采访说得最真挚的一句话。查昭说，用“未见琴人，先闻琴声”来形容与蔡琴的对话十分贴切，不仅在于她醇厚动人的歌声陪伴我们多年，更在于我们还没走到采访间门口，已听见一串爽朗的笑声。“笑得这样畅快淋漓，是蔡琴给我的第一印象。”

这次的武汉演唱会是蔡琴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她一再说“百感交集”。“如果爸爸还在的话，他肯定会一起回来，和湖北老乡一起听我的演唱会。”说到去世的父亲，蔡琴的眼睛红了。“但如果生命能用较宽广的角度去想，用演唱会的方式回家也不错。因为生命不只是乡愁，还有生命力。我父母为养育我这个女儿自豪，如果到时来听演唱会的观众也能为湖北出了个蔡琴而光荣，我觉得就是音乐和生命很好的结合。”

蔡琴原定 9 月 7 日提前回家和“琴迷”会面，但她却因故而无法成行，对于这个遗憾，蔡琴说：“全世界最该体谅我的就该是湖北。”因为欧美华人的极力推荐，蔡琴刚获得与全球众顶级歌手竞争联合国慈善代言人的机会。9 月 6 日，她要赶赴美国参加竞选演出。“我必须去，这不仅是蔡琴的光荣，也是湖北的光荣。”蔡琴准备届时演唱《茉莉花》和《I WISH LOVE》，“假如落选了，我就在武汉演唱会上唱给你们听，让你们给我评评公道。”这时的蔡琴，俏皮又自信。

蔡琴评价自己唱歌：表面不激动，其实满怀深情，歌声里有种自在和宁静，会让听歌的人终于听到自己心里的感觉。“他好像是喜欢上了蔡琴的歌，其实他是喜欢自己。”

9 月 28 日上午，蔡琴抵达天河机场。接机的人群中，没有醒目夸张

的横幅，没有“追星族”此起彼伏的尖叫声，只有几位手持鲜花的女歌迷文静地守候着。当一袭绿衣的蔡琴款款走出通道时，迎面送给她的是：“蔡琴，欢迎回家！”蔡琴接过芬芳的百合，笑容灿烂，语气也特别激动：“谢谢！蔡琴终于回家了！”

为了当晚的演唱会，蔡琴虽然踏上故土，却无暇多走多看，而是立马投入走台等准备工作中。音乐总监透露，蔡琴的走台，绝不是简单试试场地、音响，而是“把整场演唱会从头到尾唱一遍”。“我要用最好的状态站在故乡的舞台上，今晚你们就瞧好吧！”这就是蔡琴，气定神闲，自信满怀。

老歌乡音慰故人

当晚，天澄风微，当一轮明月冉冉升起，座无虚席的体育馆内，演唱会如约而至。“我是蔡琴——您郎们好！”一袭蓝色裙衫飘然而至，不太纯熟的湖北话热情洋溢。见大家全笑了，她深情地说，“虽然我几十年没有说过湖北话，但我是一个湖北人。我第一次回家开演唱会就能和大家一起过中秋节，有多幸福难以描述，唯有用歌声来献给你们哦。”当她将一首全新的作品《我的兄弟姐妹》献演时，第一段唱出即博得全场掌声。蔡琴回家乡，为家乡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唱出《我的兄弟姐妹》，娓娓深情，让多少人眼中噙上泪花。

“今晚，中天月圆，家乡水甜，我是最幸福的人——有你们来听我唱歌，更有我的叔叔来看我了。因为工作的关系，有一位亲人我一直不敢去联络，他就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亲叔叔。叔叔，您坐在哪里？”“我在这里。”——观众席上，一位老人在晚辈搀扶下站立起来。全场掌声雷动。蔡琴，这个坚强的女人不禁热泪盈眶。中秋月圆人团圆，蔡琴在武汉演唱会上与叔叔第一次相见，全场观众是这场亲情相聚的见证人。

蔡世骥老人，蔡琴素未谋面的亲叔叔。蔡汉卿次子、蔡世骏二弟。蔡世骥，又作蔡世驹。1936 年出生于武汉，1956 年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 年平反后，被安排到武汉市环卫局地方志部门工作。1981 年调入武汉市图书馆古籍整理部工作。1985 年加入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88 年调入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工作。1990 年曾担任武汉市武昌区第八届政协委员。1996 年退休。

蔡世骥一生生活清贫、为人谦逊，潜心学问，著述颇丰。20 世纪 90 年代，与他人合作著书，先后参加《图书馆管理学》《儒道佛名言辞典》《白话十三经》《白话诸子集成》《元曲名篇故事》《中国精神文明年鉴》等书籍的编写工作，成果累累。2000 年以后，主要参与了两个大部头著作的撰写和整理。一是在 20 册《楚文化知识丛书》中撰写《怀楚情思——历代诗人咏楚国》一书。二是孜孜不倦整理卷帙浩繁的《中国历代战史》，直到耗尽最后的心血。另在各级报纸杂志上发表研究老子、孔子的论文多篇，影响颇大，被多部研究文库收录，为后人所引用。

令人唏嘘的是，此次相逢不及两年，2006 年 5 月 10 日，蔡世骥因肺癌走完了人生的旅程，享年 70 岁。

“叔叔，您坐下，继续听我唱歌吧。”银色月光下聆听琴声悠悠，乡音问候里且见笑泪盈盈。乡情、亲情，浓浓酽酽，如醇酒醉人。

这是一个人的演唱会，除了乐队，再没有配唱、协唱、伴舞嘉宾，恰似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蔡琴的美丽适合在舞台上绽放。她的舞台服装全是自己亲自设计、挑选布料。她出场的四套演出服各具风采：紫色华服雍容高贵，蓝色裙衫飘逸迷离，粉色晚装清新甜美，银色旗袍典雅隽永，同时很好地配合了演出曲目的风格。蔡琴也是灵动的，她随着歌曲的节奏跳起优美的舞步，摇曳生姿。我在现场看到，全场观众，或激昂或缄默，或热烈或沉静，或大笑或欢呼，都随着蔡琴的歌声或语言而生而动。蔡琴不仅是个杰出的歌者，还是优秀的主持人、舞台剧演员。因此，蔡琴的演唱会，歌是一绝，脱口秀更是一绝。“我可以唱它一千首”“我可不是‘一夜琴’”……人们为她的妙语连珠而激赏，为她的幽默诙谐而捧腹。我身边的一位长者禁不住赞叹：“一个女人一支话筒，她就这么轻易地征服了洪山体育馆的八千观众，了不起。”

蔡琴在唱完父亲小时教她唱的《绿岛小夜曲》后，深情地追忆起已去世的父亲，“爸爸并没有给我们什么财富，但他给了我最值钱的教育，那就是快乐！”然后朝向叔叔所在的区域，动情地一鞠躬道：“叔叔，你是

爸爸最爱的弟弟，你一定要原谅我没有去看你，因为我要准备这台演出，它要轰动武汉！所以叔叔你一辈子都会以我为荣，因为你的哥哥培养了一个这么棒的女儿！”蔡琴说得情真，观众听得意切，听到全场潮水一般的掌声，蔡琴骄傲地向叔叔一扬头：“你看我有这么多的歌迷！”那一刹，她不是一个叱咤歌坛的民歌天后，而是一个惹人怜爱的小侄女。

最后一曲《恰似你的温柔》历来是她的演唱会的高潮，蔡琴唱完第一遍就哭了，她哽咽地说：“叔叔，我们永远在一起！”而全场观众的大合唱为蔡琴的心情作了最好的注脚：“到如今年复一年，我不能停止怀念，怀念你怀念从前……”

中秋佳节，回到故乡，蔡琴是幸福的，“明月千里寄相思”“月亮代表我的心”，她能在亲人的面前奉献一台倾吐心声的音乐会；家乡的亲人也是幸福的，因为我们见证了“海峡两岸一家亲”的温馨时刻，一起度过了美妙圆满的中秋之夜！

（特别感谢查昭、仙桃文史提供资料）

人物春秋

杨旗[①]　胡继雄[②]

周恩来批准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的飞行员杨培光

1949 年前后，一些国民党飞行员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追求真理，向往光明，毅然摆脱反动当局的严密控制，接连不断地驾机起义，投向人民的怀抱。杨培光是继刘善本之后，在辽沈战役的序幕刚刚拉开的时候，驾驶 P–51 战斗机从北平南苑机场起义的第二个国民党飞行员，后经周恩来亲自批准参加开国大典阅兵飞行。

外地求学与毅然从军

1919 年 8 月 26 日，杨培光于湖北省应城县（今应城市）出生，祖辈以种田为主，到了祖父时，家里还开了一个做豆腐的小作坊，生活也逐渐好起来。后来，因家中连续遭灾祸，日子越来越艰难，到杨培光上中学时，父母只得靠借高利贷替他交学费。杨培光的乳名和在小学读书时的名字叫杨天贵，因为高小未毕业要跳级考初中，就用他叔叔杨培光的小学毕业证明去报了名，在家结婚时又取了大名杨天潘。杨培光初中毕业后离家到汉口当了半年国民党的宪兵，他觉得没有意思，就再也不用“杨天潘”

① 作者系杨培光之子。

② 作者系时任应城市政协文史委干部。

杨培光

这个名字。虽然家里人和亲戚朋友都称呼他“天贵”，但对外则始终用杨培光的名字。

应城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根据地，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儿童团闹得很红火；土地革命时期，贺龙的红军在这一带活动。1937 年 4 月，中共党组织在应城开办了“汤池训练班”，由陶铸以中共党员的身份主办，杨培光报考被录取了。在训练班里，教师讲一些时局形势和青年如何爱国的问题，杨培光在此受到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头脑中开始有了国家、民族的观念。9 月，训练班结束后，经老师介绍，杨培光到武汉大学工学院工厂当学徒工，有了固定的工作。可好景不长，日本侵占上海后，武汉大学被迫迁往四川，工厂停办，杨培光失业了。这时，杨培光切身地感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种种苦难，十分仇恨日本士兵。于是，杨培光决定去参军，一来可以报效国家，二来也可以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那时在武汉可以报考的学校很多，如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中央航空学校、机械学校，还有陕北的抗日军政大学、山西的民族革命大学等。杨培光报考机械学校没有录取，后来又报考中央航空学校的飞行生 (即飞行学员)，结果录取了。

1937 年 12 月，杨培光入伍来到湖南长沙，住在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这里环境优美，游人如织。第二年 3 月的一个星期日中午时分，天空突然出现了 9 架日本飞机，一阵狂轰滥炸之后，岳麓山旁到处都是瓦砾、死人，景象惨不忍睹。杨培光看到这些，更加激起了对日本士兵的仇恨，立志要尽早学会飞行本领，替死难的同胞报仇。

1938 年 10 月，杨培光正式进入成都中央航空学校军士分校学习飞行。1940 年毕业，分配到飞行部队当飞行士 (即士官飞行员)。那时，国民党空军飞行士与飞行员都是从事飞行工作的，但待遇大不一样，比如飞行

士是士兵待遇，只能剃光头，飞行员是军官待遇，可以留分头；比如就餐，飞行士在士官灶就餐，飞行员则在空勤灶就餐。因此相互隔阂越来越深。

有一次看电影，飞行士们在前面席地而坐，而飞行员则坐在后面舒服的椅子上。电影上映后，杨培光等人上厕所，影响了坐在后面看电影的飞行员，有的飞行员便破口大骂飞行士。于是，飞行士和飞行员之间大打出手。第二天，飞行士集体罢飞，不上机场参加飞行。这时，正赶上第一夫人宋美龄来飞行基地劳军。她得知这情况后，立即与蒋介石联系，决定飞行士和飞行员在生活待遇上一律平等：可留分头，吃空勤灶，够条件的一律提升为飞行军官。杨培光因此很快就提升为飞行军官。他先后驾机参加对日作战 30 多次，立有战功。如 1944 年初，日寇进攻衡阳时，杨培光曾驾战机轰炸日本江上补给线，几度出生入死。

1944 年 10 月 4 日，杨培光与张慕贤结婚。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培光看到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发动内战，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发国难财，愤慨不已。但促使他驾机起义投奔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原因，还是贩卖黄色炸药。

黄色炸药与决然起义

杨培光在自传里写道：“说起来咱是逼上梁山的……如果要说是什么人介绍我参加解放军的话，那就是黄色炸药，就是国民党军法科的法官。”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地盘越来越小，只剩下锦州、沈阳、长春 3 个孤立无援的据点，造成地面交通断绝、生活用品极为匮乏、各地物价不平衡。国民党空军的很多人就利用自己飞行的便利大做买卖，香烟、金条、西药等物品哪里价格高他们就往哪里运，从中图利。

在东北一些大城市里，日本投降后丢下许多黄色炸药，用一盒香烟就能换半面粉袋的黄色炸药，再用飞机捎到北平就能一本万利。杨培光所在的飞行中队，包括他和中队长在内的许多人都参与了黄色炸药的买卖。在沈阳买北京卖，杨培光卖了几次赚了不少钱。由于担心黄色炸药贩卖到共产党手里，所以在当时是犯法行为。正巧沈阳城防司令部抓住了一个倒卖黄色炸药的商人，在审讯中他提及了杨培光的名字。

随后，沈阳城防司令部几次传讯杨培光，叫他去谈谈情况。当时沈阳形势紧急，作战任务繁重，飞行中队推托时间紧没有空，未让杨培光去。此后，沈阳城防司令部也不再追查了。

辽沈战役开始时，杨培光所在飞行中队驻守北平南苑机场，当时他任上尉分队长。1948 年 9 月 23 日，正是济南解放的前一天，下午 1 点多，杨培光驾驶 P–51 战斗机从济南前线执行侦察任务回来，刚吃完午饭想睡个午觉，却看见一个自己并不认识的人，腰间带着手枪，由中队长陪同坐着吉普车来宿舍。过了一会儿，中队长把那个家伙留在他的房间里，自己出来找杨培光，并且把一份传讯杨培光到军法科去审问的公函交给他看。

杨培光看完后说：“我走了！”

同杨培光关系密切的中队长关切地问他到哪里去，家里怎么办。杨培光回答说：“我自然有地方去，只是家里请你们照顾一下。”因为倒卖黄色炸药的事很多人都有份，所以中队长也不便把杨培光怎么样，只是说：“你考虑考虑吧，我把那个人留在房间里谈谈。”

杨培光没有回房间多穿件衣服，只拿了一张地图、一顶飞行帽、一个保险伞，就自己开着汽车上机场了。一到机场，杨培光就问机械士：“飞机上的油弹加好了没有？”机械士告诉他，全都加好了。“我要把飞机滑到值班线上去！”说完，杨培光就登上了飞机，立即开启发动机，连飞行帽、保险伞都没有扣好，飞机滑进跑道就起飞了。这时，耳机里传来了指挥室的追问：“你是谁？为什么上跑道？”杨培光不作回答。起飞后，杨培光低空绕过北平城，一直向北飞行，到了顺义机场上空，又听见无线电里叫起自己的名字来，先是作战科长、大队长，最后副司令官陈嘉尚也叫开了，都是叫他回去，一切由他们负责，保证回来无事。可惜那时慌忙中杨培光忘记带上话筒，不然还真要痛骂他们一顿！后来，他们又派飞机追击，但是飞反了方向，往南追到石家庄去了。

杨培光原想到东北辽源机场着陆，由于遭到地面炮火射击，就改变主意向四平飞去。天黑前，杨培光才飞到了四平机场上空，着陆时已经看不清跑道了，便打开着陆灯。飞机落地后，地面执勤的解放军战士得知他是起义的，进行了热诚欢迎。

当时，陶铸是东北某省的书记兼军区政委。他听到杨培光起义的消息特别高兴，立即派人将杨培光接到白城县城，亲自接见并亲切交谈。原来 10 年前在湖北应城时，杨培光曾与陶铸相识，这次重逢让杨培光心情激动。陶铸政委表扬杨培光驾机起义是背弃黑暗、追求光明之举，鼓励他当好人民的飞行员。

随后，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 1000 多人冒着被国民党飞机轰炸的危险，在四平剧院召开了欢迎大会，祝贺杨培光驾机起义归来。

那时，东北老航校正急需飞机培训飞行员，便立即派人赶赴四平接收起义人员和飞机。杨培光由驻军安排，飞机则由部队现场看守。在既无牵引车又找不到平板火车皮的情况下，只好动员当地军民把这架飞机隐蔽在附近的农村。待长春解放后，这架飞机才用火车运到牡丹江航校。

杨培光则在哈尔滨东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休息了一段时间，同年 12 月被任命为东北老航校飞行教员。

飞机翻修与断然试飞

1948 年冬天，沈阳解放后，以东北我军第一所航校的地勤干部为主，组建了沈阳飞机翻修厂 (即 112 厂的前身)，专门翻修各地缴获的国民党空军 P–51 “野马”式战斗机。为了尽快组建一个防空飞行队，中央军委航空局向沈阳飞机翻修厂下达了加快翻修 P–51 的任务。因此，杨培光到达牡丹江航校没有过夜，就随东北老航校副校长刘善本赶到了沈阳，只见北陵机场南停机坪上整齐地摆放着 3 架刚刚修复好的 P–51 战斗机。地勤人员已经提前两个小时把飞机所需要的油、气、电全准备好了，经过地面试机，一切都处于良好状态，万事俱备只等试飞。

杨培光目睹了地勤人员试车的全过程，他请地勤人员把飞机发动机试车的各种数据，如转速、压力、温度等向他作介绍。地勤人员一字不漏地一一作了回答。杨培光从心里感到: 这样的地勤人员维修的飞机信得过。他觉得自己好久没有飞行了，很想飞，当即主动要求承担试飞任务。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满意地点头同意，并特意举行了隆重的首次试飞典礼。

机场上参加试飞典礼的首长和数百名飞机翻修厂的职工，都睁大眼

睛看着 P–51 战斗机的一切动态。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空军开天辟地的首次战斗机试飞，杨培光应该是人民空军的第一个战斗机试飞员。只见杨培光熟练地把飞机滑进跑道南头，又从南头滑到跑道北端，先进行地面滑跑试验。机场塔台无线电里传来他的声音：飞机、发动机工作良好，请求起飞！”“可以起飞！”经指挥员同意，在一阵雷鸣般的吼声之后，杨培光驾驶飞机冲到 4000 米高空，连续做完了几套特技飞行动作。每做完一套特技都报告：“工作良好。”约 40 分钟后，飞机平稳着陆。很多人围着飞机问杨培光在空中的情况，他只是说：“还可以，还可以！”接着，杨培光又试飞了第 2 架、第 3 架，其评语都是“还可以”。大概这三个字就是杨培光最满意的形容词了，这三个字也让在场的人喜出望外。因为一些国民党空军遗弃在各机场的破烂，正是经过沈阳飞机翻修厂七拼八凑，一批批地翻修，一批批地试飞，一架架地从沈阳飞往北平南苑机场，成为人民空军最初的“家底”，仅 P–51“野马”式飞机最多时达到 19 架。

终身憾事与欣然受阅

1949 年 8 月的一天，东北老航校领导通知杨培光乘运输机赴北平南苑机场，到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报到。杨培光想到自己从那里驾机起义到东北解放区还不到一年，现在又要重返北平了，心情无比激动。一下飞机，杨培光看到机场的营房、设施虽然没有多大的改变，但这里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机场的天更蓝，树更绿，阳光更明媚。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队长徐兆文、政委王平阳待人特别亲切，大家关系很融洽。8 月 1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成立，杨培光被任命为飞行中队第 2 战斗机分队分队长。同年 10 月 1 日，杨培光驾驶自己试飞出来的飞机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时，为空中第 2 战斗机梯队分队长。

说到杨培光参加受阅飞行还有一段插曲，令他终生难忘。1949 年 6 月 29 日，东北老航校 1 大队 2 中队在东北公主岭机场改装飞行 P–51 飞机，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方华在这架飞机前与教官杨培光交流操纵此种飞机的经验。当飞机从机场滑行道滑回机库前，方华披着大衣离开飞机，沿滑

行道北侧向南横行通过。由于是改装学习，方华特别用心，他一边走路一边阅读 P–51 飞机操纵讲义。当他走到滑行道中央时，因机械主任田杰、教官杨培光均未注意飞机前面已拿去轮挡，飞机向前滑行 20 米左右。待方华发现飞机滑向自己已来不及躲避，当即被螺旋桨 (螺旋桨转速为 1 分钟 1500 次) 打中，伤处为右上胸至左肩全部、右腰至左腰两处，当场牺牲，造成一起极其严重的地面事故。

事故发生后，航校副政委薛少卿从长春赶到公主岭，着手处理善后工作，并调查事情的真实情况。

鉴于当时双方身份的特殊性，又是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前，此事曾一度引起轩然大波。杨培光是一个驾机起义还不到一年的飞行员，而方华 13 岁就参加革命，14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七团政委，是个身经百战的长征老干部。1938 年受党派遣赴新疆学习飞行，成为一名飞行事业心很强的领导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方华担任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为了创建人民空军，方华向军委代总长、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写报告，请求批准参加驾驶 P–51 飞行训练，得到聂司令员的同意。

当时，有人上纲上线，说这是阶级报复。但当时的东北老航校以及军委航空局领导通过亲自调查研究，作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处理结论：考虑到 P–51 战斗机起落架是后三点式，即前面两个大轮胎后面一个小轮胎，在地面滑行时抬着头，不便观察，以致地面试车时要专门发“离开螺旋桨”的口令，才准予启动；加之空军处于建设初期，一些规章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航校党委在听取群众意见后认为，这次事件不是政治性的，是飞行组织不严，飞行员马虎大意观察不周造成的，属于偶然误伤致死，把事故定性为行政责任事故。据此，给杨培光行政撤职处分，同时保留其飞行资格，鼓励他继续做好工作。

杨培光一生有很多值得引以为豪的事情。比如他驾机起义，不仅自己选择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也为黄色炸药事件承担了责任，使当年不少在国民党空军工作的同伴得到解脱，为此 20 世纪末常有台湾老兵来看望他；他首次参加试飞翻修 P–51 战斗机，并且驾驶自己试飞出来的飞机参加了

开国大典上，从天安门广场上空飞过的中国空军编队示意图

开国大典；他曾经带教过的飞行员林虎、孟力、阮济舟等走上了人民空军的领导岗位等。然而，也始终有个阴影伴随着他，成为“终身的一大憾事”，就是他驾驶的飞机螺旋桨打死了方华同志。

后来，杨培光在自传中再一次谈到自己的认识：“无论如何，我不是有意要打死方处长，旁人不相信，可是我自己是肯定的。我认为最后找到的根源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工作中不在乎，粗枝大叶。没有理由疑惑自己是有意危害方华同志的，但这毕竟是我终身的一件憾事。”杨培光列举了方处长的革命经历后说：“这样一个同志牺牲在自己工作错误当中，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这种损失是无法估量，无法弥补的。”

此次事故后，不足 3 个月就面临着开国大典，对杨培光能否参加受阅飞行的问题，军委航空局还专门给中央军委写了请示报告，经周恩来副主席批准，还是大胆地让杨培光参加，而且让其担任受阅飞行分队长机。

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是飞行队执行的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参加受阅的飞机共有 17 架，是由沈阳、北平、上海等地的飞机翻修厂修复的。9 架 P–51 编成 3 个 3 机“品”字队形纵队跟进。第 4 队以两架“蚊式”轰炸机编成“一”字横队。第 5 分队以三架 C–46 运输机编成“品”字队形。第 6 分队以 1 架 L–5 通讯联络机为长机，2 架 PT–19 初教机作左右僚机，也编成“品”字队形。这样，17 架飞机形成一个纵队跟进队形通过天安门上空。

空中总领队原定由飞行队长许文兆担任，因他在 8 月下旬一次飞行训练时，发动机发生故障，被迫跳伞，靴子被甩掉，脚被高粱茬戳伤，临时调换邢海帆代理队长，并由邢担任空中领队，邢的左右僚机是东北老航校第一期毕业的飞行员孟进、林虎。第 2 分队长机是杨培光，左右僚机是阎磊 (带弹飞行)、王延洲。第 3 分队长机是赵大海，左右僚机是谭汉洲、毛履武。第 4 分队长机是邓仲卿，僚机是王玉珂。第 5 分队长机是刘善本 (副驾驶杨庆宝)，左右僚机是徐骏英 (副驾驶姚峻)、谢派芬 (副驾驶王洪智)。第 6 分队长机是方槐 (副驾驶杜道时)，左右僚机是安志敏、任永荣。五种型号的飞机参加受阅，速度相差甚大。P–51 和“蚊式”时速 600 公里，C–46 运输机时速 300 公里，PT–19 和 L–5 时速不足 200 公里。速度相差如此悬殊，但通过天安门时，要求队形严整，天衣无缝，不差分秒。经过计算，起飞的顺序按先小后大。阅兵航线进入点选了三个；P–51、“蚊式”大速度飞机从通县进入；C–46 中等速度飞机从建国门东侧进入。这个编队合成的难度是很大的，但经过多次合练取得了圆满成功。

10 月 1 日下午 3 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4 时举行阅兵。天空碧蓝，只有几块淡积云点缀在天边。金水桥前步兵方队威武雄壮，坦克、骑兵、炮兵部队，铁流滚滚，浩荡向前。南苑机场上的 17 架飞机马达轰鸣，按小、中、大速度的顺序先后起飞，按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待命。4 时 35 分，空中分列式开始，在空中总领队的统一号令下，各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差、速度和时间间隔，分别在 900 米、600 米、450 米的高度，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

迎着初升的五星红旗，机群准确严整地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金光闪闪的天安门城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频频向机群招手致意。那潮水般的红旗海洋里万头攒动、雀跃欢呼的场面，一齐扑入飞行员的眼帘。当 9 架 P–51 飞机刚刚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耳机中接到受阅总指挥油江处长的命令 : 按拟定计划，P–51 机群再通过天安门一次。机群在复兴门上空作右后 180 度方向大转变，沿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再转向建国门，当到达东单上空时，正好与第六分队相衔接。所以，在地面观看的群众以为受阅的飞机是 26

架。

开国大典空中受阅飞行任务胜利地完成了。17 架飞机参加国庆大典，也象征着一个新军种的诞生。

1950 年 7 月 26 日，南苑飞行中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独立第 1 驱逐大队，下辖 2 个飞行中队 1 个机械中队，杨培光任副大队长 (大队长空缺)。1951 年 1 月，杨培光任空军某航校飞行技术检查员，3 月任空军军训部飞行技术检查员，以后还去空军河北省沧州空军某航校任过职。1959 年 6 月任空军某航校三团副参谋长。1962 年 7 月停飞。1977 年 12 月任某航校副参谋长。1982 年 12 月按师职干部待遇离休。曾任河北省政协委员。

2001 年 4 月 17 日，杨培光在北京病故，享年 82 岁。

丁凡璋[①]

关心犹在　期待永存

——罗清泉对江陵的桑梓之情

中共湖北省委原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罗清泉同志，于2021年4月2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76岁。生前，罗清泉对家乡江陵非常关心，江陵人民永远怀念他。

鼓励干部群众士气

1994年原荆州地区、沙市市合并时，江陵县城搬离市区。江陵县变成了地方不大、人口不多的县，县域经济在全省摆尾。全县上下不免有些焦虑，甚至有部分干部群众悲观泄气。而罗书记总是鼓励江陵干部群众要看到积极有利因素，奋力拼搏，建设发展好江陵。

2007年，罗书记到江陵调研。中巴车上，县委书记汇报时，流露出江陵基础太差、难以赶上别的县市的焦躁情绪，罗书记安抚地拍了拍县委书记的手："不要太悲观，我前两三年到许多县市调研时，大部分就是江陵现在的样子，你们也只差两三年。"罗书记当时的鼓励，不仅增添了地方领导干部的信心和干劲，至今也温暖着江陵人民的心。

再到江陵调研，是2008年9月。罗书记一边看申达电气深灰色钢板建造的厂房、刷满车间的绿色油漆一尘不染，一边听介绍说是从浙江引进的变压器生产企业，罗书记高兴地说："不错，欧洲的工厂也不过如此。"

① 作者系湖北省水利厅副厅长。

在新建的商业步行街，看到铺面整齐美观、商品琳琅满目、人潮川流不息，罗书记边走边听步行街的规划、建设、运行情况，一直走完了整条街道。

上车前，罗书记又回头看着步行街说："这像一个县城的样子了。"

罗书记的肯定，给了江陵干部群众极大鼓舞。当时的江陵，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县城建立在乡镇的基础上，"有县无城"一直是江陵人民心中的痛。建设县城作为江陵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受到省委书记的肯定，陪同的干部非常高兴。而如今，县城越来越繁华，书记的鼓励一直回响在江陵人民的耳边。

当天在锦天大酒店参观点，罗书记问："这个点看什么？"县委书记汇报说，过去江陵没有好酒店，客人来了招待不周，影响了招商引资。听说您当省长的时候，还是带队在县政府机关食堂大厅里用的餐。现在有了好酒店，请您看看指导一下。

罗书记没有下车，他说："我们在食堂大厅吃饭不要紧，招商很重要，能把客商接待好就好。"

点点滴滴，言犹在耳。江陵的每一点进步和发展，罗书记都看在眼里，并用如此和蔼的态度鼓舞士气，让地方干部心里非常熨帖。

助推重大项目建设进入快车道

罗书记十分关心江陵重大项目建设。一个 2 台 66 万千瓦超临界燃煤华电江陵电厂项目，策划了很多年，推动了很多年，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每当关键时刻，罗书记都亲自过问，帮助项目的推进。

2007 年省九次党代会期间，还在省政府工作的罗清泉同志，专门抽出时间在办公室听取了江陵县委书记、县长的汇报，对江陵经济、社会发展作了一系列指示，特别对华电江陵电厂项目给予了关注。

临分别时，他握着县委书记的手说："你们要快点搞，别人在后面搞的电厂都跑到你们前面去了，要加油。"

这番话很有点儿恨铁不成钢，让书记、县长备感压力，但同时也倍增了力量。罗书记在这个项目的后续推进过程中倾注了很多心血，给予

了江陵县非常大的支持。

2008 年 9 月，罗书记在荆州专门会见了从北京专程赶来的华电集团副总经理程念高一行。在晶崴大酒店会见时，罗书记深情地说，江陵是个新县，请华电集团多多支持。

这次会见让华电集团看到了湖北省委、省政府对华电江陵电厂的重视，促成了华电集团把江陵电厂项目往前排。

会见的第二天，罗书记亲临华电江陵电厂选址调研。那天天气很好，秋高气爽、蓝天白云、微风徐徐。

在荆江大堤上，俯视电厂选址一览无余。罗书记仔细看着华电江陵电厂选址图，认真听着汇报，时不时询问一些问题。他特别强调，一定要把选址保护好，不乱建设、不增加房子、不增加人员。

当天随行的有省发改委、财政、国土、环保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在罗书记及相关领导关心下，华电江陵电厂的建设进入快车道。

现在，华电江陵电厂已建成投产，年发电量达 61 亿千瓦时。高耸的烟囱和庞大的冷却塔，都在向人们诉说着罗书记对江陵的关心。

关心民生事项

罗书记在家乡求学时，遇到过交通不便等许多困难。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书记，他对江陵的民生事项十分关心。

有一年，罗书记在江陵邻县监利调研。江陵县委书记、县长晚上赶到监利，罗书记正在房间里看材料。

他放下手中的工作，听取汇报。县委书记汇报说，三峡搬一个县城，国家给一二十亿元，江陵是新建县城，很多单位办公楼都是负债修的，可不可以给点钱建县城？罗书记当即明确表态：不行。他说，三峡是国家重点工程，你们不要攀比，全省还有孝昌、团风是类似情况，不能单独为江陵开口子。书记、县长虽然有些失望，但也为罗书记的大局观和党性原则所深深折服。

之后，县委书记又汇报说，县殡仪馆起初为乡镇时的殡仪馆，当时地处偏远，现在成为县城中心，对群众正常生活造成了影响。群众意见强烈，

要求搬迁，而县里财政很困难。罗书记当即表示：这件事可以支持。

在罗书记亲自关心下，江陵殡仪馆得以搬出县城中心，一座占地数十亩的现代化殡仪馆投入使用，原殡仪馆扰民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罗书记对江陵人民就业问题也十分关注。在调研龙翔公司时，总经理陈四海向罗书记汇报：公司产品有市场、订单多，准备新上设备、新招工人。罗书记听了，当场对随行的省经信委领导说："这样企业能解决群众就业增收问题，你们要支持。"

而今，龙翔公司的发展，没有辜负罗书记当年的期望。2021 年，公司销售收入过亿元。

敬爱的罗书记虽然离开我们已有一年多了，家乡人民仿佛仍然感受到您关注的目光。此时，我可以欣慰地向您报告：江陵正以超常力度追赶传统老县。到实现那一天，一定再向您报告，您在天堂也一定会为家乡高兴！

李寿和[①]（口述）　张艾梅[②]（整理）

三访荆江分洪总指挥——开国中将唐天际

编者按　荆江分洪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入选“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在2022年荆江分洪工程建成70周年之际，公安县政协组织荆江分洪工程70周年纪念专辑撰稿。荆江分洪总指挥、开国中将唐天际是荆江分洪工程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为做好这篇文章，笔者隔空采访了旅居深圳的公安籍国家一级作家李寿和先生。本文详细叙述了李寿和先生三次采访唐将军的过程，以及在唐将军的支持与期待下，完成《荆江分洪大特写》这部著作的佳话。

大约是1977年，我应约为湖北人民出版社采写一篇有关治水的报告文学，有幸接触到荆江分洪工程史料。在新中国成立之初，30万劳动大军、75天时间，一举建成万里长江上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举国举世为之惊叹！而这个伟大工程的总指挥——开国中将唐天际将军，及一大批英雄模范，更令人肃然起敬。于是我萌发了反映荆江分洪工程的创作冲动，形成一部长篇小说《荆江潮》的构想。

缘起长篇小说《荆江潮》

《荆江潮》命名是受鲁迅先生时代一个《浙江潮》刊物名的启发，构

① 作者系国家一级作家。

② 作者系公安县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

思为：一对双胞胎姐妹在解放前的荆江大水中失散，十多年后姐妹俩分别从湖南湖北两地奔赴荆江分洪建设工地，几经周折竟在滚滚人潮中相逢相认。最终姐妹俩双双作为荆江分洪劳模国庆观礼团团员，进京见到了毛主席，并在怀仁堂国宴上代表荆江分洪工程建设者向毛主席敬酒。姐妹俩原型是秭归县的工人劳模谭文翠和松滋县的农民劳模辛志英。在 1977 年的湖北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上，《荆江潮》被列入全省重点创作和出版规划。省委宣传部向全省发了文件，我的创作采访活动得到了相关地市县的积极支持，所到之处，畅行无阻。

当时的湖北省革委会出版局编辑部对《荆江潮》非常感兴趣，编辑部文艺组还专门就创作提纲与我进行了几次座谈。我还几次入住出版局招待室，在编辑部资料室阅读了大量荆江分洪出版物，对荆江分洪有了全面的了解，为进一步实地考察和人物采访做好了准备。

因此前我写过一篇反映公安县治水工程《五湖十八站》的文章，得到了既重视水利又重视文化的县委第一书记张明春同志的好评。一些曾经带队参加过荆江分洪的领导干部，更是对我的《荆江潮》给予了热情支持，并指示财政部门拨付了一笔外出采访经费。于是我得以追随当年建设者们的足迹，展开了一系列考察和采访活动。其中使我最难忘的，是三次进京采访原荆江分洪总指挥、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唐天际将军。

第一次进京采访

1977 年 7 月，我怀揣着公安县委办公室主任万作权同志以县委名义写给唐天际将军的问候信，及省革委会出版局编辑部写给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介绍信，与一位戏剧作者同行，开始了对唐老的第一次进京采访。

这时唐老已离休，居住在京郊西山总后干休所。我们先去总后联系，当知道是唐部长的客人，他们热情接待了我们。而当我们到达西山后，干休所更是不让我们去外面住旅馆，而是临时腾出一间房子作为招待室，并安排了一位孙干事全程陪同。

7 月的西山景色迷人，树木葱茏、流水潺潺。特别是漫山遍野的红枫林，已开始显露出淡淡的红晕。而青松翠柏之中，有一幢古朴典雅的二

层小楼，孙干事告诉我们这就是唐老的居所。

第一次孙干事陪同我们走进这栋小楼时，唐老和夫人早已迎候在客厅了。第一次见唐老，我难掩内心的激动。这位前荆江分洪总指挥，见到来自荆江分洪区的访问者，显得很兴奋。

老人已过古稀，白眉银发，精神矍铄。一进入荆江分洪这个主题，老人就话语滔滔，一口气谈了两个小时，仍然谈兴不减。

第一天老人谈的主题是：受命奔赴荆江的过程。

1952 年 3 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电召正在桂北剿匪前线的 21 兵团政委唐天际飞抵武汉，任命他为荆江分洪工程总指挥部总指挥，并当面传达毛主席的三条指示：一是荆江分洪要当作全国的事情来办，全国支援；二是荆江分洪关系到两湖人民的生命财产，两湖要全力以赴；三是要赶在汛期前完工，调一个兵团，用打仗的方法来完成任务。

唐老受命后立即回返桂林，召开了兵团团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会议宣布了进军荆江的命令，并要求在三日之内做好出发准备。三天后全兵团两个军、四个师，分别从桂林、柳州登上专列北上。战士们以为是要入朝作战，都兴奋不已。可是列车分别抵达岳阳、武昌站后，又连夜登上长江边的登陆艇，逆江北上。结果船队一路开到了荆江南岸的太平口，这就是荆江分洪进洪闸（北闸）工地。一路开到藕池口，然后登岸行军 40 里到达黄山头，这就是荆江分洪节制闸（南闸）工地。部队按师团为单位就地在旷野上召开誓师大会，战士们这才知道到了一个不用拿枪的战场。

在 21 兵团大部队专列抵达岳阳、武昌前，唐老亲率兵团部专列先期抵达长沙。他命令兵团家属暂留长沙，司令部、政治部跟进，自己则带着一部电台和几名参谋又星夜先行了。在长沙登上一只小火轮，横穿洞庭湖。在津市又换乘一只帆船，进入虎渡河。当第二天凌晨抵达虎渡河边的黄山头时，他立即用电台与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及已兼任荆江分洪总政委的湖北省主席李先念联系，报告他已按时到达荆江分洪前线。

唐老思维清晰，记忆翔实，谈吐优雅，回忆 25 年前的事如谈昨天的事。而从他眉宇间又依稀可见当年挥师 10 万官兵，统帅 30 万劳动大军的气魄和风采。而在两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唐老始终保持着一个姿势：

双腿并拢、两手搭在双膝上。除了讲到兴奋处，才偶尔抬一下手，或点一下头，一派儒将的风纪和风范。

唐老的讲述使我听得入迷，可是又怕老人讲得太累，只得打断了他的话头，约好明天再谈。

这次进京采访一共正式听唐老谈了三个上午和一个下午。采访即将结束的 7 月 14 日下午，唐老通知要见我们，这是最后一次走进唐老的客厅。这天老人显得格外轻松愉快，在客厅摆上了文房四宝，原来是要送我们墨宝呀！这天唐老手书的是毛主席诗词《重上井冈山》，书体书风也很像毛体。老人精神抖擞，一气呵成连写了两幅。稍事休息后问了我们县委书记的名字，又一气呵成书写了第三幅。多年后我才知道：唐老不仅是有名的儒将，还是一位有名的将军书法家。我保存至今的这幅《重上井冈山》，已是价值连城的真迹了。

这天唐老还拿出一个珍贵的相片纪念盒，里面是当年纪念荆江分洪建设全过程的照片，有好几十张。他说，这本相册应该对我创作《荆江潮》有用处，先拿回去用，完了再还回来。

唐天际将军（右四）与李寿和先生（右一）游西山合影

7 月 15 日上午，唐老还特意带上三个孙辈、保姆、孙干事，用他的吉普车带着我们去游览了西山卧佛寺。只因在采访中我流露过希望能与他合几张影，带回去展示给公安县的干部群众。唐老心细，一直记着这件事，安排了离别前的这次游览。在卧佛寺的苍松翠柏间，我们终于如愿留下了好几张与这位名将的珍贵合影。

第一次进京采访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额外收获——请唐老讲述了他丰富又传奇的革命生涯，如同上了一堂活生生的党史课。他历经黄埔军校、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井冈山

斗争、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湖南和平解放、桂北剿匪，直至荆江分洪……几乎走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本身就是一部活党史。不过这里不能展开介绍唐老的革命生涯，只介绍一首至今还在唐老家乡安仁县流传着的革命歌谣《十字歌》:“十字连起笔连笔，湖南出了个唐天际，发动农民打土豪，跟着朱德上江西。”

这堂活生生的党史课使我受益匪浅。后来我被抽调党史办执笔撰写《公安县革命简史》时，就有全局在胸，得心应手之感。进而还参加了湖北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发表过记叙公安县早期县委书记的《戴补天传》。更重要的是唐老的党史课，加深了我这位后来人对党和新中国的信念。

第二次进京采访

时隔一年半后的 1978 年 12 月，我第二次进京在西山采访了唐天际将军。一则为了那一盒珍贵照片完璧归赵，二则对唐老进行补充采访，同时开始采访荆江分洪的首倡者和副总指挥、被毛主席称为“长江王”的林一山同志。第一次采访唐老时我就汇报过下次准备采访林老，唐老高兴地告诉我他们都是全国人大常委，常常见面的，他负责给林老说说。

因为这次要在市区采访林老，还要采访也在市区的原荆江分洪总指挥部参谋长蓝乔将军，我只好在市区下榻，去采访唐老时就得往返于市区与西山之间。北京隆冬的严寒，对于我这个怕冷的江南人来说是一种考验。那时的北京公交车没有暖气，坐一趟市区至西山的长途公交要两个小时，往往冻得浑身哆嗦不止，腿脚麻木冰凉。但一踏进唐老那栋小楼，身心马上就热乎乎的了。

因为熟悉了，这次采访唐老就在他的书房进行。他十分惦记荆江分洪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关心荆江分洪后续工程建设。当我们谈到 1954 年荆江开闸分洪时，唐老告诉我：他当时是中央军委防空部队政委，曾在分洪区被洪流灌满后的一天下午，乘坐专机考察了洪波中的分洪区。他的专机在北闸上空盘旋了几圈，然后沿荆江飞到南闸上空盘旋，又沿虎渡河飞回北闸。就这样反复绕分洪区做低空飞行，久久不愿返航。舷窗边的唐老此时此刻心潮澎湃、喜忧参半。喜的是，他指挥建成的荆江分

洪工程首次运用即告成功！荆江大堤、北闸、南闸安然无恙！江汉平原、大武汉安然无恙！忧的是，分洪区一片黄汤，一个个安全区就像漂浮在黄汤中的救生圈。分洪区人民做出的牺牲，实在是太大了、太大了！

唐老也十分关心我的《荆江潮》进展，希望能早日见到小说成书。他告诉我，前不久日本来了一个中日文化交流代表团，带来一本折叠式日本出版的荆江分洪画册，并拜访了他。唐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国外尚且还在出版荆江分洪的书，我们更应该写。当我提出要看看这本日本画册时，唐老说他已上交给了全国人大廖承志副委员长了。

从第一次进京采访唐老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我又马不停蹄地奔波在两湖之间，先后采访了松滋民工辛志英、松滋县长饶民太、秭归工人谭文翠、长江委工程师王咸成、李怡生，还有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葛振林等当年荆江分洪风云人物。我汇报给唐老时，唐老听得饶有兴趣，欣喜异常，并一个一个详细地打听起这些人物的近况来。我跟老人开玩笑说，我是来采访总指挥长的，现在变成了总指挥长采访我了。唐老哈哈大笑地说，如果我们这些人能在有生之年再相聚一次，那就好了。几年后，当我再次采访辛志英时，她告诉我，在全国两会期间，唐老专门邀请她去西山见了面，还请她吃了饭。

第三次重上西山

正值《荆江潮》大量的采访活动基本结束，即将进入写作阶段时，因受公安县一场政界风波的影响而中断了，我由此一度转入三袁研究和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但荆江分洪从此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以后我担任公安县文化局副局长时，提议设立了县博物馆，进而提出以建荆江分洪纪念馆、三袁纪念馆而解决博物馆馆址，并设想了一个“三馆合一”的方案。荆州地区文化局副局长谢声华同志对这个设想非常感兴趣，一心想促成此事。他主动告诉我一个重要信息：国家文物局有一位领导在荆州任过职，这位领导恰好有位下属调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同志秘书。这个信息真是太好了！这正好可请李先念同志题写“荆江分洪工程纪念馆”馆名。

于是1990年8月，我带上县博物馆黄馆长，还有县党史办高主任，一行三人专程上了趟北京。因为有了谢局长的引荐，我们顺利见到了李先念同志的秘书，向他汇报了荆江分洪纪念馆的设想，表达了请李先念同志题写馆名的心愿。隔天秘书同志就返回了佳音：当年的荆江分洪总政委一听说是为荆江分洪题字，欣然应允。我们回公安不久，果然很快便收到了李先念同志“荆江分洪工程纪念馆李先念”的亲笔题字。

这次在京因为顺利，我高兴地带两位同行者一起去看望了林一山同志，并向林老汇报了荆江分洪纪念馆的设想和李先念同志已答应题写馆名的消息。可惜这时唐老已不在了，但我决定还是要再上一趟西山，去看一看唐老的旧居。两位同行者当然又欣然随我同往。

这是第三次上西山，唐老那栋二层小楼还在，但院门却是半掩半开着，院门内外初秋的落叶铺了一地，小楼四周也是杂草丛生，显然这里已长久没住人了。走进小楼，也没见一个人影，真是人去楼空！我突然悲从心来，心里大喊起来：唐老，您在哪里？您在哪里啊？要不是有两位同伴在身边，这天我说不定会在西山大哭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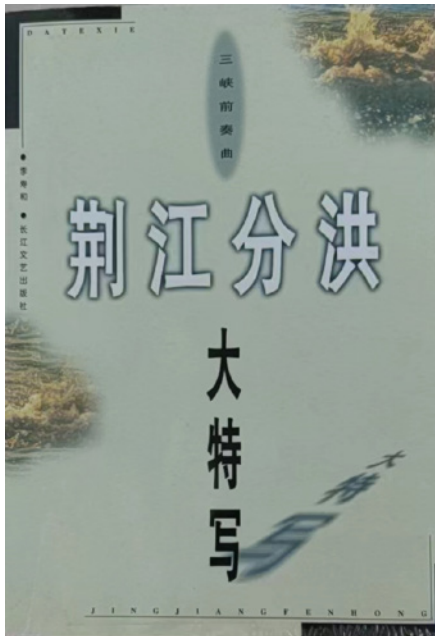
这天我曾默立在唐老的小楼前，想起了他手书给我的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想起了那“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那“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催人奋发的名句，心里说：我向西山起誓，向苍天起誓，向唐老的在天之灵起誓，我要发扬“重上井冈山”精神，重启长篇小说《荆江潮》的创作。荆江分洪纪念馆落成之日，也就是《荆江潮》面世之时！

从《荆江潮》到《荆江分洪大特写》

重上西山归来后我终于正式开始了《荆江潮》写作。正好这时我第一部研究三袁的著作《三袁传》已在北京出版，可以暂停一段三袁研究，集中精力转入荆江分洪创作。不过连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是，临到开笔之时我竟做出了一个重大改变——将小说体裁改为报告文学体裁，这就是《荆江分洪大特写》的由来。

这是因为我在梳理采访过的众多人物和事迹时，还没写出来自己就先被感动了，这正说明真实的生活往往比虚构的小说更精彩！又想起那

年因《荆江潮》小说选题参加省文艺创作座谈会时，在洪山礼堂聆听过报告文学大作家徐迟畅谈《哥德巴赫猜想》的创作过程，对报告文学的魅力和这位报告文学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现在改小说创作为报告文学创作，也就顺理成章了。巧的是正当《荆江分洪大特写》进行中的某日晚上，我与荆州地区各县市文联主席正要入席参加荆州龙舟文化节晚宴，地区文联副主席韩晏清同志跑来要我救个场——去嘉宾席陪徐迟和他的夫人，这次又给了我一个向徐迟当面汇报《荆江分洪大特写》的机会。



《荆江分洪大特写》图书封面

《荆江分洪大特写》比当初《荆江潮》，受到更大更广泛的支持。省委宣传部将其列入了全省的创作基金项目，长江文艺出版社再次列入重点选题，省新闻出版局邱久钦局长作了热情洋溢的批示，荆州地委还向长江文艺出版社写出了详细的审读回复，时任公安县委副书记王跃进同志热心地要去请省委领导作序。关于序，我先是请的徐迟老师，最后落实的是“长江王”林一山同志。

《荆江分洪大特写》在 1998 年的长江大洪水中面世，在全国第九届书市上受到关注。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展示区，一眼就看到了这本书并拿了起来。中国新文学学会、湖北省作家协会、长江文艺出版社等，联合在我母校华中师大科学会堂隆重召开了研讨会。会议由中国新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华中师大文学院张永健教授主持，王庆生校长亲自到场。我至今还记得一长串出席会议的名单：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李宏光，长江水利委员会宣传部长成绶台，省文联党组书记李传锋，女作家叶梅，省作协副主席刘富道，公安籍专业作家陈应松，长江文艺出版社总编周季胜，《当代作家》编辑部主任李正武、责任编辑阳继波，

武汉大学教授熊礼汇等。还有在武汉参加会议的山西报告文学作家赵瑜，还有我华中师大中文系 72 级的同学雷召海、杨建国等。

研讨会的成功召开，报刊电视的报道，以及专访、转载、连载一时连篇累牍，这里难以一一列举。不过《长江文艺》杂志刊发的华中师大文学院吴建波教授的一篇评论文章，我至今还记得标题:《人与自然的现代史诗——读李寿和的荆江分洪大特写》。按当时的评价和舆论阵势，加上版本装帧设计也很大气,《荆江分洪大特写》获个省奖是完全可能的。但结果没有，确切地说是没有报奖。这是因为要赶九届全国书市，不免校对出了问题，武大熊礼汇教授在研讨会上当场就指出了这个问题。不过以后的《共和国没有开闸》(《荆江分洪大特写》续篇）再度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时，校对、版式都做得不错，也就同时在广东湖北都获了奖。不过又因为一个缘故,《共和国没有开闸》也未能上报全国性奖项。本来奖不奖是无所谓的，只是《荆江分洪大特写》关注者太多了，有个交代当然更好。

说到这里倒是想起两件欣慰的事：2021 年的某天——算来《荆江分洪大特写》已出版二十多年了，手机突然收到广州小女婿嘉文的微信：爸，我们在番禺区图书馆看到您的书了。我问哪本书？又收到一张借阅单照片，正是《荆江分洪大特写》！恰好不久，我接受“广东省作家协会著名作家影像拍摄工作”摄制组采访，要求围绕代表作《荆江分洪大特写》《共和国没有开闸》《三袁传》展开，我毫不犹豫地第一本就拿起《荆江分洪大特写》，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荆江分洪总指挥唐天际，“长江王”林一山……使几位年轻的“广广”摄影摄像师，听得津津有味。

陪在身边的小女儿曦林说，每次在深圳广州这样的场合听老爸讲长江故事，都为老爸骄傲。

我说，应该是为老爸讲的故事骄傲，为荆江骄傲！为长江骄傲！

丁逸枫[①]

唐义精：华中地区第一所美校创办者

武汉市江夏金口老街上，有一家唐姓中医铺。夫妻俩用微薄的收入，养育了七个子女。长子唐义精，字粹盦，生于1892年。行五的儿子唐一禾（义和），出生于1905年。然后是两个女儿，大女儿唐义贞，生于1909年。这三兄妹，在各自的领域，写下了并不平凡的一笔。

良师益友是榜样

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后，兴办新学堂，使科技知识专业化。唐义精也上了新学堂。他就读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校文、理、医、工、艺术等专业齐备。艺术专业中美术、音乐及手工艺各科设置均衡。唐义精会画画，犹善中国画；会吹笛子、拉二胡；也会写文章。只是学业尚未完成，父亲就因病去世，他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的重担。

唐义精在省一师附属小学当美术教员，帮着寡母抚育弟弟妹妹们。长兄如父，他白天在学校教别人的子弟，晚上回家就当自己弟妹们的老师。

武汉不仅有四通八达、绾毂南北的便利交通，而且还是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的交汇之所。在武汉，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是恽代英。

1919年2月11日，寒假后刚开学，经朋友引荐，时任中华大学附中教务主任的恽代英，给教学经验丰富的唐义精下了聘书。彼时，恽代英决定组织一个美术会，研究各种美术制造。其中包括水彩画、图案画、炭画、制粉笔、油印墨，甚至还包括信封、信笺、靛水等。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

① 作者系湖北省作协会员、当代老年杂志社编辑。

道："以上各项目请吕海琴、邓鹏九、唐粹菴（盦）三先生为指导员，有课外讲演，实地指导及批评成绩之责。"

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武汉，有着开拓革新的光荣传统。

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武汉，恽代英书写《四年五月七日之事》《呜呼青岛》的爱国传单，被武汉的师生争相传诵，引起巨大反响。学生们在爱国热情的鼓舞下，不顾军阀的武力威胁、镇压，纷纷上街游行、集会，继而在武汉三镇掀起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浪潮。

而冒着生命危险刻印和散发传单的人群中，就有唐义精。

"夜与香浦等谋印（《四年五月七日之事》）传单，粹庵颇为尽力。"这是恽代英记在 1919 年 5 月 6 日的日记上的一句话。

5 月 19 日的日记中，恽代英记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呜呼青岛》传单来，同学分途散发者如下：胡业煊、胡家芬、卢斌——巡道岭，府街，草湖门，一码头。……张宜瑞、唐际盛、胡薰、唐粹庵、江禹功、秦毅生——后宰门，大东门，芝麻岭，督军府。"

大东门是武昌的交通要道，督军府，又是重兵把守的机关重地，唐义精等散发传单的地方，危机重重，随时都会面临牢狱之灾。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地在街头奔走。

五四运动后，各种新思潮蜂拥而至。武汉，成为继北京、上海后的第三个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大城市。

1920 年 2 月，恽代英和好友黄负生等创办利群书社。

经销各种新思潮书刊是书社的主要活动，《新青年》《湘江评论》《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等进步刊物，一到书店，就被售卖一空。书社每天吸引着许多追求进步的群众和青年，成为许多革命同志相互交流、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各种思潮交汇之下的武汉，正孕育着一股新生命的力量。

这种新力量中，就有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创办的私立武汉中学。

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的董必武返回武汉后，认为实行阶级革命，必先唤醒和组织群众。办学，是宣传新思想、提高民众阶级觉悟最便利的方法。

唐义精亲眼看见了董必武筹措办校的各种艰辛，只要一有空闲，他也帮着跑前忙后，不遗余力地尽己所能。1920 年 3 月，私立武汉中学正式招生。来报考的学生不仅有武汉本地人，连周边的黄冈、麻城、黄安（今红安）、沔阳（今仙桃）、荆门、咸宁，以及邻近武汉的河南新县、湖南平江、华容等地的进步青年都纷纷前来报名投考。

武汉中学，并非武汉的第一所私立学校。恽代英就读的中华大学，是湖北黄陂人陈时家族自己出钱、出力，独自创办的。

当然，武汉中学也不会是最后一所私立学校。

在和恽代英、董必武一起工作时，唐义精不仅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且也深受他们的影响，1920 年 4 月，他和几位同人正式创办了私立武昌美术学校。

毁家办学为理想

20 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形成与发展。从实业学堂的技能美术教育到师范学堂的师资美术教育，再到专门的美术学校的兴起，中国美术教育发生了质的变化。现代美术教育也在不断健全和完善，并进一步走向规范化。传统美术的“师徒相授”被西式“学堂”教育逐渐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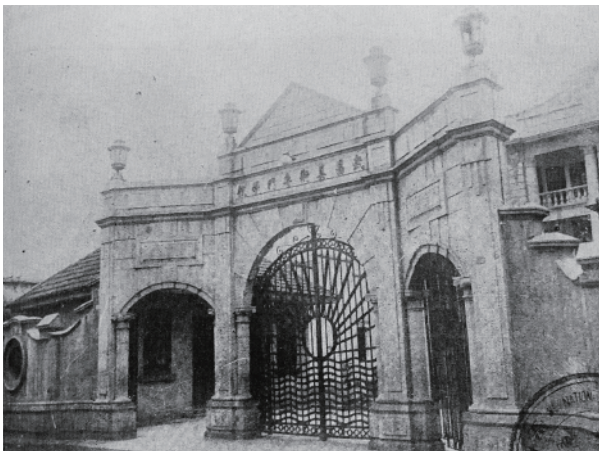
1912 年，刘海粟创办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18 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美术教育学府——国立北平美术专门学校成立。1920 年，蒋兰圃、唐义精和徐子珩等人创办的武昌美术学校，是全国第三所美术学校。

蒋兰圃是湖南人，善国画。他曾在陆军中任职，参加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后，军阀混战，蒋兰圃毅然脱离军旅，创办“兰圃画会”，开始致力于绘画事业的创作、研究与艺术教育事业。

相同的志趣，令他和唐义精、徐子珩一拍即合，决定一起办学，专门教授美术。

1920 年 4 月，武昌美术学校开始招生。这是华中地区的第一所专业美术教育学校，是民国艺术教育史上最早的四所艺术教育学校之一，也是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发源地之一。

学校创立之初，蒋兰圃为校长，唐义精为教务主任，徐子珩为总务主任，校址设在武昌芝麻岭（今解放路北段）。



1926 年武昌艺专新校舍在武昌水陆街建成，此为校门

刚刚创立的学校，小得可怜，教室、办公室、教职员宿舍，一共只有四间；学生八名，跟着唐义精学画的五弟唐一禾，是其中之一。

听说唐义精办了学校后，他在师范学校的同学好友前去探望他，看过简陋的学校后，同学好奇地问他："几时有办学校的想法的？从未听你说过。"

唐义精笑笑说："早在师校读书时就有这个志愿，不过我不愿把未做的事说在前面。"

"经费怎么办？"

"不管！我用毕生的时间去努力，补救这个缺陷。"唐义精严肃地说。

此后，唐义精用自己毕生的努力，来完成这承诺。

建校开始，经费捉襟见肘。唐义精学习董必武办校的经验，教职员工只拿低薪或不支薪，在工作中一人身兼数职，以尽可能地减少开支。

武昌美术学校开办之初，学校规模小，很是被人瞧不起。唐义精和蒋兰圃、徐子珩等人殚精竭虑，寝食难安。

1922 年 11 月，学校由湖北省教育厅转呈教育部批准立案。学校也举办学生绘画展览，扩大学校影响，得到地方人士的重视和帮助，学生越来越多。

1923 年 8 月，学校更名为武昌美术专门学校。开办专门部，设绘画、师范两科，将原有的函授与中等两部扩充为一部两院，校舍由芝麻岭一处

增加到蛇山下关岳庙等三处，并另租民房为学生宿舍。引进西方绘画原理，以此推动和发展湖北的美术事业。辟学校出品所（省立图书馆之一部）为第二院，关岳庙为第三院，并扩充学生宿舍。

武昌美术专门学校，成为全国最早的高等美术学校之一。

1924 年 4 月，学校组织学生外出写生，回来后，再次展览学生作品，使学校影响日益扩大，还在两年内募集资金 2 万余元。

经过 5 年时间的培育，这颗艺教的种子，开出了灿烂之花，学生人数增加到 10 个班 300 多人。

为了能拥有自己的校园，蒋兰圃、唐义精几人发动了一切能量。

清政府被推翻后，武昌水陆街的“提学使署”先是闲置，后来被若干单位占领。蒋兰圃运用自己在军界、政界的人脉关系周旋，唐义精则利用老武昌的本地关系，在民间活动。上下协力，齐心运作，终于获得了这块地皮的使用权。

为了筹措建设的经费，唐义精卖掉了金口镇的老宅，又争取到中华教育基金会的一笔经费。七拼八凑，总共筹到了三万多元大洋，1925 年 8 月，武昌美术专门学校改建工程动工。

1926 年 2 月，学校在水陆街建成包括一座三门石牌坊、两大栋楼房及大片平房在内的新校舍，其建筑规模在当时的全国艺术院校中首屈一指。4 月，学校迁入水陆街新校舍。

建校 6 年，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校园，唐义精和师生们一样兴高采烈，新校舍犹如一座艺术的宫殿。

远远看上去，一座“南洋风格”的仿石大门，呈八字形，巍然耸立，门楣上刻着的“武昌美术专门学校”，引人注目。大门有三个罗马式拱形的门洞，两旁装饰了希腊圆柱，黑色的花式铸铁镂空门，正中的门头上是三角形山花，配上四个欧式玻璃路灯，可谓“高大上”。

今天，坐落于武汉市江夏区汤逊湖边的湖北美术学院里，就有仿制这座“武昌美术专门学校”大门的牌坊，它静静地伫立在校园里，似乎是无言地诉说着百年前的那一段艰辛建校的历史，又似乎是在含笑看着莘莘学子在艺术的海洋里探索，无比欣慰。

鞠躬尽瘁为学生

1928 年，学校增设音乐科，奉教育部令，正式更名为“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时人称为“武昌艺专”。学生从湖南、四川、江西、河南等省，蜂拥而来，从 10 个班加编至 24 个班，分艺术、教育和绘画三组，附设高中和初中二部，发展势头喜人。

不久，蒋兰圃先生让贤，卸却己任，将校长重任交付予唐义精。

湖北地方志有这样的记载：1929 年秋，武昌美术专门学校重订校董会简章，改委员制为校长制。所聘校董有闻一多、卢广镕、王介庵、冯力生、蒋兰圃、唐义精、张肇铭（校董名单上为张大琪）、许敦谷（许太谷）、严跋苹、郑云庵、王霞宙、徐子珩等文化人士，此外还有南昌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贺国光，汉口广东银行副经理陈仲壁，汉口聚兴诚银行经理杨粲三，湖北省党部委员艾毓英、杨锦昱、童宾秋等军政界和经济界人士。校董会推选唐义精为校长，蒋兰圃为主席校董，陈仲壁为副主席校董。

在唐义精的主持下，学校很快走向正轨，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

1930 年，校名改为私立武昌艺术专科学校，设有艺术教育系本科、预科，绘画系本科，西洋画系本科；附属中学有高中艺术师范科、高中普通科及初中部，盛极一时，成为一所在全国极有影响的艺术学校。

唐义精办学的宗旨是培养学生一专多能，既能从事艺术教育，担当起中小学美术、音乐课教师，也能根据自己的爱好，向美术、音乐专业作高深的探索。学校设置的课程和延聘教师，几乎都是从这个宗旨出发，广收并蓄，不标榜门户，能者为师，不拘一格。学校聘请教西画的老师，有留日的许敦谷、关良，也有留英、法的曾一橹、庄子曼。国画有专画花鸟的王霞宙、张肇铭，画山水的欧志先、喻岱宗，还有专画梅花的侯宗谷，也在学校兼课。音乐方面，教声乐的，有教英文唱歌的贾孟敏，有一般唱法的陈啸空，欧洲歌剧唱法的李自新。乐理老师前后有贺绿汀、缪天瑞、陈天鹤。器乐方面，教钢琴、小提琴的，还是请的外籍教师。在文科教国文、英文的有李实、柳野青、郭安仁（丽尼）等。并重金从上海聘请中国首任模特张月英，后来又请来体型较为标准的裘小青，协助毕业班

的人体课。在这众多的学科中，学生可以各取所需，自成一格。

除了固定的老师，唐义精还特意聘请了一些专门老师业余指导，科目有诗词、国乐、昆曲、京剧，让学生们自由选修。

从武昌艺专的第一班毕业班起，就陆续向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各中小学输送了第一批艺术专业人才。从此，各中小学才有了正规的、第一代的艺术专业教师。而想学习艺术的、招聘艺术教员的，都不约而同地到武昌艺专来。

担任校长后，唐义精以校为家，日夜守在学校，上至领导学校事务，下到学校的卫生与伙食，查学生宿舍，他都一丝不苟，事必躬亲。

私立学校，既无固定可靠的政府拨款，也无社会上有力的财政支援，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靠学生有限的学费收入。而武昌艺专的专科班分10个班，每班只几个人到十几个。有人向唐义精建议，应该合班，让每个班的人数多而班次少，可以压缩老师上课费用，以此减少学校的支出。唐义精不赞成，他觉得办学不是做生意，靠学生赚钱，从来都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尽管学校靠学费维持正常运转，但是对于贫困学生，唐义精却是敞开大门。

1935年暑假，18岁的学生黄钢（曾任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中工学院新闻系教授）恋恋不舍地行走在武昌艺专的校园里，他留恋地看着钢琴练习室外挂满藤萝的院墙，贪婪地嗅着路边长春花和绣球花散发出的阵阵芳香……终于，前面就是校长室，他停住脚步，硬着头皮敲响了校长的门。

黄钢在武昌艺专已经学习了两年。他的父亲黄负生，是恽代英的好友，曾是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宣传委员。父亲病逝时，黄钢年仅5岁。他16岁考上武昌艺专，母亲掏空了家底，也仅够他缴纳第一学期的学杂费用。其后的三个学期，他始终欠着学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了读书，又不愿让母亲承担更多的生计压力，黄钢报考了在南京刚刚成立的戏剧学校，因为那所学校不收学费。

听到黄钢来辞行的原因，唐义精瞬时泪流满面，他一边取下眼镜，

用手帕擦着泪水，一边说："哎呀！你真傻！你学习美术的成绩这样好，我们是舍不得你走的……至于学费没交，我们都知道，也没有催你嘛！下学期，我已经想好了，想让你在低年级、初中部代一点课，这样，你就可以半工半读了……"

1984 年，在唐义精、唐一禾罹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谈起唐校长对自己的关爱，黄钢深情地说："……他对我流露出慈父般的关怀与深切的爱护时，我才理解到他的深情厚谊……"

对于贫苦学生，只要自己愿意学，学校一向是关怀照顾，想方设法不让学生继续失学。

1936 年武昌艺专师生作品在南京展出。前排左一唐义精校长、右四唐一禾先生、右五蒋兰圃先生、左三张肇铭先生

1923 年春考进武昌艺专第一届师范系的插班生裴介一，进校后，和唐一禾同班，艺师毕业后，他又继续升入专科学习，直到 1928 年从专科西画班毕业。几年的学习生活，他就有两次因无力缴纳学费、伙食费，主动向学校要求退学，但每次，唐义精都给予他热情帮助，设法为他解决困难，得以继续学业。毕业后，又照顾他留校办函授，任助教。他在唐义精、唐一禾罹难 40 周年时的校友会上发言说："据我所知，学校对其他无力缴费的学生，只要认为他是真心向学的，也都给予减免费优待。这在旧中国的私立学校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这些优良校风的开创，都与两位唐先生优良的品德和助人为乐的领导作风分不开。"

唐义精把金钱看得那样轻，把道义看得那样重。虽是校长，他的生活水准降在一般限度以下，总是穿着一套灰布长衫，北伐后，才添了两套青

布中山装。有人劝他，人要衣装，为避免权贵的门房挡驾，不如稍加装点。他笑笑说："那太麻烦，遇着那些以貌取人的门房，我可以不见他的主人。"

为了学校，唐义精四处借贷。虽然学校的教职员大都拿着最低薪水，大都饿着肚皮，可学校的教务依旧井井有条，大家说："他人太好，不好让他一人受苦。"唐义精用他的人格魅力影响着他的朋友、学生，他一身是债，但他的刻苦、辛劳、诚恳，大家都看在眼里。

唐义精办学之外，还撰写了《艺术史》《绘画概论》《湖北画人略辑》《陕豫考古录》等专著。1933 年，唐义精到终南山考古，都说穷家富路，可他身上只带了 360 文铜钱作盘缠。进山时，他买了一些窝窝头，没有地方装，唐义精脱下身上的长衫，包着窝头，背在肩上。山上有个地方叫"鹞子翻身"，是两座山之间，一条铁索连着，底下是深涧。拉着铁索到越涧处时，要顺着铁索连人翻身抛过去，一个不慎就会掉下悬崖。

从终南山回来讲起这些，朋友心有余悸地问他："你是去寻死吗？"唐义精笑笑："不！一个事业的成功，是要拼着性命去换的。"

在唐义精看来，考古如此，办学也是如此。

时人曾感慨地说，唐义精是当代武训。他热爱艺术教育事业，尤爱他的学生。

1938 年日寇轰炸武汉时，武昌艺专校园被炸毁，唐义精带领师生，将武昌艺专从武汉迁至重庆，这也是全国第一个迁至后方办学的私立学校。1944 年，唐义精在前往重庆为学校筹款的途中，因小火轮在江中倾覆，不幸去世。和他同船，同是武昌艺专老师的胞弟唐一禾，也不幸同时遇难。唐义精将自己的一生，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武昌艺专、奉献给了学生。

陶忠辉 ①

笃学不倦　砺志研思

——尹高朝35年坚持写好党史故事纪实

到处寻新闻，新闻就在眼前；到处找劳动模范，劳模就在身边。这里要介绍的是一个数十年如一日写红色纪实、讲红色故事的学者，一位笃学不倦、砺志研修、潜心写作、著述等身的作家和学问家。他的名字我们或许并不陌生——尹高朝。

十年磨砺矢志向学

尹高朝，原籍湖北省麻城市夫子河镇人，20世纪70年代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走出大山。最初的学历，是当时的省中专湖北省公安学校，参加公安工作后他常常感觉知识不够用，并思量着找机会再次进修，深化自己。1989年，他在原单位领导的支持下，参加了成人高考，以全市文科总分第二的好成绩，被武汉市公安干部学院录取——从1979到1989年整整10个年头，他而立之年再次跨进了大学的校门！他异常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当时参加干部学院学习的学员，大多是全省公安系统、保卫部门副科长以上的干部，他们来自各市县，资格较老，工作经验丰富，但文化底子相对较薄，学校的教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他们。因之，尹高朝觉得学习时间显松，学习内容显浅显窄，感觉“吃不饱”，于是又申请到武汉大学攻读第二学历——法学专业。前

① 作者曾任《新闻前哨》副总编辑，现为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孝感分社负责人。

者在汉口古田四路，后者在武昌珞珈山，虽然每天要乘三四个小时的公交车，来回奔波，他不以为苦，反倒以此为乐。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同时拿到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公安管理专业和武汉大学法学专业的大学毕业证书，完成了院校深造、科班攻读的初步目标，为知识的腾飞插上了翅膀。

取得大学双学历后，尹高朝又进军北京，先攻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再读政治学博士。为了维持生计，长久发力，他边干边学，以工养文，以商促学，在又一个长达十年的学习和工作中，逐步实现了从一名警察和国家干部（时语）向一名学子学人的转型……

与此同时，尹高朝还在平时挤时间抓空档看书学习，博览群书。那几年，他读过的书颇多、颇杂，既有国学方面的，如《四库全书》《古文观止》《大学》《中庸》《论语》《孔子·孟子》《孙子兵法》《菜根谭》《曾文正公全集》《周易全书》《道德经》《黄帝内经》《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等等；史学方面，如《史记》《资自通鉴》《二十四史》《中国通史》《汉书》《中国野史》，等等；传纪类，如美国罗斯·特里尔著《毛泽东传》、俄罗斯亚历山大·潘佐夫著《毛泽东传》、李锐著《毛泽东传》、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朱德传》《刘少奇传》《邓小平年谱》《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秦始皇》《刘邦》《汉武大帝》《刘秀》《隋炀帝》《唐高祖》《李世民》《武则天》《朱元璋》《康熙》等，可谓海量。

行万里路著一部书

书本在默默堆砌成山，知识也在悄悄地升华。读的书多了，尹高朝萌发了写书之念。

像许许多多的中国老百姓一样，尹高朝景仰作为伟大政治家、卓越思想家和杰出军事家的历史巨人毛泽东，更膺服他那战略家的睿智、哲学家的精深和理论家的才情。在那段时日里，常常有这样一些问题萦绕在心头：毛泽东为什么能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脱颖而出，最终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独立与富强的伟大领袖？成为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中高高耸立的脊梁？成为一位举世瞩目的历史巨人？为什么他不只是集伟大

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于一身，还是一位大词人、大书家，他有限的人生为什么能成就那么大的功业？……

警察工作之余，尹高朝正在刻苦学习，博览群书

这些神秘的谜团，吸引着好奇的青年去叩问、去探索、去追寻。他曾花费两年时间，在那些关于伟人出身、家世、成长的书海中苦苦探寻着他登上伟人“星座”的奥秘。最终，把目光投向了毛泽东的青少年时期——作为莘莘学子孜孜求学的时期。终于寻找到这样的答案：毛泽东伟大的一生，确实是从他那不同凡响的青少年时期开始的，他之所以成长为划时代的巨人，除了与生俱来的自身特质和后天的革命斗争实践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那便是在长达十余年的求学生涯中，为数众多的老师对他的教导、培养以及对他品格的精心塑造。再联想到自己当老师、做学生的经历，尹高朝便有了这样的感悟——无论是寻常百姓，还是声名显赫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和大学问家，都是依靠教育、依赖老师，把他从混沌引向光明。于是，一种讴歌老师——伟人之师的强烈愿望便萌发了，这便有了《毛泽东和他的老师》的构思。

他积极准备着，首先是走出去。《毛泽东和他的老师》一书，真正开始写作的时间是 1992 年。这是一个充满着艰辛的创作过程。手头的资料是有限的。系统地记述毛泽东和他的老师们交往关系的著作，国内外还是空白，可供借鉴的史料实在不多。尹高朝打算走出去，到毛泽东的生身之地去寻找材料、寻找创作灵感。于是便开始了三下湖南、两赴北京的万里行程。

1992 年 4 月 18 日，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尹高朝搭乘一辆去广东的货车，踏上了第一次去湖南的旅程。这次湖南之行，一共待了半个月，主要是去了长沙、湘潭和湘乡三个地方，在上屋场、棠佳阁、东山学校、湖

南省立第一师范……这些毛泽东早年生活和学习过的地方，踏寻伟人的人生履迹，进行实地调查采访。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采访的对象和内容距今年代久远，大量资料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湮灭，最后不得不怀揣一颗沉甸甸的心，登上了北上的列车，赴北京展开了为期四十天的资料查阅工作。从北京回来后，他利用半年的业余时间，完成了 40 万字的初稿。

次年，也就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尹高朝拟定对书稿进行修改和充实，在省、市委宣传部领导的过问和关心下，单位给了他一段时间的创作假。于是，在那个炎热的夏天，尹高朝第二次到了湖南。这一次，他在那块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上奔波了一个多月，毛泽东部分老师的故里——长沙、湘潭、韶山、湘乡、宁乡、新化、安化、平江、浏阳、岳阳等市县，留下了他的匆匆步履，三湘大地洒下了他辛劳的汗水。在那些日子里，尹高朝脑海中一直有着这样的念头：自己的几番远行，不只是为了撰写一本书，而是以独有的方式，为挖掘和抢救毛泽东从师求学生活的珍贵史料，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这期间，尹高朝艰辛备尝。湘中多山地，许多地方交通不便，以步代车是平常事。饿了，就啃几个干馒头；渴了，就喝几口山泉水。在前往毛泽东当年的国文老师袁仲谦先生故里采访的那一次，因山路陡峭摩托车翻车，险些回不来了……那天，从长沙出发乘公共汽车到新化县城，天已黑了。第二天上午先去了趟县史志办公室，下午便往袁先生的故居洋溪镇苍溪乡戴家凼村赶。到洋溪镇时，已是下午 4 点钟了，经打听根本没有戴家凼的车，于是，便租了一辆摩托车。摩托车在陡峭的盘山路上爬行了近两个小时才到苍溪乡，越往前走路越窄、越险，开车的小伙子可能是紧张，在一处急转弯的地方车一下子翻了，幸好前面有几棵大松树挡住，人和车才没摔到崖底下。车子再不敢骑了，他们把它寄放在路边一个单门独户的老乡家，继续徒步往前赶，大约走了近 10 公里，才在晚上 8 点左右到达戴家凼。在同袁先生的族人进行了一夜的交谈和资料抄写工作后，晨曦已爬上窗棂。

古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尹高朝这次采访活动，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热忱帮助，如湖南省湘潭市等近十个地市的党委宣传部门、

政协文史部门、湖南韶山管理局、湖南长沙“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陈列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长沙市博物馆、湘潭市图书馆、东山学校、韶山学校等单位的有关领导和同志们，给采访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一些在湖南乃至全国知名度颇高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或赐教或赠送书籍、资料和图片；在采写当中，他还有幸结识了毛泽东老师们的一些后嗣和亲属，书中不少口述材料及文字资料，便是由他们无私提供的。这次采访和第一次湖南之行不同，可以说是满载而归。在此后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尹高朝凭借采访得来的翔实资料，一气呵成，完成了这部57万字的书稿，较为准确和完整地记述了毛泽东从蒙馆读经到北大旁听这十多年间艰苦曲折的求学生活，实录了他与24位老师之间非同寻常的交往关系，反映了老师们对伟人素质的塑造定型而呕心沥血的全过程。

潜心研思硕果累累

十年磨剑终成锋，一朝破竹势如虹。

继《毛泽东和他的老师》之后，尹高朝在周恩来诞生110周年之际，又推出了一部反映我国开国领导人老师的新作《周恩来和他的老师》。其间，他曾一上辽沈、二下淮安、三赴津门，实地走访伟人周恩来生活、学习的足迹，凭借如珠之串的史料，历经数年积累，半年写作，终于完成了这部具有较高史学价值的长篇著作。这部书作又与《毛泽东和他的老师》《开国领袖和他的老师》形成姊妹篇，并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11年1月以“伟人之师”系列丛书成功推出。《毛泽东和他的老师》《周恩来和他的老师》《开国领袖和他的老师》这一丛书，记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开国领导人从蒙馆读经到大学深造这个阶段艰苦曲折的求学生活，实录了他们与众多老师之间非同寻常的交往关系，反映了老师们对伟人素质的塑造定型而呕心沥血的过程，从而形成了这样的一些观念——书本，给伟人插上了理想的翅膀；老师，教他人做一个大写的人；教育，赋予了他们独特迷人的人格魅力。迄今为止，这套丛书印刷十几次，印数达100多万册。

“世界上的确有一种人，从不强调自己生命的意义，悄无声息却认真

2011 年 1 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的老师》《周恩来和他的老师》《开国领袖和他的老师》

而用力地活着。”尹高朝就是这样“认真而用力地活着”的人。此后，他厚积薄发，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在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红旗出版社等一些党史类顶级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公安部长罗瑞卿》《罗瑞卿警坛风云录》《赤子毛岸英》《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黄石》《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黄冈》等图书。

此外，他还深耕于大别山红色文化的沃土，耗费 10 年之功，撰写了反映大别山为中心的共和国开国将领军事生涯和壮丽人生的大型军事史丛书《从大别山走出的共和国将星》(全 10 卷，520 万字)。为了写好这部大书，尹高朝以坚韧的毅力，10 年调查搜集资料，两年日夜写作，完成重达 78 斤的书稿，然后经历 5 年时间的层层报批，终通过原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国军事科学院、国家新闻出版总局和全国政协新闻局等权威部门的审批，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 90 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隆重公开出版发行，从而在全国广大部队官兵中掀起了一场“追著”“评著”和“藏著”的热潮。

人民文艺家协会会长林洪展先生亲自撰文点评了该书的“三个突破”——讲求革命军史题材的“红”与“专”兼收并蓄；探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走确保“正确导向”“客观公允”的军事史研究之路；追

《从大别山走出的共和国将星》，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 年 1 月出版

求军事历史文化创新，把艺术精品呈献给人民。林先生还在长文中介绍说：“在写作《从大别山走出的共和国将星》一书过程中，尹高朝先生又至淡泊超然、入迷忘我的境界。从资料素材搜集到完成初稿，整整 10 年；从呈送中央有关部门审批到正式出版，又前后历时 5 年。”由是，林先生饱含感情地赞叹道：“尹高朝先生无疑是一位具有使命感的文艺家，是一位富有道德良知的学人。终其半生，他从不搞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那一套；从不拿低俗当通俗、欲望当希望；更视花拳绣腿、投机取巧、沽名钓誉、自我炒作、‘大花轿，人抬人’为不耻。他认为，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否则不仅是对文艺的一种伤害，也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因之，他三十余年如一日，长期致力于红色历史文化、特别是党的历史和军事史的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先后有 50 多种著述面世，可谓洋洋大观。”

心如良田，勤耕有福。这些年来，尹高朝为了寻求学问上的“真经”，潜心书斋，宵衣旰食，刻苦写作，已至佳境。诚如求是杂志社高级编审高晨野先生在《众里寻他千百度——尹高朝印象记》一文中所写的那样：“清代国学大师王维国在《人间词话》中一段妙论——他采撷宋词中三个精句，用来形容读书治学的三种境界，以为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

须经过这样的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为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三境界也。作为高朝同志的挚友，我见证了他为寻求艺术上的真经，所经历的由淡到苦，由苦到甜的全过程，我为之骄傲，为之感佩。”

近年来，尹高朝又三上陕北、四赴甘宁，在习仲勋当年战斗的地方实地寻访，完成《陕北十三年——毛泽东和习仲勋》，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纳入出版计划，并呈送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办公厅审批。他还完成了《百姓父母官——习近平的县委书记生涯》的创作，亦在送审之中。

慷慨赠予播撒书香

治学之路是异常艰难的，但它带给尹高朝深邃的思索、无穷的感悟和巨大的启迪，面对收获的鲜花与掌声，他依旧淡然如故：“人生在世，经一番挫折，长一番见识；容一些横逆，增一些气度；省一分欺瞒，多一分道义；学一点退让，得一点和谐；加一丝留意，知一些物情。”人生哲学，已然透悟；洞事察物，已至佳境。

功成名就的尹高朝先生，看重知识，乐于红色文化的传播，却视身外之物为草芥。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书，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伟大的思想、光辉的智慧，总是以书的形式流传久远、辐射四方，转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书又是人的朋友，更是青少年的朋友，她是哺育青少年心灵的母乳，启迪智慧的钥匙，一本好书，对青少年的成长乃至他们一生，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青少年的心灵是一块等待开垦的神奇土地，而作书的人恰似那抛撒种子的人。播上思想的种子，就会得到行为的收获；播上行为的种子，就会得到品德的收获；播上品德的种子，就会得到命运的收获。我愿做一个辛勤的播种者。”

尹高朝先生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十几年来，他无偿给许多单位赠送价值可观的图书，特别是向一些大学慷慨赠书。他专程驱车母校湖北警官学院，把四万余元的书籍送给校图书馆；他应黄冈职业学院

所请，把近两万元的个人作品无偿赠送；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黄石市图书馆、大冶市图书馆、阳新县图书馆，还有故乡黄冈市图书馆、麻城市图书馆等，他赠送了价值十万多元的书籍，麻城市图书馆还设专柜，陈列他的个人作品；在2019年农民丰收节之际，他给家乡麻城市夫子河镇各村“农家书屋”捐赠了14万余元的红色图书，还给蔡济黄纪念馆送书题诗陈列，“先驱热血染神州，主义成真壮志酬，乡梓后昆承大业，扬帆沧海立潮头”。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90周年的纪念日前夕，他给黄石市军分区、黄石市武警支队各赠一万余元的《从大别山走出的共和国将星》图书，黄石市军分区官兵代表感谢说，“尹老师无偿赠送军事书籍，体现了他对人民军队的深厚感情，给军分区官兵送来了难得的精神食粮，我们将不负厚爱，以革命前辈们为榜样，传承红色基因，发扬优良传统。”嗣后，军分区已将这批书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的革命传统教育资料，组织官兵学习。尹高朝慷慨解囊的捐赠行动，在“学习湖北、书香湖北”全民读书活动中播撒了缕缕清香……

牢记初心，不忘使命，前进路上，永无止境。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尹高朝最初的“初心”是能够做点事、成点事，一生不要虚度；作为一位纯粹的学者，尹高朝的“初心”就是写好红色历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这些，他都做到了，而且是做得十分出色。青涩守得两鬓白，水滴石穿万仞开。潜心研修数十载，他并没有停歇，而是像一个勤苦耕种的老牛一样，继续默默前行。唯其静，能致远；唯其坚，能永年。几十年来，不管世界怎么变幻，人心多么浮躁，他静心做学问，不受干扰和影响；无论前路漫漫，各种压力山大，仍不能动其讲好红色故事的志向，矢志不渝，一往无前。目前，他正在琢磨影视剧的创作，并应中央党校之邀，准备把原创作品《陕北十三年》写成大型电视剧，搬上屏幕。

“莫道书生清苦意，比来食淡更精神。”愿尹高朝先生恪守高洁淡泊之风，与时俱进，为人类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来。我们期待着，他又在新的土地里深耕出茂盛的庄稼，长成累累果实……

胡德彰 ①

忆武汉长江大桥碑文撰写者王南舟老师

在黄鹤楼脚下，长江大桥引桥边，树立着一块醒目的石碑，即由郭沫若撰写的《武汉长江大桥建桥记》，铭记着这座桥的历史。自 1957 年通车以来，无数南来北往的人在此碑前驻足、观赏、留念，碑上那刚柔并济、清秀洒脱、法度严谨、笔法醇美的楷书碑文，让人啧啧称赞，其近 1800 字碑文字样书写者就是湖北书法大师王南舟。

书法翘楚　苦练而至

王南舟先生，1896 年农历正月十八日，出生于汉阳县永安镇桐山头新庄屋（今蔡甸区永安街道），王氏家族书香门第。先生早年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法学院。

其父王凤元，晚清秀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两湖师范学堂，在武昌各中学执教十余年，治学严谨，为人师表。晚年在居室傍筑学塾一舍，种以修竹，名曰“种竹山庄”。乡里有志于学者皆立雪门下。

南舟先生自幼酷爱书法，凡父亲练笔习书时，他必旁立静观，时而用手比划，时而动口求教，六七岁时他便站在凳子上用水代墨，以砖作纸练习写字。十一二岁时，每逢年节，就给村里人书写对联。

因为酷爱书法，南舟先生年届十四，便被其父寄于乡师侯镜铭馆下就读，侯乃当时知名秀才，精通书道，为有影响之书法家。

在家庭熏陶和社会影响下，先生习字，坚持苦练，始终不懈。始学

① 作者系离休干部，曾为武汉市政协江汉区第八届、第九届委员。

颜柳诸帖，后学魏晋郑文公碑和二王草书，逐渐发展，转练汉碑（隶字体）《石门颂》。继而又练《毛公鼎》和《散氏盘》，同时，兼写魏碑《张黑女墓志》，由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书法逐渐精妙，运笔有神。先生在习书上是个不知满足的人，为了更上一层楼，又兼学了《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和草书孙过庭《书谱》，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吸取众家之长，将诸体贯通于一炉，挥洒自如，终于自成一格，为书法大家所推崇。

王南舟书法作品

先生不仅把练字作为学习的必要手段，而且还将其当作陶冶情操，强身健体的有益活动。他心地善良，性格谦恭，使人容易接近。凡找求字索书者，不分贫贱，不论职位高低，他都会让你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武汉成为日军空袭目标。共产党人陈柱天是学生运动及国际学联领袖，1938 年 7 月 12 日牺牲于日军空袭武昌时。武汉沦陷前夕，陈柱天的父亲陈绳武先生，国民党退役海军将领，临危受命接任汉阳县县长。在永安堡与前任县长交接之时，正是汉口沦陷于日寇之日。陈绳武先生组建了一个国共合作、坚持抗日的县政府。王南舟先生毅然加入其中，作为主要骨干，负责教育方面工作。

特聘为汉阳县立中学教师

今学堂，古战场。晴川阁，琴台旁。
月湖堤畔菱荷香，烟波江上渔歌晚。
五育并重四维张，先贤留遗训，吾辈当发扬。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迈步向前进，建设新汉阳。

2008 年 5 月 27 日，笔者同 10 多位汉阳县立初级中学老校友，应时任汉阳一中校长方勇军邀请，为《汉阳一中校志》提供史料。座谈会上陈国权吟唱，刘仁昕校正歌词，叶福佩记谱，完成了这首汉阳一中，前身为民国时期汉阳县立初级中学的校歌。

大别山（龟山的古名）、凤凰山，两山并峙。莲花湖畔，竹篱围绕，两排白墙黛瓦校舍，晚清高等小学堂旧址，这便是今汉阳一中前身，汉阳县立初级中学所在位置。

当年有一种风尚，聘请本县名人担任兼课教师。那时王南舟先生已经是著名书法家，所以汉阳县立初级中学校长李启东特聘他为学校国文课教师。当年特聘为该校兼课教员的还有：时任县参议会副议长张忠骧，代县长王慕庐等人。

书写武汉长江大桥碑文字样

王南舟先生在汉阳县立初级中学任课时，已年过半百。

待到武汉解放初期，武汉市人民政府设立文史馆。至 21 世纪，延聘馆员仅 187 名。而 1953 年，前汉阳县立初级中学王南舟先生、袁绍堂先生，两位老师同受吴德峰市长聘请为武汉市人民政府文史馆首届馆员，由此可见汉阳县立初级中学文史师资水平之深厚。

1956 年冬，当年，大桥局在全国征集，书写郭沫若撰《武汉长江大桥建桥记》。王南舟先生随即以楷、隶两种各写一幅，送大桥局转北京挑选，其中王南舟的楷书被选中。国家赠给王南舟五百元稿酬，他再三辞谢，声称“为大桥写碑，是时代赋予书法家的使命。”“为伟大时代书写丰碑，留下墨迹，亦千古风流韵事。”后来大桥局赠给他石印二方，留作纪念。

长江大桥碑文照片（叶脉提供）

1962年，武汉解放公园内苏联空军烈士墓碑文、洪山施洋烈士墓的碑文，都是王南舟先生所书。我们当年在武汉展览馆，观摩许多书法展览以及中山公园的花卉展览，皆能欣赏到王南舟老师刚柔相济、清秀洒脱的书法风韵。

助力推广简化汉字

王南舟书写的《简化汉字楷书习字帖》

我国汉字简化经历了曲折发展过程。汉字减笔早在南北朝的时候就有，到了1920年，钱玄同提出《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这是中国自汉字产生以来首次系统地提出汉字简化字方案。期间简化方案经过多次修改，历经过渡性发展。我们现今用的简化体汉字大部分是1956年通过的《汉字简化方案》，并于之后不断修改与调整，所总结出来的常用字体。

1957—1958年，国务院推广简化汉字，王南舟先生当即伏案挥毫，用楷书书写了《简化汉字楷书习字帖》一本，由汉口群益堂出版，广为发行，为普及和推广简化汉字作出了贡献。

王南舟老师还书写有《雷锋日记楷书习字帖》。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1969年王南舟先生病逝于武昌。书法是先生73载人生的“墓志铭”，他一生以文化人的成效，留与后人评说。

吴德风[①]

吴求剑将军的赤子丹心

吴求剑入黄埔军校第三期照片画像

一纸家书寄深情，百岁难忘是故乡。

他享年 93 岁高龄，晚年客居大洋彼岸的美国洛杉矶，给老家亲友共书写了两百余封信件。

文化薪火相传，家风浸润心田，他认为给子孙后代，留财不如留德。

这位可敬老人，就是打响“八一三”淞沪抗战第一枪的吴求剑将军，其功绩载入海峡两岸历史教科书。

2022 年清明节来临，在湖北黄梅、台湾新北市、美国旧金山、澳大利亚墨尔本，吴将军的亲友们以不同的方式，馨香一瓣，忠义千秋，追思纪念老人家爱国怀乡、反独促统的赤子情怀。

勉励子孙诗书传家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翻阅着伯父吴求剑从美国洛杉矶寄来的六十多封家书，黄梅县苦竹乡小溪村三组村民吴新毛思绪万千。吴求剑引用《诗经》典故，阐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打败军阀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让侄子后人不纠结历史恩怨，不向政府伸手，不与任何人叫苦，

①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作家协会会员。

只要有一双手，就有一口饭吃。

“让子孙后代接受教育，知识改变命运。”吴新毛发出感慨，伯父的来信，说得最多就是这句话。

吴新毛的胞姐吴漫珍，1927年出生，读过私塾。新中国成立后在家乡一江之隔的九江国棉一厂工作，丈夫彭冬生。“文革”期间，吴漫珍在铁路上抢救一位男孩，紧急刹车的火车，卷入她过膝的辫子，孩子获救了，吴漫珍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吴求剑写给家乡亲人的书信

出生国民党地主家庭的吴漫珍，危难时刻显身手，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改革开放后，经家人和获救孩子家庭奔走，吴漫珍获得革命烈士称号。

“姐姐牺牲后，外甥们还没有结婚。姐夫和孩子们住在九江春安里，该地方已经拆迁改造，旧房子推倒，盖起了住宅区。”吴新毛说，“最近几年，外甥没有过来，姐夫如果健在，也有九十岁了，希望知道他们一家的消息。”

据不完全统计，吴求剑与台湾军政人物蒋经国、吴国桢、王世杰、陶希圣、孙元良、陈大庆、石觉、王杰、向军次、余学海、易瑾等，黄梅乡亲瞿荆州、吴大宇、柳调达、张福英以及侄女婿许立峰、叶封唐等，与大陆侄子吴赞舟、吴新毛、吴北斗、吴毛九，侄孙吴德风等；曾在他部下任职过军需官的黄梅一中教师柳伟（汉江）、乡贤黄梅中医院主任医师程兆雄、杉木乡中学英语教师何炳南、黄梅楹联艺术家柳义君、黄鹤年，黄梅书法家岳士杰等通信共计两百余封。

身体力行支持晚辈求学

“我和弟弟新开，出身贫农，是堂哥求剑和他老婆周其华，支持我们姐弟读书，免除学费。求剑哥与我父亲年龄相仿，但我们辈分是出五服的

堂兄妹，他帮穷不帮亲，认为扶贫不如扶志。当时花园山办学堂，免除学费，东柳大屋柳伟先生（1925—1983 年）执教，附近柳姓、程姓、于姓、黄姓学子纷至沓来”。年逾九旬的吴春华，2022 年 4 月 4 日，她又一次回到出生地苦竹乡小溪村花园山祭祖，老人家沉思往事。

她 15 岁加入共青团，担任当时的小溪大队妇联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嫁给苦竹乡七里村五组李周火，当时酒席宴请宾客共十三桌，油铺公社和大队领导都来了。他们表扬吴春华知书明礼，落实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妇女工作，位居公社前列。对于吴春华外嫁外村，亲人感到依依难舍。

“文革”时期的一天，饱读诗书的父亲吴正山，找到女儿吴春华和儿子吴新开姐弟俩，告诫他们：别人无中生有，不乏造谣中伤。你们可以不说话，但不能落井下石。对于历史人物吴求剑将军，在家乡兴学赈灾，个人私德没有缺陷。他们点头同意，也做到了。

十年前，家人为她举办八十岁寿辰，娘家花园山来了二十多位吴家侄子侄孙给她祝寿，获悉侄孙有黄冈高中毕业生，有正在大学就读的研究生，有从事新闻采访的报社记者，参军入党提干，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她感到欣慰。

“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诗书传家，一定可以富三代。”老人家念念不忘，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大多数人只要有一口饭吃，女孩子能够读书，识字明礼，就很知足。这不是金钱能够买到的精神财富，比黄金货币贵重，这是她青少年时期美好的回忆。

在台湾新北市的许吴定国介绍，她只上过一天学，但大伯父吴求剑督促她学习，不久能读报写信。她没有工作，大伯父从来不和老长官打招呼解决她的就业问题。在家相夫教子，五位子女都受过高等教育，学有所成。她曾参加了三届台湾妇代会，受到宋美龄的接见。

大伯父在美国逝世，山水阻隔没有送他最后一程。一年后的一个夜晚，许吴定国梦见大伯父给她盖被子，摸了她的额头，轻声呼喊她的乳名。大伯父说：“你又想家了，不要恐惧，你要坚强，你父母亲在老家等待你的归来。我和伯母会带你回家探亲，骨肉团圆，终有时日”。然而好梦易醒，窗外夜色阑珊，凉月如水。“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

许吴定国深信，那啼血的杜鹃，终究是唤不回伯父的苏醒。

携妻女回乡寻根探亲

1993 年 4 月下旬，91 岁高龄的吴求剑携妻女一行五人从美国洛杉矶回乡祭祖探亲。他在香港、深圳、武汉、九江、南京、上海、北京等城市观光，没有惊动大陆官方。

在五祖寺负责园林花卉工作的吴政华，为吴求剑将军堂侄。1948 年出生的吴政华，原名吴震寰，为吴求剑将军所赐。吴政华希望老将军有生之年再次回乡，吴求剑当时用微弱的声音回答：假如有魂魄的话，我会回来的。

吴求剑积极支持续修的《吴氏宗谱》，1993 年印刷。据悉，吴将军的父亲树彩公，生前就有续修宗谱的愿望，后因 1944 年逝世而中止该计划。儿子完成父亲的夙愿，时间跨越半个世纪。

这次吴将军回乡，八位儿女每人凑出一千美元以壮行色。他给老家亲友发红包，预算超支，以致没有返回美国机票费用。从台湾赶回来的侄女吴秀瑛，向她丈夫叶凤唐的同胞兄弟叶炎春借款一万元，解了燃眉之急。当然这些插曲，没有让吴老知道。

时隔一载余，吴求剑于 1995 年 1 月 7 日溘然作古，享年九十三岁。

2014 年 1 月 10 日，马英九约见从美国回台湾探亲的吴求剑孙子吴元浩。马英九说，2015 年是神圣抗战七十周年，也是吴将军逝世二十周年。民族英雄吴求剑将军，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怀念。

全国政协《“三亲”文库》文史资料征稿启事

2020年11月，全国政协正式启动《“三亲”文库》编纂工程。为更好地在《“三亲”文库》中体现湖北元素，做深做实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特向社会各界征集《“三亲”文库》各专题相关稿件或线索。

《“三亲”文库》结合重要纪念节点和宣传重点，拟定了19个专题，包括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五四运动、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国共合作、西安事变、重庆谈判、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改革、改革开放、沿海开放城市建设、经济特区建设、脱贫攻坚、两弹一星、三线建设、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民族边疆史料。每年拟编辑出版1—2个专题。

来稿应坚持政治导向和“亲见、亲闻、亲历”原则，史实翔实，选材新颖，立意独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文章末尾请详细注明作者姓名、单位职务与联系方式。我们将择优推荐给全国政协或在《湖北文史》上刊发。稿件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联系方式：湖北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
通信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洪山路85号
邮政编码：430071
联 系 人：刘　丹　hbwsa@126.com　郑　斌　584908315@qq.com
电　　话：027-87234719

《湖北文史》编辑部
2022年12月

著作权使用声明

我们坚持“版权永远属于作者”的原则，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有关精神，凡投稿至《湖北文史》的文章，一经采用，就视作《湖北文史》已获取著作权授权，即受著作权人委托，有权代其行使著作权的相关权利。著作权人的稿件若有侵权行为，后果由著作权人自负。

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我们将按作者说明处理。